

15.15
柳城文史资料

第六輯



政协山东省聊城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聊城文史资料

第六辑

(内部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聊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月

聊城文史资料

政协山东省聊城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山东省聊城市福利企业公司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3.3千字 9.75印张

印数 1—1000

聊新出准字(1991) 1—110号

主 编: 郑 虬 陈宝森

编 辑: 裴 蓉 郑 磊

孙元芳 范景华

政协聊城市第七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委员：

白万金

副主任委员：

古 今 李裕桓 张道英

委 员：

牛文华 邓愧余 孙元芳 吴云涛

郑 虢 黄孝统 葛 渊

目 录

文 化 教 育

抗战前的聊城戏剧、电影和传统的群众

- 文化活动.....邓槐余(1)
- 聊城泥塑、木版年画和蚰子葫芦.....杨道田(8)
- 私塾回忆录.....吴云涛(15)
- 三师的学制改革与女子部的创设.....侯朝宪(28)
- 在山东省立第二中学的片断回忆
- (1921——1926).....金志远(29)
- 回忆山东省立第二中学
- (1935——1937).....邓槐余(32)
- 民国中期聊城学校教育琐记.....胡国典(38)
- 记山东省十三联中沙镇分校.....王文昭(42)
- 在瓦砾中建起的聊城郁光小学
- (1949.7——1951.2).....邓槐余(44)
- 我区最早的函授大学——记聊城地区高师
- 函授教育(1956.7——1966.7).....邓槐余(49)
- 聊城教育史略(1840——1949).....孙元芳(56)

人 物 春 秋

忆山东省筑先(聊城)县抗日战争时期

- 几位爱国民主人士的生平事迹.....张 侠(72)

EA97/22

史学家傅斯年.....	杨道田(103)
杜光坝小传.....	李瑞阶(108)
鲁西北现代教育先驱孙东阁生平事略	
.....	孙竹亭、许钦明(110)
忆李俊昌教授.....	金永昌(119)
傅懋勛教授生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21)
秦汉隋唐史学家傅乐成.....	杨道田(125)
辽金史学家傅乐焕.....	杨道田(129)
书法家刘克平轶事.....	杨道田(131)
忆王露亭先生.....	戴镜寰述(134)
实业家商振声小传.....	吴云涛(137)
身虽先去音容在——忆李士钊同志.....	许继善(138)

乡 土 风 情

堂邑“放马场”.....	郑 磊(141)
风雨沧桑话沙镇.....	李培现(143)
南关今昔.....	张玉梅述 吴云涛记(149)
过去的古楼西.....	胡简如(152)
一步三关庙.....	赵芳珍(155)
神仙渡狗铺的传说.....	周脉琴(157)
打水.....	吴云涛(160)
西关井.....	葛 渊(162)
茶馆忆旧.....	金志远(164)
闲话澡塘.....	李长海(179)
玉皇阁上斗蟋蟀.....	高金福(187)

杂谈估衣店	马玉骏(191)
请摇社	沈宝章(193)
旧聊城的果木市	吴云涛(196)
旧县衙门的监狱	于朝敏(199)
政协聊城市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202)

抗战前的聊城戏剧、电影和 传统的群众文化活动

邓 槐 余

聊城是鲁西重镇，明清为东昌府治。府、县均设在聊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山东省政府在聊城设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即为专署、县府所在地。有史以来，聊城就是鲁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由于历史悠久，文化昌盛，抗战前聊城的文化活动曾是极盛一时的。

抗战前，官办的文化机构是“民众教育馆”，脱离群众，毫无建树。1935年韩复榘主鲁时，在山东各县建立“进德会”。聊城进德会设于城内火神庙街大神庙内，庙门、庭院和大殿修饰一新，除为军政官员设“台球室”外，还设有乒乓球室、图书室和阅览室，主要对象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戏剧，聊城人称之为“大戏”，是群众所最喜爱的。过去唱戏一般是为了祭神，如西城关帝庙、西关吕祖庙、山陕会馆奉祀关帝，都建有戏台，每年为祭祀均唱戏三天。再就是传统的贸易大会（当时称骡马大会）也唱戏。如聊城东关陈口大会及农村各乡镇均定期举行，一般三日至六日。以上均是官绅合办，从中渔利。“五四”以后，破除迷信，反对

封建礼教，打倒孔家店，在革命潮流冲击下，文明戏（以后称话剧）应运而生，学生首当其冲。聊城三师、二中学生在万寿观、火神庙经常演出破除迷信、婚姻自由一类的新编话剧，如《奶奶的主张》、《美满姻缘》等。1934年后，唱戏才具有商业性质，在火神庙开始售票；并在城内老府院街开办专业剧院“同乐大戏院”，聘请京剧名角，售票演出。但设备极其简陋，不过条凳、席棚而已。“七·七”事变后，聊城专员兼县长范筑先将军在党的争取团结下，坚持守土抗战，开创了鲁西北抗战的新局面，组建抗战移动剧团。这时戏剧的主要形式是街头剧、活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等，宣传抗日救国。这时演戏已经不是为了娱乐，而是直接为政治服务了。

聊城人在1933年才第一次看到了无声电影。传统的群众文化活动，如元宵节的龙灯、狮子等；平时街头巷尾演出的八角鼓、评书等均有效地丰富了聊城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一、戏 剧

过去的剧团，人们称为“戏班”。聊城著名的戏班是“李家班”，班主李长业，家住城内考院街西头，剧种是河北梆子。三十年代，李家班的主要演员有李连仲、段法、王学等。主要剧目有《辕门斩子》《桑园会》、《喜荣归》、《牧羊圈》等折子戏；武戏有《叭蜡庙》、《铁公鸡》、《三岔口》、《长板坡》及关公戏（即红净戏）。当时“京剧称为“二簧”，为了赶时髦，很多梆子演员改唱二簧，往往唱得南腔北调，

还有几个演员演出，有的唱梆子，有的唱二簧，出现很多笑话。李家班有个著名的“戏篓子”，绰号“血脖”，缺什么角，他唱什么角，可什么也唱不好，群众最厌恶他。他一出场，观众在下面就骂。有一次把他骂急了，他顾不得自己唱戏，和台下观众对骂起来。笔者听说有次在西关吕祖庙演《辕门斩子》时，杨延昭传令把杨宗保“推出辕门问斩”，焦赞真的把宗保推进台去“斩了”。这时戏唱不下去了，杨延昭正在为难，只见班主披着袈裟慌忙走上台来，口中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宗保命不该绝，命他还阳去者”，这出戏才唱下去。类似笑话很多，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1933年至1934年之际，临清县梁浅一个京剧班，坤角张云仙、张菊仙，一唱青衣，一唱老生，所演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每晚一本，连演三十多本，轰动整个聊城。聊城《东昌新闻》也大为捧场，甚至张云仙在街上几乎滑倒，掉了一只鞋子也上了新闻报。

其他的剧种，如评剧班也经常来聊，常演剧目有《花为媒》、《马寡妇开店》、《锯碗丁》等，亦很受群众欢迎。至于“河南讴”，群众听不习惯，只演了一次便“饿”跑了。豫剧当时还没兴过来。

连台本戏都是现排现演，有一定套式，如见面时一方说：“有失远迎，望乞恕罪”，另一方便说：“来得鲁莽，还请海涵”等。很多场面的唱、白多有重复。由于演员生疏，也闹过不少笑话。如包公道：“到后堂饮宴去也！”马童慌张走来摆好带“马”的架式，引得观众哄堂大笑。

稍后，曾有著名的演员来聊演出，如武生梅月楼（解放

后在德州京剧团)、裴汉臣、尹俊臣;女须生侯桂仙(解放后在河南京剧团);青衣花旦金少艳;小丑温富奎、康有信;还有一个叫“德虎”的花脸,声音宏亮,都说一、二里外也能听到他的唱声。

1934年,同乐大戏院在济南聘请了著名须生崔钟麟及青衣某,票价竟达一元。主要是商会派票,因为票价太贵,一般市民无此眼福。以后来的一般戏班,票价就一角、二角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京剧在聊城曾风靡一时,大街小巷都能听到二胡声,连小学生也会哼两口,“苏三离了洪洞县”、“一马离了西凉界”等戏。笔者在中学求学期间,便有京剧课,曾学过《俊袭人》、《别姬》、《捉放曹》等戏。聊城商界有几个票友,他们只会唱《空城计》,可唱不好,一有机会,他们便削尖脑袋钻进去登台表演一番。常常一出场,群众就喝倒采,有的还骂。这些票友有一特点,就是“任君笑骂,我自为之”。观众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叫“皮脸班”。

文明戏也登上了舞台。三师、二中学生自编自演,不卖票,随便看。除文明戏外,三师附小学生的舞蹈《月明之夜》、《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等穿插演出。幕间有雅乐队奏乐,如《梅花三弄》、《三潭印月》等,幽美动听。当时不兴报幕,在戏台的一角立一木板,上面挂着一束红绿纸,每张写表演什么节目,演完撕去。

1934年前后,聊城驻军组织过剧团,八十六旅有一姓郎的医官编导《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十余个剧目,经常在火神庙演出。他们有钱,服装道具精良,颇受群众欢迎。

二、电 影

1933年聊城第一次请来了电影，是聊城县商会及地方几个人从济南请来的，演出地点在火神庙。

当时，电影还是无声的，武侠片盛极一时，第一次演出的片子是《关东大侠》，主演是徐琴芳、王乃东等。多是武打场面，飞檐走壁，口吐飞刀，情节离奇，武打格斗场面很多，只看到人物张嘴，接着便是整个字幕。这次演出强烈地吸引了聊城城乡好奇的观众，小孩子更是入了迷。

1935年火神庙改建成进德会后，聊城绅商又在济南请来了电影和曲艺魔术，规模较大，门口松枝彩坊，闪烁着红绿灯泡；扩音喇叭，播送着流行歌曲，极大地轰动了聊城城乡。电影仍是无声的，片子是连续十余集的《火烧红莲寺》，还有著名艺人鹿巧玲的梅花大鼓，张慧冲的魔术和“小怪物”兄弟的相声。这次演出采取派票和售票两种方式。派票分红票、黄票、绿票三种。票价分别为二元、一元、五角和一元，按商店大小和地亩多少分派，实际上是敲竹杠，这在当时物价很低的情况下确实够昂贵的了。此外还卖部分门票，票价每张五角，一般群众看的就很寥寥了。

次年，聊城绅商又请来了电影。这时故事片替代了武侠片。笔者看的是一部影射“九·一八”事变的故事片。片名好象是《强邻》，主人公黄华仁受其本家黄猷的欺凌，黄华仁纵情歌舞，纸醉金迷，对黄猷步步强占其土地而不顾，结果被黄猷强占了东北乡大片土地，及至觉悟已经晚了。剧中黄华仁影射张学良，黄猷指日本侵略者，因都是黄色人种，所以

视为黄氏一家。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节节侵略，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纷纷谴责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由于不抵抗，丧失我东北三省大片国土。蒋介石为清除国愤，将罪责转嫁于张学良将军头上而拍摄此片。群众观后很自然地联想到“九·一八”事变，并由于不了解真相，无不痛骂张学良的卖国罪行。

同时，第一次演出了纪录片《韩复榘主席视察鲁西》。当时，济南已经有了有声或半有声电影，以上在聊城演出的仍为无声片。

三、传统的群众文化活动

一年一度的春节，是群众文化活动的高潮，从正月初一到十五，聊城南门到东门外“城墙根”、护城河畔，说书的、卖艺的、变戏法的应有尽有，城乡群众纷至沓来，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紧接着元宵佳节，家家户户悬灯结彩，从古楼东至闸口五里长街，到处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各商店门前各种彩灯争奇斗艳；更有狮子、龙灯、高跷、花船、杠官等传统的玩意来来往往，鞭炮烟火彻夜不断，使人目不暇给，流连忘返。几十里外的农民都来“东昌府”观看灯会。常有挤伤人、丢小孩的事情发生。

聊城群众文化活动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几乎每个街道都有一种玩意。如殷家园子街的龙灯；叶家园子的狮子、大头，十县胡同的小龙灯，其他街的高跷、花船等。在高跷队中有一种叫“独脚跳”的，扮演孙悟空，多是力大技

高之人，他们蹬着一根木棍能跳十几步。

元宵节除家家挂灯外，各十字路口还扎有灯棚。灯棚状如亭阁，四面糊以彩灯，有的镶以玻璃，上面绘有花鸟人物或历史故事。最引人注目的是朱府口灯棚，画的是《李老闷教书》李老闷是当时的私塾老师，闹的笑话很多。所谓“李老闷教书，学生打成一窝猪。”画的就是一套李老闷的故事。

当时的军政官员打着“与民同乐”的幌子，也随同群众观看。驻聊城的韩复榘的八十六旅也组织了一个高跷队，演唱《白蛇传》等节目，边唱边舞。他们不仅服装质量好，而且头上、身上装有手电灯泡，红红绿绿，闪闪发光，很受群众欢迎。

八角鼓是聊城唯一的一个地方剧种。殷家园子街一家姓王的父子均能演唱，常常几个人在空院子里演出，剧目有《两亲家顶嘴》、《王婆子骂鸡》等，通俗诙谐，引人发笑。

评书也是经常表演的一种形式。出名的有钱大喜，说长篇评书《三侠剑》，能言善说，把胜英等人物说得活灵活现。

夏天傍晚，群众习惯街头纳凉。大街小巷常有说书的，卖唱的；至于集、会上跑马卖解的、变戏法的、唱小戏的等等，更是美不胜收了。

解放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普遍建立戏院、电影院。电影已普及到农村各个角落，如今又有了电视。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每年元宵恢复了灯节传统文化活动。文化园地，百花盛开，群众的文化活动更加丰富多采。但是群众自发的、普遍的活动较少，应当大力提倡。有些失传的文艺节目，应当大力挖掘。愿我市文化事业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更加繁荣昌盛！

聊城泥塑、木版年画和蚰子葫芦

杨 道 田

一、泥塑亦称彩塑，是我国传统的民间雕塑工艺之一，发展历史可追溯到汉代。据山东省博物馆展出的陶俑证明，我国在汉代时，泥塑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流传在聊城的泥塑工艺，大致分为两种，即：大型雕像泥塑和小型儿童玩具泥塑。

大型雕像泥塑何时始于聊城已无法考证，据已故著名泥塑艺人纪刚生前介绍，早在清朝道光年间，他的祖师张安之（博平人）便在聊城从事雕像活动。张安之技艺高超，在造型、调色、上彩等各方面，堪称高手。他的门徒李振基（聊城蒋官屯人）继承业师技艺，造诣颇深，昔日聊城三宝之一的“玉皇阁”（音皋）的神像，就是出自张安之、李振基之手。清朝末年胥元祥（聊城胥王庄人）拜李振基为师，学习雕塑工艺，历经数年刻苦磨练，技术娴熟，身手不凡。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城内万寿观及其他庙宇的神像，多由他刷新和修复。民国二十年前后，纪刚、李英柳（城里小官人）二人拜胥元祥为师，学习雕塑工艺，迄今已相延四代。

大型雕像泥塑用料考究，工艺精细，需经多遍手续方可完成。首先用稻草或谷子秸杆绑扎好草人，再用麦糠与黄胶泥合成粗料，用料比例基本为六（糠）比四（泥），然后造

型，这道用粗料造型的工序称之为“抓粗”，待粗料造型干透后，用上一遍细泥，这种细料由黄胶泥、细沙、旧棉絮合成，这道较细致的工序称之为“稳像”。待细料造型干透便可进行最后的加工，先刷一遍底子色，这种底子色由水、白粉子、水胶调合搅拌稀释。水胶和白粉子的用料比例要根据雕像的季节不同而有所变化，若在冬季，一市斤白粉子需用水胶二市两，夏季一斤半白粉子用水胶二两，秋季一斤半白粉子用水胶数钱即可。底子色刷毕干透后上彩，根据雕像的面目、体态、服饰的不同，涂上各种颜色，经过这一道手续，一尊雕像便完工了，这最后一道手续称之为“定型”。进入民国以来，政局不稳，战乱不断，聊城的庙宇有的毁于战火，有的年久失修倒塌废弃。解放后这些庙宇遗址，多辟为居民区或改做他用，塑像活动基本终止。仅在十年动乱中，纪刚曾为聊城县阶级教育展览馆雕塑人像三十尊，还为阳谷县景阳岗雕塑《武松打虎像》一尊，别无其他活动。

小型儿童玩具泥塑属“马官屯泥人”，亦称“马官屯泥娃娃”。这种泥塑发展历史悠久，已有数百年。据泥塑世家的传人郑克勤介绍：“郑家祖籍山西洪洞县，先人何时迁来此地不详，捏泥人的手艺自山西迁来时就会，一代代地传了下来，往上已无法考查。仅知道是曾祖父将手艺传给祖父郑立井，祖父又传给父亲郑金香，我本人又向父亲学了这手艺，迄今已相沿四代。”“马官屯泥娃娃”小巧玲珑，品种繁多，从各种人物到飞禽走兽都可捏制，造型优美，古朴典雅，乡土气息浓郁，具有较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马官屯泥娃娃的制作过程大致如下：首先将运河西的红土用水浸透，再掺入“滑泥”（湾坑底的污泥，闲时挖出晒干，用时取），

拌上旧棉絮，用锤砸均匀即可使用，若捏制小动物或泥哨等，可直接制做；若制做较大的泥人或动物，需先制做“盔”（模具的前身），用沙土制做的盔晾干后，用锯由中间锯开，挖空内壁，打磨干净，便成了“子”（模具）。每个造型需一对“子”来扣制。扣制出的坯子晾干后，刷上用白粉子和水胶合成的底子色，底色干透后根据造型的需要刷上各种颜色，一件制品便完成了。若制做活头的泥娃娃，将娃娃头部与身子制成两节，用铁丝盘成弹簧，将头部与身子联结，制品完成后，放置桌案之上赏玩，只要轻轻一动，娃娃头便摇晃不止，引人发笑，别有一番情趣。活头娃娃做工精细，物美价廉，很受欢迎。聊城至今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即：“马官屯的娃娃——活头的。”说的就是以上泥塑制品。

旧社会泥塑艺人的生活十分不幸，他们多无房产亦无田园，在村头场边扎个草棚子既为制作工棚，又是生活之所。为了养家糊口，在这种条件下终日劳作，销售泥塑制品，要靠手提肩挑沿街叫卖，或用旧物兑换，被世人称谓“要饭的营生”。民国初年一个尺半高的“不倒翁”，可卖十个铜钱；小动物或小泥哨两个才卖一个铜钱。奔波一日所得无几，成年累月在辛劳贫穷的境遇中挣扎。解放后泥塑艺人们获得了新生，他们分得了土地、农具和房屋，生活有了保障。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和工艺美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新型的儿童玩具进入消费市场，这种小型儿童玩具泥塑制品营业性销售基本终止，仅在逢年过节或闲暇得便时，泥塑艺人们制做几个赏玩，馈赠亲朋等，故这种泥塑工艺仍在民间流传。1983年，泥塑艺人郑克勤制做了一组《西游记人物》（四人像），参加了山东省工艺美术品展览，获

得了好评。

二、木版年画亦称“木版水印”或“印花套板”，我国传统的刻版印刷方法之一。唐、宋流行单色印刷，明末发展为彩色套印。刻版印刷工艺何时传入聊城已无法考证，清末民初已较为盛行。当时聊城印制木版年画的店铺称谓“码子店”、“码子作坊”或“门神店”，县内有十处之多。城里的店铺集中在闸口以北古运河的西岸，较有影响的店铺有：

“五和祥”、“义和祥”、“顺和”、“同太”、“同顺”等，乡间还有“任庄”、“大赵”、“明王屯”、“堂邑”等处。

刻制印版需用纹里较细的杜木（杜梨树）或梨木板材。厚约三公分。先将各种图案描绘在版材上，或画在薄纸上，贴于版面，也可将刷印好的年画反贴于版面，然后进行雕刻。版材正面先刻骨头（眉眼及主要部分），版材背面再刻人物衣饰及次要部分，印版一套由三块印版（六面）组成。清末民初刻制一套印版需用三块银元，建国前后刻制一套印版需用九十斤小米。印版分为大号、中号、小号三种，大号版长约六十公分，宽约四十公分；二号版长约四十公分，宽约三十公分；三号版长约三十公分，宽约二十公分。刷印颜色共有六种，着色顺序为：先印黑青（紫），再印黄绿，后印红丹（橙色），刷印六次，版面即成。聊城木版年画，图案丰富，花样繁多，多达近百种。花卉年画有：牡丹、荷花、金鱼等。历史英雄人物年画有：秦琼、尉迟敬德、赵匡胤、三国人物等。神话故事年画有：封神演义、八仙人物、西游记人物等。吉祥年画有：五谷丰登、五子登科、麟麒送子、莲花哪咤、年年有余等。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年画有：

灶王、门神、财神、天地神等。建国后，聊城木版年画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新年画，例如：女民兵、解放军战斗英雄、科学种田等。

由大、中、小号三种印版，刷印的年画称谓“头边”、“二边”、“三边”或“头套”、“二套”、“三套”，各店铺自做批发和零售，春会、庙会、集市销售较多，新年、春节则是销售的黄金季节，除本地销售外，大多销往鲁西各地及河北、山西、河南部份地区。清末民初年画销售价格为头边一对(两张)三个铜钱，二边一对两个铜钱，三边一对一个铜钱。有时也根据市场行情临时而定。建国初，头边一对约貳千元(两角)，二边一对约一千元(一角)，三边一对数百元(数分钱)价格无定规，随市场行情而不断变化。

三、旧时，聊城人有蓄养蚰子(蝈蝈)的爱好。夏秋之季，将蚰子从田间捉回，放到由高粱秸或细竹篾编制的笼子里，悬挂在院内瓜架下或凉棚、窗棂前，听其不时发出清脆悦耳的鸣叫声。秋去冬来，将蚰子放进葫芦揣入怀中御寒，闲暇无事在房前街头晒暖，取出葫芦，让蚰子爬出，在阳光下抖翅嘶鸣，别有一番情趣。清末民初蓄养蚰子的风气甚盛，蚰子葫芦的销售量颇多，因此，种植、制做、销售蚰子葫芦的村庄、人员有增无减，大都集中在城关、阎觉寺、梁水镇三乡。例如：陈庄、郎庄、大杨庄、赵李王、小赵庄、拐李王、王辛、王家庙等。这一带多为沙土地，蚰子葫芦极易生长，而且壳质细腻松软，便于削刻。在众多的制做葫芦的工匠中，尤以郎庄的郎发敏(外号五和尚)、陈庄的陈金语、大杨庄的杨印台削刻的蚰子葫芦图案精美，刀法流畅，堪称佳品。凡经他三人之手削刻的葫芦，每只售价一块银

元，有时高达三块银元以上。价格如此昂贵却依然供不应求，登门购葫芦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故当时三人名扬省内外。

每年春季种瓜的时候，种植葫芦最为适宜，约在夏季三伏天成熟，每亩地可产葫芦四至五千个，将成熟的葫芦摘下，放到沸水里煮约一分钟捞出，堆放到一起，用葫芦秧盖上闷六至七天，扒出洗净晒干便可制做。聊城蚰子葫芦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圆形葫芦，凭其自然生成的形状制做；二是半圆葫芦，将葫芦从中间锯开，锯口处粘一薄木板，葫芦呈半圆状。制做工艺有两种，一是削葫芦，一是刻葫芦或称画葫芦，所用工具有：锯、画刀、刻刀、削刀、圆丈（圆规）等。制做削葫芦较为简便，先把晒干的葫芦，放到颜色锅里（一般为枣红色），沸水煮二十分钟左右，捞出晒干削制。用削刀在葫芦上削出各种花草鱼虫，浅削图案清晰，深削阴阳分明，红底白花，乡土气息浓郁，质朴美观。图案削毕，再在顶部用半圆切刀开一圆口便完成了。制做画葫芦，技术性较高，不但要有绘画技能，还得具备娴熟的刀法，二者缺一不可。画刻前先将晒干的葫芦，用食油和黑烟滓擦去污垢，然后直接用画刀在葫芦上画刻各种图案或戏剧人物等，画刻完毕再用食用油细擦一遍，这样既有光泽，图案也更加清晰。有一种画葫芦保持葫芦本色，古朴典雅，不失自然美。另一种是涂彩葫芦，将刻画好的画面，根据需要涂上各种颜色，色彩艳丽，图案鲜明，人物造型栩栩如生，更富有魅力，既可蓄养蚰子，又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销售蚰子葫芦除在本地外，主要市场在省内和南方各大城市。如：济南、青岛、上海、南京、开封、西安等地。大

杨庄逢集专有葫芦市，专做批发和零售。清末民初的批发价格一般为一斗（三十斤）麦子可买三个画葫芦，一斗玉米可买100个削葫芦。当地人到外地销售，每人可挑四至五千个葫芦，除去来回途中必要的开支外，可换回三担高粱或买回一头小黄牛，在当时这样的经济收入，对穷苦农民来说是相当可观的。

建国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蚰子葫芦的种植和制做终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承包责任制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大搞多种经营，蚰子葫芦的种植和制做逐渐恢复。大杨庄、王家店的民间艺人重操旧业，少量的削画葫芦已经销往济南、泰安、曲阜等地。

私塾回忆录

吴云涛

我上私塾念书是九岁，又念了二年“洋学”，高小也没熬上，就辍学了。那年我十六岁，是民国十七年。

这时，聊城城关和农村，官立小学还很少，私塾却很普遍，其制度、面貌，也大致相同。我上私塾时，每天的念书、写仿以及和老师、同学等的接触，种种生活琐事、塾中制度，想起来零零碎碎是不少的。追忆之下，写出一点，以作儿时旧梦重温，聊存旧时代私塾中片断资料。不过，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难求完整与具体。

一、延聘老师

过去的私塾老师，多半是前清中过秀才，没有得到上进，后来科举停了，家无恒产，又缺乏其他养家技能，只有走读书人最后一条路：教书。私塾的老师，有自己设个学馆来招生的，有被人闻名聘请而去某村某街设馆的，也有因老师闲着尚无坐馆之地，由几个友好，代为“约几个小孩”而凑合成馆的。这学塾，俗称为“馆”，也称为“书房”或“学屋”，当老师的去处（处，当“就”字讲，“担任”之意）一个馆，叫为“局”，譬如人问：“老师，那个局怎样？”意思就是所得束修的肥瘦，与宾东之间的情感而言。

如果一村中或一个街上，没个书房，有些适龄的孩子没地方可以念书，那就由本村本街老一辈的人，商量着请位老师来坐馆或由人介绍，或打听哪里有某先生学问好，而还未就馆，就专诚去聘请，写一个“关书”投递，这是应有的礼节。关书是用梅红纸裁成帖套，上写：“敦聘某夫子，来某村训海子弟，敬希不吝赐教”等类的话，下署某村领头的几位学生家长的姓名。这署名的几位家长，也就成为当然的学董了，老师答应之后，由学董们邀请打算上学的各个学生家长，聚到一块，共同商量“束修”数目。

二、束 修

“束修”，也称“学钱”，来自《论语》，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是指一捆（十条）干肉，原是古代用来初次拜见的菲薄礼物，后来，就把“束修”作为学费的名称了。这个词现下早已不兴了，但在民初到民国二十年以前的聊城仍通用。

学董们和各位学生的家长，把束修问题讨论定妥后，就列出个名单来，写明白哪个学生束修多少，总的数目是多少，给老师看看，是否同意？原则是年龄大的学生钱数多一些，“蒙学”（才上学的儿童）则最低，民国十五年以前，还兴铜元和制钱，币值单位是按“吊”说，大的学生束修，大抵每人一年三十吊，中等年龄的二十或二十五吊，蒙学的五吊、八吊。如果全部学生不到三十个人，束修总的数目，不会超过五百吊钱的。对老师来说，能维持三、四口人的生活。

束修数目虽是按学生的年龄大小，或念书程度商议而定，其中也要看这个学生家庭的贫富情况，酌予加减：甚至与其家长的大方与吝啬，也有关系。也有个别家长，他的孩子年龄本来不大，束修应当不多，而他却情愿多出几吊，这倒不一定是显示他的富有，而是寄希望于老师，能对他的孩子，格外费心一些。

学生的束修是按一年三节缴纳的。三节是五月节（旧历五月初五日端午节）、八月节（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年底（旧历腊月十五前后），每个节除了交给老师一部分束修外，还须给“节礼”，这节礼数目却是一样，一吊或五百文。

节前，老师派学生挨家去敛取束修和节礼；也有自动带到书房，面交老师的；当然，也有贫寒之家一时拿不出的，老师也不甚计较。

三、入学仪式

每年的正月十六日，正式入学授课。这一天，由每个学生的家长，领着自己的孩子，换上新衣服，带着书本，来书房入学，拜师（那时还不叫开学叫入学，大门外由老师写一个红纸长条是“正月十六日入学”），也有延至正月二十的，甚至到二月二入学的。

学生都到齐后，开始举行拜师之礼。每个学生，依年龄长幼，一个个挨着行礼。先向孔子牌位磕头，再给老师磕头。给老师磕头时，也是面向孔子牌位，由站在旁边的家长说句“给老师磕头”！老师站在一边，並不谦让。

拜师礼毕，学生就各归各位坐下，拿出书本摆在面前，等候授课。所有的桌子凳子，都是学生各自从家里搬来的。

这入学拜师的头一天，只举行拜师仪式，並不立即授课念书。拜完了师，就提前放学，叫孩子们都回去，第二天才正式念书。而众家长们却不走，随于当日公宴老师，从菜馆中喊来酒席，就在塾中摆桌设宴，请老师坐于首位，共同喝酒，並向老师敬酒布菜，说几句对老师尊敬、拜托的客气言语。饮宴中虽然谈笑风声，但要彬彬有礼，决不能有划拳狂呼之状。

请老师的酒席花费，是由家长们公摊，一桌两大件酒席，大约在十吊钱以下，不一定每个家长都拿，而由几个大点学生的家长负担。酒席不可太薄，要丰盛一点，显得对老师尊敬。

家长方面，也有个别单请老师的。他一人要酒席，不叫别人拿钱，也邀请其他家长作陪。这也是独自表示尊敬之心，寓有拜托老师对他家孩子多多栽培之含意，在入学后的几天中，老师常常被家长邀请赴宴。

四、号书与念、背、讲

从前，教私塾的老师教学生念书，比现在的学校老师上课，是较为费劲的，因为现在学校中学生，分年级分班，都是程度相等的，课本是一样，老师光按一种课本讲，学生授课是一律的，用不着个别教授。过去的私塾，就不那么简单了，一个学生一个样，就是同时念一种书，他们进展的效率也绝不一致，既不一致，老师就得按其程度，分别施教。这

样，一个个地教，一个个地费心。个中学生聪慧与愚笨，老实的，捣蛋的，不一而足，就够老师伤脑筋的了。所以，当个私塾老师，是真不容易，从前有句俗话：“家有三日粮，不当孩子王”，说明了老师之苦衷。

入学后，老师把全部学生一个个认清面孔和姓么叫么，并进一步了解，这些学生中，有几个是念了二年的或一年的，有几个是才上蒙学的，有几个是年龄较大稍为懂事的，有几个是念过上论或孟子的，有几个是一本三字经还没念完的。当老师的，就逐个儿因材施教。再从他们念书背书之后，体察每个人的天资和性情。真够麻烦了。可是老师们总是不怕麻烦，耐心地循循善诱。

“号书”。是指定这个学生，今天应念的书是多少，必须念会来背。这个“号”字，这里当作规定的指明的一个数目标志讲。从前在私塾，念的书本，都是木版印刷的五经四书，一行行竖排。那时，习惯地称一行书为“一趟子”，老师指给学生，从这一行到那页或同页的一行，也就是几“趟子”了。因而，老师常夸奖某个学生，一天能念几趟子，曰为聪明的孩子。所谓念，必须念熟念会，能以琅琅背诵才行。到背书时，一个一个地端着书本，到老师桌子前，把书本放到老师面前，转过脸去，朗声背诵。这时，全体学生都不可再念了，有时背诵中间，忘了下句，呆在那里，老师往往喝斥道：“看看”！于是回过头来，掀开书本瞧一下再往下背。有的看一回又一回，书太生了，把老师气急了，怒喝：“再念去”！学生就把书拿回自己位上，再念，再背。如果念不熟背不会，不准回家吃饭，或罚跪去念。

背书。那时是死记，並不知书中文字是什么意思。念会了那一行行的字，再背诵出来所念的字，就算交代了。因而，这叫做“数歌”。但背得快，忘得也很快。背书的规律是：念这本书，从开始，念多少背多少，一天或两页、三页，也就是十趟子二十趟子。当天要念会背熟，第二天再号生书，再念这生的，隔三天或五天，就连先前念的，带上生的统统再念，再背。一本书念完，还得“背通本”。把这一本书从头到尾要一气背完，逢“背通本”时，老师就把书中中段，或隔几页的某一章句，给你“提”出一句，你就按他所提之句，接着往下背。一本书，在学生背时，往前面提数次，就大大缩短了也减少了一本书总的数量，很快就能背完。

但是这种“提书”，老师也看这个学生背得怎样，是否真熟？如果背得歪歪踉踉、绊绊磕磕根本不熟。那么，“提”也不可能对应如流地哗哗背下去的。老师有时气极了，把书一掷，厉声喝道：“再念去”！学生只好从地下拾起书本，再归位死念死记，约摸可以再碰碰，又拿去背。如果三番两次地折腾，很有挨打的可能了。其实，背得滚瓜烂熟怎样？几天不念，还是忘得一干二净，因为这种“数歌”式地硬记，丝毫不明白念的什么，最容易忘的，脑子里没印象可言。

讲书，是老师按学生程度不同，年龄不一，而分别给他们讲深浅不同的书。如：有几个学生念诗经，有几个学生念论语，还有再小一点的蒙学念百家姓、三字经，那就把讲诗经为一组、论语为一组。更有《千家诗》，大点的学生都得念，讲诗也为一组。至于每个学生念的进度，容有差别，只要是已经念过，就跟着听讲，私塾中没有讲台，老师坐到他

座位上，书放在桌上，他按章按句地讲，学生一个个捧着书本，站在老师桌子前边听。在每天乍开讲之前，老师也经常提出已讲过的书中某章句，指名叫学生“回讲”，讲得好的，得到老师夸奖两句，不会讲或讲得错误的，必被老师斥责两句，甚至挨一巴掌。

老师讲书，也是看着书本，参照注解而加以使学生听懂的语言解释。却也条分缕析，颇为详尽。凡是讲书时，老师和学生，尽可能用另一种本子作讲材，如《诗经备旨》、《四书备旨》、《二论典故》等，比较注释畅晓，易于领会、和每天念的本子不同。

念书、背书、讲书，这是私塾中主要课程依次做出之三部曲，所收效果如何？另当别论。

五、作文与对对、写仿

民国后，私塾中老师教学生作文练习，已不甚讲究八股体裁，只是以“论说”为主了。学生念到四书以后，开过讲略得启迪，老师就叫作文，规定每五天作一篇，由老师出题，叫几个程度差不多的学生，都按这个题作。也就二三百字，要文言体，题目也很浅易，类似日记的叙述，也象写信似的口吻，並不要求对历史对社会，发挥见解和评论。然而学生们年龄最大的也只是十六、七岁，知识並不怎样开阔，事理也不甚理解，作的文章，幼稚可笑，自在意中。老师却也一篇篇给修改，纠其错解，导入正轨。改后，必逐篇给学生讲释，使其达到心领神会，有所进步。年龄再小一点的学生，就叫他们学习对句，俗称对对子。先从两个字试对，陆

续增加到五至七个字，对句必须懂得字音的平仄，对仗更要求工稳而恰妥，如天对地，雨对风，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松之类。也是五天对一次，对后送给老师看，老师如认为不妥，当时就叫拿回重对，并不加训斥。这对句，不要看它简单易做，也真不好应付，不熟读古诗、不记得自然界应有的常识，不辨平仄，别想对好。

私塾念书、作文、对对之外，更有一种重要功课是写仿。写仿就是练毛笔字。每天必写必练，除了幼童蒙学，大小学生一定要写，有大仿、小仿，也就是大楷与小楷，每样一张（称为一盘）。乍写是“描红”（老师用朱笔写成一个一个的字，交学生以红划笔顺而写黑色之字），描红熟了再写“仿影”（老师写一张楷书字如核桃，交学生复以仿纸，影透字迹，依笔划练写），写仿影又熟练了，再写“跳影”（老师给写一张隔一字写一字的正楷，由学生覆上仿纸，在每个字下空白之格，摹上边的字写一个），跳影写一个时期，摹仿得拿成个了，在老师指导之下，由自己所爱，性之所近再选择一种碑帖临摹。多为欧、柳体的《玄秘塔》和《九成宫》之类，小楷不外《灵飞经》及《赤壁赋》等帖。至于“颜鲁公”体的字帖，老师叫学《多宝塔》，不叫先摹《麻姑仙坛记》，他说那个帖浑凝雄健是有，但小学生学不了人家的神韵所在，倒弄得象一滩泥了。

学生写仿，哪能一致？有描红的幼孩，有学习不久的写仿影，有进一步的跳影，有更进一步的临帖，可谓五花八门，极为参差。每天每人两盘仿，都送到老师桌面，高高地一大罗。老师在“盘仿”（批改写的字，矫正不规则的笔划叫盘仿）时，把所有写仿的学生都叫到跟前，一个个指教他

写的仿，何处好何处错，并亲手写给他看，谆谆示范，循循善诱，可谓真尽到心，如果个别学生屡教不改，也是挨打不肯轻率放过。

当一个私塾老师，每天给学生教字、号书、讲书、背书、盘仿，这些事太够累心了。此外，还不少为这群孩子们淘气，多么艰苦的工作负担？和现下学校里老师相比，有闲有忙，还有假期，其劳逸情况真有天渊之别。

六、体 罚

私塾里，如果请个老师“很厉害”，好打学生，就称为好老师。也都赞称他“这个老师挺有规矩”。所谓“规矩”，就是指的性情严肃，教书认真，对学生动不动就施以体罚。

打学生的“刑具”是“戒方”，也叫“戒尺”，是用木头刮成的一尺多长二寸多宽一寸多厚的东西。它有边有楞，有的也加以油漆，光滑平整，多是枣木或槐木。

按古语，这戒方叫“夏楚”，夏楚是两个木名，古时拿它制为“扑作教刑”之具，以后相沿就成了教书时用以打学生的工具了。这戒方专打手心，狠狠地一下子下去，发出清脆的响声，打得学生鬼哭狼嚎，手心一会儿肿起来，有的连打十下子八下子，学生哭着叫着哀告求饶。老师发了怒时，几下不肯放，其他学生看得目瞪口呆，毛骨悚然。但是，我的老师，还没这么狠过。

据说，从前的“教官”（即一县中的“教谕”、“训导”，也叫“学官”），他们打犯错误的童生或秀才时，也用这样的戒方，可见这种“刑具”，是教育界“专用品”了。

除了戒方，是最厉害的体罚外，还有的恶老师，用藤子杆打人。那东西既柔且韧，抽到身上也够疼的。另外，干脆扇巴掌，打后脑勺子，或用竹批打脊梁（藤杆和竹批，似在民国后才有的，个别老师使用，以前没有）。

学生挨打，多数是因为捣蛋，打架或逃学，不用功念书。至于学生愚笨，冥顽不灵，气得老师也打，打也不行，则无可奈何了。

再有“罚跪”，也是私塾中常用的惩罚。背不会书，故意逃懒，或欺侮同窗，在外惹事，这类学生，不是挨打就是罚跪，也有挨了打再罚跪的。当年孔老夫子，对于教诲学生，是用温和慈爱的态度，向学生劝导，使学生对书本感到有意趣，启发他们自动地高兴地学习，这才是教育正确方针。光指望打，也是不行，因为使他们视书本为畏途，毫无爱意，哪可能收到效果？

千百年来，私塾老师打自己的学生，为天经地义的施教手段，这是残酷无情的办法。自私塾废除后，这体罚种种，也就随时代而消失了。

七、假 期

如今，无论大中小各类学校，都有不少的假期。如暑假、寒假、节日假、星期天等，一年中的假期真多。从前的私塾，一整年也只有几天假的规定。就是五月端午节、八月中秋节，各放一天，此外，清明节也放一天，如逢到近处有庙会唱戏，也放半天叫孩子们去欢乐欢乐，并没有什么星期天。

到年底，多数是腊月十五日就散学了，这是年终的总的放假。但是老师来年是不是延聘下去？还说不定，所以也不能称为“假”了。这一天，几位学董或学生家长，多是来塾和老师作别。寒暄客气一番，也备点酒宴，作酬谢老师辛苦，也含有饯行之意。同时，也和老师定下明年是否延聘之口头协议。如果老师不愿在这里教下去，也就在这一天向学董们婉辞了。

在平常日子里，老师如若家中有事，须要耽搁一天或两天，那也不放假，就把每个学生，都给号上书和写几盘仿，吩咐大点的学生，代老师执行职权、背书。老师回来后，再加检查。至于每天的上学和放学，没有什么时间规定。天天一清早上学，到饭时放学。晚上放学回家吃饭后，天也就黑了，根本没有钟表作标准。

在书塾中，正冲当门的墙壁上，由老师写的一个红纸牌位，贴在上面，上写“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学生每天三次的学习、放学，一进门，必向这个牌位作个揖。来者有先后，各人作各人的，不必都集体行礼，也就是匆匆一拱手，并不严肃庄重，视为每日惯例。这个红纸牌位，长约七寸，宽只二寸，孤零零贴在正中，虽不起眼，却是我们读书人最要崇拜之偶像，称为“老夫子”，谁也不敢有冒渎言语和举动。

八、“出恭签”和“摊公单”

私塾的屋子内，大大小小的孩子，好象是一群被圈禁的小绵羊。一进屋就不准随便出来，即使在屋里不念不写之

时，也是各人坐到各人位上，不许任意交谈或离位走动。你想，这些幼稚的年龄都不甚大的一群孩子，成天价闷在屋里，有什么法子可以疏散一下这窒闷的空气呢？那就是“上茅子”（厕所）为唯一可资活动的机会。

上茅子的目的，应当是为了要大小便，但是学生的意图，就不一定是真个大小便了。往往並沒有便解的要求，也藉这机会走出一次，以舒畅一下心怀。

塾中有两根“出恭签”，是木板削成的。长一尺半，宽三寸。上写“出恭入敬，不许並行。”另一面写：“如有故违，拑十夏楚。”谁要上茅子，如果是大便，便拿大点的那根签，小便就拿小的。这是规定学生大小便时，所持之“准许证”，但也要有限制，一天只可出去二三次，去多了就不行了。因此这签成了学生竞取之物，总是闲不住它。因为这，大便就叫“出恭”。

虽然“不许並行”，但两支签总是两人各拿一根出去。也算“合法”的，老师也睁一眼闭一眼，不甚认真喝止。两人碰到茅房里，即是真个大便或小便，也是有意地多捱缠一会子，玩一玩再上屋去。因为那时书塾只有男生，女孩子根本不兴上学。

有的爱捣蛋的孩子，从茅子里捕一只苍蝇，偷偷地握在手心里，回到他位上，再偷观老师不注意他时，把蝇子屁股上，插上小小纸条。让他飞出。看那蝇子带着白条儿，在屋子里东撞西碰，十分有趣。如果被老师看见而加以追查，或被别的同窗有意找你麻烦，而禀告老师，那必得挨打的。但是，夏天里，孩子们没什么赏心悅目的玩物，都好捕捉苍蝇玩耍，也不知洗手，弄得肮脏不堪。

一处书塾中，大小小学生，多的有二三十个。他们家里，一年之中，说不定谁家有喜丧大事，遇到同窗的这类事时，都要以全体名义送礼。多是送一架幛子，老师给写写，送了去。花多少钱，每个人均摊，这叫“摊公单”，也有的地方叫摊份子。到时，一齐去贺喜或吊唁，随即坐席吃他一顿。当然，小孩子是没钱的，都回家向大人要。

学生的家庭中，有婚丧事时，礼貌上，也必须来请老师，去襄助应办的事，或去陪陪亲友，这也是当老师的情不可却的应酬。有的发丧之家，请老师去“点主”，或担当“执客”等职务。所以，当个私塾老师，你必须会给婚丧大事择日子、写帖套；或地亩文契。写民间种种应酬的文字之类。如不懂这一套，人家疑你有架子，请不动，或认为没学问，连个帖子也不会写。那就有不必要的误会发生，而造成来年解聘之虑。

旧日的私塾制度，可以说是一时代的社会面貌和民俗，今虽已废除多年，也应保存它的纪实资料的。

三师的学制改革与女子部的创设

侯 朝 完

1923年，美国哲学家杜威，教育家孟禄，心理学家桑戴克等来华讲学，引起我国的教育改革，师范由五年一贯制改为分前、后期两段的六、三、三制。前师毕业，须经入学考试才能入后师。是年聊城三师将一、二、三年级改为前师；四、五年级改为后师。并于是年创设女子初级师范部，招收第一级。这是鲁西女子教育的一大创举。1926年女子师范第一级毕业，招收第二级，优秀生张淑贞、受志超留校任第二级的教员。1929年，第二级毕业，有的就业，有的考入后师，有的参加国民党举办的党务训练，此为鲁西女子思想解放和参加社会活动的一里程。是年实行男女合班，女子部结束，改为女生宿舍。1930年自后师五级起，实行文理分科。文科约五十人，理科不到三十人。后理科班升大学者达十人之多，文科班无升大学者。然而三师毕业生，多为鲁西各县的教育骨干，对地方教育事业及文化之发展，贡献很大。

在山东省立第二中学的片断回忆

(1921—1926)

金 志 远

山东省立第二中学校址在聊城城内孙家胡同路北，启文书院旧址。校长郭宝珍，字珠泉；学监（相当于副校长）曾仲芳，字兰斋。1921年郭校长当选为京议员，暑假后由王之鉴接任校长，学监为李紫垣，学生共七个班。最高年级是12级，最低年级是18级，学制四年毕业，称为旧制中学。1938年阳谷抗日小学校长高汝藩就是17级的学生。七班学生中15、16两班是同年级，17、18两班是同年级。1922年暑假12级毕业，19级新生入学。著名的聊城烈士赵以政、聂子政都是19级学生。当时在秘密时期，谁的身份也不暴露，这是过后才知道的。16级的申兰生、17级的杨耕心都是共产党员，阳谷坡里暴动的骨干人物。19级是按旧制班序排列下来的，一学期后便改为新制第一级，旧制18级便结束了。

1923年王之鉴校长去职，由李鸿庥接任校长。李鸿庥，字允升，恩县人，他写的一笔魏碑字很出名，在聊城留下了不少墨宝。学监翟耀奎，聊城北杨集人。这年招的新生便是新制第二级了。新学制是高中三年，初中三年，二中旧制终于17、18两级，新制始于19级。1925年17、18两班毕业时，校方征求学生的志愿，欲毕业者发给旧制毕业证书，不

欲毕业者，仍在本校学习，改为高中一年级。由于当时欲上高中者不多，不能成立高中，校方就把这些欲上高中的学生介绍到山东大学高中部去了，从此二中成为初级中学了。

笔者是当年20级学生，与19级是同年级。当年同学均是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人，生气勃勃，活跃非凡。如聊城著名共产党员任月恒烈士是我们的同班。还有考入广东黄埔军官学校的申洪序、顾时清等人。解放后，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李俊昌，浙江大学英语系教授薛德昌也都是二十级的学生。

二十级同学多是勤奋好学之士，当时曾由魏普泽、金永昌等组织的聊城趋新英文社，聘请聊城英美烟类公司李麟台先生为教师，学员二十余人，夜间上课，风雨无间，为聊城唯一的英文学习班。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昌政法》曾将该社情况刊登出来，并予表扬，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影响，也是二中的一大光荣。二十级学生周文麟、丁述铭组织的励学社，乃该班国文爱好者的学术团体，每月选择优良作文出版《励学》一册，分送老师及同学批阅，在学校中起了良好作用。

回忆我们在二中时，有两位国文老师是受人敬重的，一个是孙固，山东武城县人，前清举人。他精通四书五经，学识渊博，讲书时引经据典，堪称古典文学专家，颇受同学们欢迎。在他教导之下，毕业学生均是文理通顺，升学时多是名列优等的。一个是陈贯路，江苏省人，他写的文言文和白话文都很出色，当年他曾写有关聊城杨大安家出殡的一篇文章，传诵一时。其结论指出：杨家大出丧，轰动了万人观赏，可谓阔矣，殊不知杨门乃为封建世家，其财产是从农民血汗中得来的，为了出丧如此铺张浪费是不得人心的。由于

此文写得出色，抄传者大有人在，二中师生拍手称快。

六十年前旧事重提，不当之处，至乞教正。

李一

回忆山东省立第二中学

(1935—1937)

邓 槐 余

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前身是东昌府启文学院，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改设为东昌府官立中学堂；辛亥革命后，1914年全省调整后定名为省立第二中学；1933年秋改称省立聊城初级中学，是我省一所颇负盛名的学校。

一

我入聊城中学校较晚，已是第十八级了。当时全校共九个班，计三个年级：三年级，十五级三个班；二年级，十六级两个班，十七级一个班；一年级十八级三个班。所开课程，初一设国文、英文、公民（又称党义、三民主义）、算术、代数、历史、地理、植物及体育、音乐、美术课；初二增设几何、化学、动物、生理课；初三开设三角、物理等课，所用教材，我级除英文选用中华书局出版之《初中英语读本》外，其余的均选用商务印书馆之初中教科书。有的科，教师还自编讲义，如国文科增补一些古文和中外名著，动、植物科另编讲义等，这些讲义都是毛笔楷书石印的。

当时，学生把这些课程分为“大三门”（即英文、国

文、数学)和“小三门”(即体育、音乐、美术),每日上六节课。“大三门”每日都有一至二节,学生晚上两节自习多用于演数学题和读古文,早晨一节自习一般是读英文。

校长是郭锡九先生,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政协秘书长、教育厅副厅长。下设教务、训育、总务三处。教务主任肖伯青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威信很高。训育主任张廷扬,总务主任彭佩秋。教师均系大学毕业,多是当时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所谓“六中(菏泽)、北大、哥伦比亚”的派系。语文教师有张洪远、薛教泉等老师。张老师曾受教于鲁迅先生,经常选讲鲁迅先生的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学生读鲁迅等革命作家的著作蔚然成风。数学教师有张俊卿、程××老师。张老师所教几何,深受学生欢迎。英文教师有范芾亭、彭佩秋、慈佑亭老师。理化课由张××老师担任。王亚元、楚西峰老师分任地理、历史课。张循卿老师任动植物及生理课。赵洗尘、边宗岷、乌心铭老师分别担任体育、音乐、美术课。训育主任张老师兼教公民课。

教师的月薪在当时是很高的,以课时计薪,每课时一元二角五,每个教师月薪均在百元以上。按那时的物价计算,学生每月伙食费仅三、四元,因此要取得二中教师的职位是很不容易的。

由于学生重视“大三门”,所以英文、语文、数学老师受到尊重;“小三门”老师不被学生重视,尤其是教学质量差的老师,经常受到学生们的嘲笑和奚落。如教动植物的老师讲课平淡乏味,照本宣科,学生非常不满,每次上课时秩序极乱,学生大声喧嚷讲不成课,常常气得老师愤怒而走,再被学生拉回来。有时学生还恶作剧,在他大褂后面挂上“此处

不可小便”的大纸牌子。老师只有装聋作哑；无可奈何。可是有的“小三门”老师却受到学生欢迎。如担任音乐、劳作的边老师上课时秩序良好，因为他能迎合学生心理，深知学生爱好。上课开始总先讲一个笑话或小故事，把学生的情绪吸引过来。学生喜爱京剧，便在音乐课教唱京剧。我班曾学过《俊袭人》、《捉放曹》、《法门寺》、《霸王别姬》等剧一些唱段；学生喜爱电影插曲，便教什么《渔光曲》、《大路歌》、《月光曲》等歌。特别是劳作课更给学生以“实惠”，如做雪花膏，把原料配制方法告诉学生，然后当场调制，分给学生，每人一包。再如竹工做二胡，先让工人将竹筒、梁子按尺寸做好，学生只要用刀子、砂纸磨平、凿眼、箍上蟒皮，把它安装好即可使用，学生皆大欢喜。如果有学生嘲笑或奚落他，他会变着法子教训这个学生。有一次，一个学生作诗骂他“边黑子”，他不动声色，讲了一个故事：有几个人走上西城关帝庙，看到庙宇雄伟，诗兴大发，使用粉笔在墙上写道：“四梁八柱”，怎么也想不出第二句来，忽然看到关帝身旁持刀而立的周仓，满脸黑胡子，于是又想起一句，可怎么也押不上韵，便勉强写道：“周仓有户”（注：户者胡也）。后来另一游人看见，提笔补上两句：“不会作诗”，“倒来放铺”（注：铺者屁也）。老师一本正经，这学生哭笑不得。学生普遍反映：“边老师训人厉害！”

总之，教学质量高的老师受到学生的尊重；反之则毫无威信可言。纵观聊城中学办学谨严，教学质量很高，因此升入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较多，形成了三师附小——二中——三师的一个升学的阶梯。

二

聊城中学学生的课外生活，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有趣的。操场在教学大楼前面，设有篮球、网球和排球场。开学时每个学生缴纳体育费一元，每学期发给各班篮球、排球各一个，每月发给网球两个。除上体育课安排各班学生活动外，课外活动时，因场地少，这些球场多被“球迷”所占用。大多数学生还是在教室、宿舍里学习和游戏。

学生自办刊物《青鹤》文艺月刊，为大32开铅印本。当时进步与保守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同学们踊跃投稿挥笔论战。进步学生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之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呼吁抗日救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当局的不抵抗主义；而另一方则主张读书不问政治，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提倡“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双方在刊物上展开了强烈的思想论战。不少学生热爱业余创作，各报刊杂志发表者甚多。

聊城中学学生来自鲁西各县，生活在学校，既无家室之累，又无断炊之忧。不少人精力旺盛，无处发泄，学习之余做出许多有趣的事情，至今使人回味无穷。仅举一例以博一笑。有一天各厕所门口出现了粉笔抹描的对联，上联是“进门来慌慌张张”，极写便前紧张慌忙之情；下联是“出门去稳稳当当”，画出便后怡然自得之态。横批是“先拉后擦”。这本是人人如此、天天如此之事，写来更觉诙谐有趣。

学校虽然是男女合校，但是仍存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残余思想，男女学生一般不相交谈。下课后，女生便回“女子部”，很少和男生接触。聊城中学女子部设于操场东头一个小院内，除有一个女职员看管外，还有一个老头守门，严禁男生入内，学生称之为“老太监”。我们男生在校数年，不识女子部“庐山真面目”，感到非常神秘。女子部虽然“戒备森严”，但也出现过多次男生跳女子部的丑闻。

不记得聊城中学有无学生会组织，只记得各县组有同乡会。每年聚餐一次，印发“同乡录”，经费由学生摊派。

三

1935年“一二·九”运动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提前一个月放寒假。当时我才十一、二岁，记得正在教室学习，忽然一阵紧急的铃声，随之体育老师在楼下吹哨集合，等各班同学在操场集合齐时，老师们已聚集在面前。他们表情非常严肃，看来形势非常严峻。校长郭锡九先生沉痛地讲话，大意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实行自治，形势紧张，政府当局决定学校提前放寒假云云。讲话很简单，高年级同学同仇敌愾，义愤填膺，但无可奈何，只有背着行李各自回家。而我们这些年幼的小孩子对提前放假还有一些高兴呢！

事后才知道，国民党政府当局为了防止学生运动事态扩大，蒙蔽学生，瓦解分化学生，以放假来阻挠学生运动的发展。就这样，全国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聊城象一潭平静的湖水，没有掀起大的波浪。

第二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从蒋介石被扣到释

放，引起全校师生的极大关注，当时的报纸讲的都是张学良、杨虎诚的背叛。国民党政府当局极力封锁张、杨在中国共产党争取下要求抗日救国的正确立场。以致有的老师上课时竟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说什么“蒋委员长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痛斥张、杨二将军的“罪行”。直到蒋介石被释放之后，学生还不明白事变的事实真相。

1937年“七·七事变”，学校已经放了暑假，紧接着聊城上大水，洪水泛滥，一片汪洋；日寇侵略铁蹄踏进华北。国土大片沦丧。这时，校长、老师纷纷南撤，学生与学校失掉联系，学校便自行解体了。谁知这正是师生的永远诀别！

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办学数十年，对鲁西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为革命事业输送了大批干部。我虽然在二中只上了两年，但是在文化上给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每次走到二中前的街道上，总是想起教育我的师长们，一种尊敬的心情油然而生；同时也非常怀念和我一块学习和生活的校友们，衷心地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民国中期聊城学校教育琐记

胡国典

父亲和我，两代人都从事教育工作，回忆过去感受较深的几个事例，信手写来，以供参考。但由于水平所限，错误之处难以避免，希予斧正。

一、尊师爱生

尊师爱生是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学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优良风尚至今仍在延续着。

早在二十年代，父亲先后执教于本县模范小学初级班（地址在县城东北隅县文庙内，即现在的四中）及东临道立模范小学（地址道尹公署东邻，现地区粮食局）。由于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加之先父对学生的爱护和严于要求，当时所教学生，都在童年，时隔数十年后，虽然他们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甚至大学毕业，在社会上有了较高的地位，但未忘掉自己的启蒙老师。每逢年节，师生之间相互邀集一起，畅叙衷情。

由于师生亲密无间，而学生的家长对待老师也是尊敬与信赖的。如学生家庭遇有难以排解的纠纷以及婚丧嫁娶之事，都要邀请老师去商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家尚存有学生送给先父的纪念品。

尊师爱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强调尊师不爱生不

行，只爱生不尊师也不行。但是爱生是前提，而爱生也不是对个别学生的偏爱，更不是感情用事，为教师的要真象园丁那样，对幼苗做到普遍施肥、浇水、修剪，使其茁壮成长，达到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启蒙教师是这样，中高级学校的教师更应如此。记得在1935年前，我就读山东省立聊城师范时，有位国文教师吴天石，他学识渊博，教学态度认真诚恳，又严于要求学生，在学生中威信很高；而另一位教师胡凤来，不学无术，教学又不认真，就遭到学生的反对，并给他编了个顺口溜“胡适胡适之，胡来胡凤来”加以嘲笑，以上事例，说明了尊师爱生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聊城过去学校教师的薪金（工资）情况

过去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生活，总的说来是艰苦的，小学教师的待遇更低，以三十年代为例：农村初小（村里的单级班）教师，月薪仅七、八元，当时高粱每小斗（约十斤左右）为一元，小麦每小斗（约十一、二斤）约一元一、二角。县立高小，高级班教师月薪：城镇二十八元，初级班教师为二十三元；农村高小高级班教师为二十六元，初级班教师为二十一元，属于省立小学（如省立三师附小）教师的薪金高于县立小学教师的二倍还多，月薪约在五、六十元。而县立中等学校教师和省立中等学校教师的薪金差距尤大。如县立师范讲习所教师月薪约三十余元，而省立第三师范教师的月薪，国文、数理化教师月薪最高，约在一百余元。音、体、美等科教师月薪为七、八十元。省立二中（因是初中）教师的薪金，月薪稍低于三师。

当时薪金标准，主要依学历而定，如系名牌大学毕业（北大、北师大等）薪金就高；如系私立大学或省立专科毕（如北平的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上海的东亚体专等），薪金就低，但也不绝对化，如确有真才实学，教学成绩卓著的教师也能高些。不过省立中等学校教师，必须具备大专学历，否则是不被聘任的。

隶属县的中小学教师的薪金标准，也要看学历，县属中等学校教师，起码得是后师（即现在的中师）毕业，高小教师多为后师毕业，初小教师的学历就不很严格了。

三、聊城过去各类学校的任人制度

聊城当时教育行政人员，如县教育局（科）长、主任督学（后改为视导主任）等，是由省地方行政训练班公开招考与培训的。该班规模庞大，分设财政、建设、民政、教育、秘书等班，专为培养县级各科局主管人员而设的。教育班凡具有师范（后师）学历的均可报名。考试录取后，经过一年或半年培训，由省教育厅直接任命到各县任职。省立中等学校校长也由省教育厅直接任命，不必经过培训，但须具备大学毕业学历。而县属各类学校的校长皆由县教育局（科）委任（县属中学，师范校长须呈请省厅备案），教师一般由校长自由延聘，延聘期为一年，每学年结束后，留任的发给聘书，否则即为解聘，但也须报请县教育局备案。一般情况下，只要校长不更动，教师是不会更动的。值得一提的是，在鲁西北十几个县里，上自教育局（科）长，下至小学校长、高小教师，绝大多数是第三师范毕业的同学。省立三师、二中的校长不是北大、师大，就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教师清一色

是他的同学或亲朋故旧。校长离任后，即使是有威信的教师被挽留，也要随原校长而去。

四、过去聊城教育界的两大派别

就我所知，聊城在二、三十年代，按地区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是以李诚之、李祺增、齐玉祥为首的西南乡派，当时西南乡沙镇四周的糖坊、孙丰、李海、丁楼、李知州等村文化人是比较多的，如留美学者曾任过省立三师校长、省教育厅督学的孙清晨先生就是孙丰村人，另一派是以刘慕韩（于集乡林庙村人，任过教育局长多年）、哈弼臣（哈庄人）等为首的东南乡派。东南乡的孙堂、军屯等村的文化人较多，如军屯的聂湘溪先生在民国初年就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西北乡的阎寺、玉皇庙、庞庄、刁庄文化人也不少，如齐子桢、庞伯华、吴化臣等知名人士，他们多追随西南派；东北乡的孟营、王洪穆等村文化人也不少，如王东瀛、张介甫、张协三等先生知名度都很高，但他们基本上属于东南乡派。两派的力量旗鼓相当，人员都不少。而城关的教育界人士也不在少数，如叶戟门、邹性纯等都是从事小学教育多年的老校长，对上述两派持中间立场。

另有南乡的老韩庄、五乡杜等村，在教育界素负重望的杜坦之、杜竹屏等都是民国初年教育界的耆老。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又有一位高层人士杜毅伯先生，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历任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教务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职，又和当时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为莫逆之交。因而聊城教育界各派人物均以杜先生的马首是瞻。

记山东省十三联中沙镇分校

王文昭

我原籍莘县城关镇朱庄。1940年夏，听说北边30里外的齐子修统治区——聊城西部沙镇以北的白堂村，办起了一所“山东省十三联中沙镇分校”，办学的都是国民政府老中央的人，而且正在招生，于是欣然前往应试，很快被录取入学。

这个学校在齐子修部邵旅盘踞的白堂村围子里。校舍设在围子的中间路南路北十几间民房内。有一二十个教师，校长是莘县的李瑄卿。我去时已招收了两个初中班，一个师范班，两个小学班，学生大部分是聊城、莘县、阳谷、堂邑、朝城几个县的。考上的学生一律住校管吃。学校除凑了若干套桌椅外，没什么设备。教科书也不全。英语、算术两人一本，语文印讲义，其他课都是抄笔记。教师全都是聊城三师刚毕业的学生。如丁普泽、丁广恩教地理、音乐；王乐明讲语文，李振之教算术，李瑄卿教英语，教年训的是崔冠一。

我乍考入中学，庆幸、新鲜感，是可想而知的。入学后第二周的一个阴雨夜晚，只听一阵机关枪声，一排手榴弹响，围子被八路军攻开，我们这些住校的学生成了俘虏，可怪的是俘虏群中老师一个不见，也没一个士兵、军官。我们顺从地背起自己简易的行囊跟着八路军朝东南方向摸黑走。天明到了聊城西南辛城海住下。在这里，阳谷八区区长王筱湖给我

们讲话，大意是，把我们俘来，是为抢救我们，争取我们革命抗日。从这里出发时，把全部小学生和初中部的小个子都放回去，连邵旅长的少爷邵冠文也放回去了。初中、师范班的大个子学生全部跟八路军当夜过封锁沟（聊城——东阿）到达当时的冀鲁豫四军分区学习。

学习的主要材料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晚上行军跟随军分区的教导队，生活上特别优待，八路军战士吃小米饭，我们吃白馍，菜里油少了首长还批评司务长。分区司令员刘致远许诺我们成绩好的保送到延安上抗大。

共产党八路军就是这样热情地抢救争取我们。惭愧的是我们这些学生思想僵化，正统思想太浓重，又看到当时解放区狭小，活动范围以聊城、东阿交界处的在桥、大白庄校场堡为中心，方圆不过二三十里。聊城、铜城的日伪不断“出击讨伐”，因此从6月到8月，经过三个月的政治学习，最后只留下两三个人，其余二十几人（我也在内）都在黑夜行军中可耻地开了小差。

1941年春，十三联中沙镇分校又在聊莘交界处李家安头村复了学。这时的联中小学部砍掉了，又添3个师范班。春节后，我也回去复了学。这年是大歉年，在齐子修的头目王魁一的统治下，黑窝窝也吃不饱，勉强维持了一个学期，原来的教师班子都饿散了。7月，聊城的日军组织了一万多日伪军扫荡齐子修。齐子修被打垮，树倒猢猻散，十三联中沙镇分校也随之“寿终正寝”。这个学校前后维持了不到一年。

在瓦砾中建起的聊城郁光小学

(1949. 7—1951. 2)

邓 愧 余

解放后的聊城，饱经战争创伤，城关大街小巷到处残垣颓壁，一片荒凉。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重建家园。1949年7月，在原聊城省立二中旧址一片瓦砾中建起了聊城郁光小学。

聊城郁光小学，1951年2月改为聊城师范附属小学，旋改为聊城实验小学。文化大革命中又易名聊城五七小学。现仍沿用聊城实验小学校名。当时是聊城专署作为本专区唯一的重点小学建立的。配备区级干部，阳谷县教育科长崔墨林为校长，寿张县教育科长王子兴为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后由莘县老区模范完小校长李修如任校长，邓愧余任教导副主任（无正职）。教师多系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和思想进步、有较高水平的青年教师。如朱蕴珠、张冰如、宣通甫、林彬、翟绍庚、陈道中、钱邦梓、王梦春、孙先修等，都是学有专长，认真负责的教师。全校招收学生1至6年级十余班（有的年级为甲、乙两班）。学生经过严格考试入学，基础较好。当时入学的学生毕业后，先后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不少成为各方面的领导干部或骨干力量。如马登昆、向椿、白万全、于廷璧、郑立成、冀永振、曲授廷、李

正荣、李连生、任保敬、滕士笃、王百魁、向文秀、汪士荣、杨兆荣、姚型河、靳淼等。聊城郁光小学办学不到两年，为以后的小学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劳动建校是全校师生的第一课

聊城郁光小学是以拆除万寿观之旧料修建的，共修建教学楼两层各13间（两边用作教室，中间为教师住室兼办公室）、西院幼儿园3大间，校门内传达室东、西各2间（用作教师住室）及楼后两屋3小间（用作总务室）；西院原聊城二中留有教室两排，前排作教室，后排为学校办公室、教导处和校长室。

各年级开设的课程大致与现在相同，一律使用新华书店出售之教材。当时，在教学上还未推行苏联教学法和五级分记分法，仍沿用过去之注入式，但已开始提倡启发式和联系实际进行教学，并向学生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专署领导非常重视这所学校，教育科夏子凡科长经常深入各班听课，并多次组织全区各县小学校长前来参观和观摩教学。他们到来只以白水招待，没有繁文缛节的送往迎来。由于教师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老解放区教育经验，教学效果比解放前有着显著的进步。

学校是在一片瓦砾中建立起来的。在“教育结合劳动”的号召下，劳动建校便成了一门十分突出的课程，每日下午课外活动，全校师生便拿起铁锹、镐头干起来。整整一年，教学楼前修起了宽敞的平台；平台下修起了操场，平整了校院。在平台东头，破砖烂瓦堆起一座高三、四米的土山。待学校初具规模后，便开始了填洼平坑的零星劳动。因为校院

大，这一任务仍是相当繁重的。

劳动建校是全校师生的第一课。通过劳动，全体师生受到了艰苦的劳动锻炼和生动的劳动教育。他们的皮肤晒黑了，手掌磨厚了，但是改造了教师轻视劳动的思想，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的习惯，使全体师生真正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意义，初步树立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可以说，在思想上的收获是巨大的。

二、教育服务政治，师生走向社会

解放初期，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大力恢复国民经济，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使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需要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教育为政治服务，学校师生便是社会宣传活动的主力军。

学校中每个师生都是宣传队员。为了更好地进行宣传工作，组织了讲演队、歌舞队、秧歌队、腰鼓队、花棍队以及演出队。学校的课外活动就是围绕以上政治宣传任务组织进行的。因此，每日下午，课外活动除劳动建校外，便是各队的排练。整个校园锣鼓声声，歌声阵阵，全校一片欢腾。

学校本身的宣传鼓动工作亦是及时、有效的。黑板报辟有时事栏、学习栏、文体栏、卫生栏和表扬批评栏，及时报导学生学习和各项活动情况。此外还有土广播、壁报等多种形式相辅相成，从而提高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为保卫祖国、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进行了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全国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为配合这一政治运动，学校书写巨型宣传匾牌参

加全县组织的大会和游行，是很引人注目的。到街上宣传，除演讲、文娱节目外，滕世笃、任保敬自编自演的活报剧，形象地刻划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很受群众欢迎，至今使人记忆犹新。

教育为政治服务，师生走向社会，是当时学校教育的又一特点。在这方面，聊城郁光小学曾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三、艰苦创业，勤俭办学

解放初期，百业待兴，诸多需款，教育经费短少，教学设备缺乏，这就必须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艰苦创业，勤俭办学。

全校师生除全力以赴进行劳动建校外，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解决教学设备缺乏的问题，学校领导便发动全体教师，人人动手自制教具，并掀起竞赛活动。如各科教学的图表、模型、标本、地球仪以及实验用具，特别是幼儿园多种多样儿童活动器械和玩具，都是教师们亲自设计制作的。当时，专署教育科特地在郁光小学举办了小学自制教具展览会，组织全区小学校长参观，受到领导表扬，不少教师个人获得教具制作奖。《平原教育》发表了李修如、邓愧余所写的专题报导，并发表了邓愧余所写的《这支钢笔应当给谁？》等文章。

1950年，学校组织了秋季运动会。当时只有一个篮球，无任何体育器械。师生自己动手平垫操场，自制划线器画出球场及竞赛场地。除赛跑、篮球比赛外，如提瓶竞走、三足竞走只是用几个空瓶子和几条带子罢了。没有电，土广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广播组师生用铁皮制成的话筒及时报告竞

赛项目、各项成绩及好人好事，还有锣鼓队、啦啦队助威，把运动会办得热火朝天。

学生学习也是非常艰苦的。每天天不亮便上操，晚上自习是每人一个小油灯，煤油的烟气弄得整个教室昏蒙蒙的。至于教师晚上备课、修改作业也是几个人围着一个罩子灯而已。师生粗衣粗食，生活是极为俭朴的。

解放初期，在瓦砾中建起的聊城郁光小学缺乏教育经验和教学设备，是不能与当前小学教育所比拟的。但是，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方向，劳动建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应当发扬光大的。

我区最早的函授大学

——记聊城地区高师函授教育

(1956. 7—1966. 7)

邓 愧 余

建国初期，我省中等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为适应中学教学需要，培养提高中学师资，山东师范学院于1956年开办高师函授教育，首批招收中文、化学、生物函授专修班函授生；1957年增设数学、地理、物理专业；1958年再设政治、教育干部函授班。同时，设函授部，协助院长领导函授教育工作。1959年山东大学也设函授部，开设中文、数学、历史、生物、物理、化学高师函授本科；之后，曲阜师范学院及各地、市师范专科学校相继开设中文、数学函授专科；山东师院所设专业一律改为本科。为加强我省高师函授教育工作领导，山东省教育厅决定由人事处于介基处长统一领导这一工作。

聊城地区于1956年7月建立山东师范学院聊城专区函授教学辅导站，设于聊城师范内，由所在学校校长兼任主任，邓愧余任专职干部，具体负责本区高师函授教育工作。1959年后改由山东省教育厅领导，易名山东省高师函授教育聊城专区教学辅导处，增设干部1人；并在所属县、市设辅

导站，各配干部1人。辅导处先后设于前聊城师专和专署文化局内，由所在校、局领导人兼任主任。1959年我区区划建制扩大，函授生人数达2千余人。1960年下半年我区恢复原有区划建制后，仍有山东大学6个专业、函授生320人，山东师院8个专业、函授生557人，曲阜师院2个专业、函授生83人，聊城师专2个专业、函授生640人。以上各院校共有函授班31个、函授生1600人，这是我区最早的函授大学。聊城市所在教育部门和中等学校负责人姚立亭、邵明才、温宝善、邵广海、韩振东、陈世英、张希元、刘艺华、钱书绅、陶思源、于庆溪、陈子舟等均是我省高师函授本、专科毕业的。

一、针对函授教育特点，采用不同教学形式，确保函授教育质量，使函授生基本上达到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水平

我省高师函授教育培养对象是全省中等学校在职干部和教师，招收具有高中和专科毕业程度的教师和干部，通过函授学习，基本上达到高等师范专科或本科毕业程度，从而提高中等学校教学质量。

为实施上述任务，各专业根据函授教育特点，不开马列主义理论、哲学、政治等公共课，只开专业课，使函授生能集中精力学好专业课程。如，中文专科开设文艺理论、现代文学、古典文学、苏联文学、现代汉语，本科增设文学批评、西欧文学、古汉语等课程；化学本科开设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工业化学、放射化学、农业化学、高分子化学、稀有元素和数学10门课程。本、专科学制均为三年（山师中文专科1956年延长1年，为4年）。除

暑假集中学习30天，每学年学习36周（9月15日至1月23日，2月15日至7月30日各18周）。每周学习8至10小时。

各院校有函授任务的系，设副主任1人负责函授教学领导工作，根据以上函授班学制和学习时间，讨论、制订教学工作计划，组织教师编写教材、学习指导书、教学进度表、参考资料及组织整个教学过程。由于函授是主要教学形式，学习指导书不仅详尽地解释课程内容、提出学习重点，解决学习疑难，而且给以学习方法上的指导，使函授生真正能达到“无师自通”。函授生如有疑难问题，可随时向任课教师函询，教师均及时予以函复。对于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和对教材内容的补充扩展，另行出版不定期刊物一并解决。如山东师院《函授教学》（中语版）所载田仲济教授所写《五四文学的领导思想》、薛绥之讲师所写《鲁迅与进化论》、孙良明讲师所写《文字有没有阶级性？》、孙毓莘讲师所写《六书与正字法》等文章，均给函授生以极大的启发和教益。

此外，每年暑假集中学习30天，除集中讲授和进行复习指导外，还请各系知名教授主讲有关专题。如山东师院中文系主任严薇青教授主讲《六朝小说》等，很受函授生欢迎。同时，每学期各专业教师分赴各地函授班面授1——2次，分片集中函授生进行面授辅导。各院校均派富有经验的教师任教。如山东大学殷孟伦教授、路遥讲师等，均来我区面授教学。每一学习阶段向函授生布置一定作业，并定期进行考试、考查工作。

由于采取以上措施，加之函授生均是成年人和有一定教龄的教师，有学习要求，自学和理解能力较强，教学相长，

能将所学专业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效果良好。经验证明，通过函授学习，函授生基本达到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程度是能以实现的。

二、针对函授生自学特点，严格组织纪律，狠抓自学计划，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

函授辅导处（站）主要职责是根据高师函授教育方针、任务、计划和指示，组织检查函授生自学，实施函授教学工作计划。为完成上述任务，必须严格组织纪律，狠抓自学计划，为函授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

函授生系在职学习，除任课之外，还要参加学校的其他活动，每周抽出8至10小时的时间进行自学，在当时情况下困难是很大的，必须具有坚强的毅力，养成自觉的学习习惯。我们要求函授生根据“长计划、短安排”的原则，按照教学进度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逐节逐章地完成所学课程。

我们除狠抓函授生自学计划的落实外，并以聊城、德州、临清、阳谷为中心组织各专业函授班，指定班长1—2人，以便集中进行面授辅导；在一校或邻校同专业、同年级三人以上者建立函授小组，各组设组长1人。通过班、组组织加强对函授生领导，监督函授自学，定期完成作业，每月向辅导处填表汇报。对能按时自学、成绩突出者，我们及时通报表扬。聊城一中物理函授生韩振东同志排除各种干扰，抓住点滴时间学习，我们写了一篇《紧紧抓住时间翅膀的人》，由山东师院函授部发表在《教学辅导》（综合版）上，向全省推广他的学习经验。

我们严格执行上级规定的纪律制度。函授生参加函授学

习，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择优录取，函授生一周以上不能参加学习者，必须向辅导处请假；请假超过全学期 $1/3$ 以上者报请有关院校按规定以休学或退学处理，旷课一月者取消其学籍。不按时完成作业者根据情况轻重分别给以批评、警告、记过以至开除学籍的处分。当然，考试不及格，经过补考仍有不及格的课程者要令其留级或退学的。1959年山东师院曾对7名严重违犯学习纪律的函授生开除学籍。由于有严格而明确的学习纪律相制约，函授生逐步养成自学习惯，一般能自觉完成学习任务。

我们还经常深入各县、市函授生任职学校，根据函授生的要求与其领导协商，不让他们工作过重，兼职过多，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充沛的精力进行自学。对生活困难、无力缴纳书费的函授生，我们也商请其任职学校领导协助解决。从各方面积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

三、针对函授生面广分散的特点，经常深入检查进行，督促指导，保证函授教学工作计划的实施

聊城地区当时区划建制较大。1956年3月德州地区7个县划入，1958年12月惠民、泰安地区又划入7个县。经过调整后，聊城地区辖3市、11县，164处人民公社，面积达16735平方公里。函授生2千余人，面广而分散，领导和管理他们进行在职学习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一方面调动各县、市函授站干部的积极性，加强其对本县、市函授生的管理；一方面深入各县、市中等学校亲自检查、推动监督函授生学习，并将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随时总结通报。我们还自编自印《聊专函授》不定期刊物，

来报导情况、交流函授生学习经验。函授生虽面广分散，由于加强组织领导和严格纪律制约，保证了函授教学工作计划的实施。

我们每月要下去15—20天，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当时交通不便，乘车困难，我们一般是骑自行车，每到一单位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布置工作，与领导交换意见。因单位过多，常常每天走两三个单位，每天行程平均百里，最多时150余里。在盛夏中烈日当头，在严冬中冰天雪地，路上常常遇到滂沱大雨，呼啸狂风，但从没有阻碍我们的工作。我们真正体会到“拼搏”的含义，也享受到“拼搏”的快乐。有时下去还是非常危险的。在平阴、东平、肥城山区，有时孤身一人，爬山越岭，几十里看不见人，当时不断有劫路杀人的事情发生，连一些学校领导也替我们担心。

十年来，我们下去从不接受函授生及其学校的款待，吃住不给函授生添麻烦，当然更没有请客送礼之事。在1960年生活困难时，一斤熟地瓜1元，我们吃不起，都是出发时背一袋地瓜窝头，在街头买开水泡着吃。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作风，至今我们仍引以为荣！

由于我们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辅导处在函授生中具有很高的威信，亦受到各中等学校领导的好评。同时，聊城专区辅导处工作在全省也是较好的，每次在省教育厅开会时均受到领导的表扬。1958年，中央教育部还派记者左阳同志来聊进行专访。

我省高师函授教育自1956年开办到1966年“文革”结束，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中学干部和教师，对提高我省中学教师素质和中学教育质量起着重大的作用。省教育厅人事处于

介基处长，山东师院函授部李飞主任、孙春煦科长，以及山东大学、曲阜师院等院校、各地、市、县从事高师函授教育工作的同志，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和所做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聊城教育史略

(1840—1949. 9)

孙元芳

本文旨在概述清末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聊城市区划内教育沿革情况。包括“晚清（1840—1911）的聊城教育”，分科举、儒学、私塾等方面。“民国时期（1912—1949）的聊城教育”，分国民党统治区、日伪统治区、老解放区等，以时间先后及空间分布逐一介绍，渴求知情者，矫正补充。

晚清的聊城教育

一、科举与儒学概况

我国的科举制度自隋文帝七年（587年）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止。历时一千三百余年。是我国古代政府通过考试选派官职的一种制度。其程序大体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台阶。“童试”在县举行，每年一次。经县试录取者，才能参加府试。聊城被录童生，因该县系东昌府驻地，故可在本县参加府试。“府试”一般为三年一次，被录取者称为儒学生员，也称秀才，考中秀才方取

得进入仕途的资格，进而可参加乡试了。“乡试”又称大比，通常为三年一次，在相当于今省城的地方举行。因皆于秋季举行，亦称秋闱。经乡试录取者称举人。当了举人可参加会试。“会试”于乡试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礼部举行。又称春闱。经会试取中者称贡士，也称贡生。贡士的名目有岁贡、选贡、恩贡、拔贡等十多种，当了贡士可参加殿试了。“殿试”是皇帝主持的考试。经殿试取中者统称进士。“殿试”分三甲，一甲的前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当了进士即可授予官职。①科举取士还有许多方式和细节，我们只是粗略地叙述而已。

据宣统二年（1910年）《聊城县志》记载，明清以来，聊城县考中举人者三百二十三人（内有武举一百二十九人），考中进士者七十一人（内含武进士十六人），考中状元者三人（内有武状元一人）。

因为科举取士的命题内容“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其形式要写八股文，这就促进了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以作八股文为写作重点的儒学的发展。据宣统二年（1910年）《聊城县志》载，聊城县城内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前共有六处书院。即，东林书院、光岳书院、龙湾书院、阳平书院、启文书院、摄西书院。东林书院在旧县城东，明朝参政耿明建。光岳书院在旧县城南门里，雍正四年（1727年）知县张维恒建，龙湾书院在龙湾运河以西，由任克溥建。阳平书院在府学（现地委党校）东，康熙五十八年（1720年）知府杨文乾建。启文书院在旧城孙家胡同，乾隆三十九年（1775年）由知府胡德林购郡人孙启淑旧宅改建。乾隆五十七年（1793

年)知府张官五筹款重修照厅三间、门房两间、讲堂三间,东西房各三间,正房五间。新建西厢房三间,文昌阁五间,东西对楼各三间,后平房三间,西院南书斋三间,北书斋三间,旁列回廊。后院书室六间,从房六间,周墙复壁,檐角焕然。光绪十年(1884年)知府程绳武重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为东昌府官立中学堂(即后来的省立聊城二中,今为实验小学校院之大部)。摄西书院在城内西口南,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知县凌芬就原义学宅舍创建。后根据清廷谕令:《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堂诏》遂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为高等小学堂。

光绪十九年(1893年)启文书院署名王仁正的一份课卷之后录有这样一首打油诗:“云窗萤案砚空磨,搔首呼天唤奈何,漫说功名皆由命,诗书自古误人多,百事曾无一事真,徒劳心思费精神。”

这既说明清末官场腐败,科举取仕已毫无真意,也道出考生对八股文的厌倦,这种旧的考试制度已到寿终正寝之日,新的教育制度将随社会的变迁而诞生。

二、清末民初私塾简况

清末民初,在官立学堂尚未普及之前,聊城的私塾,城乡皆有。

私塾即私家自行设立的学校,形式很多。宣统二年,清政府公布的《改良私塾章程》将私塾分为四种:甲,义塾,系官款或地方公款设立,专课邑中贫寒子弟者。乙,书塾,就义庄或宗祠内设立,专课一姓子弟者。丙,一家或数家设塾,延师课其子弟者。丁,塾师自行设馆,召集附近学童教

授者。聊城县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就由知县李肇春在城内西大口南，路东置买民房，设立义学，建房舍二十余间。每年延请文化、品德端正者二人，来此讲学，学费由官款支出，官家还随时来此查学，颇认真。《宣统二年聊城县志》称：“一时贫家子弟，颇获其益”。咸丰九年（1859年）知县许济清捐俸“京蚨”五百千，并令沙镇绅士朱桂丹、张更裕等共集“京蚨”五百千，于沙镇太公庙设立义学。又据现存碑文记载，张炉集乡肖天崇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此建一义学。此义学由堂邑县南乡二甲李刘庄李锦辉、李锦坪捐款创建。上述之学校当属“义塾”之类。然而聊城的私塾当以“丙、丁”两类为多。农村的贫寒之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再当“睁眼瞎”，以能识几个字，写个名子，记流水帐，以便能从事各种低等职业谋生为目的，便由一村或数村联合延请塾师，多于村庙、寺院内设塾。农村的塾师多数是家境清贫而又不愿从事其他职业的“穷秀才”，借教学以糊口。如阎寺镇庞庄秀才庞岱山，胡屯秀才胡其昌等均曾在民国初年在自己的家中设馆办学。据林修竹编修的《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民国六年的调查数字示，聊城有私塾250余处，堂邑（现归聊城）有私塾180处。较有名的集中在沙镇、于集、梁水镇、斗虎屯、堂邑等乡镇。具体的说有沙镇的孙丰、王堂、丁楼；于集乡的孙堂、裴寨、于集；大张乡的李知州、糖坊、齐楼、庄户；郑家乡的温集、李海、西邱；侯营镇的孙克胜、田庙；蒋官屯镇的孟营、李行、李官屯；梁水镇的任老九、大杨庄；堂邑镇的南街、陈庄、南关等村镇的私塾。

私塾的教学方法：一、读和背。凡是读的一律要背，每

一本书先分段读、分段背，全书读完背完之后，要“背通本”。不但要顺背，有时塾师还要“挑背”，甚至倒背。二、写。主要是大小毛笔的正楷字。写字的姿势丝毫不能马虎。有一定的老套子，从“描红”写起，依次写“仿影”、“虚影”。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再写碑帖。三、讲。私塾的讲是学生到了一定年龄，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才开始的。一般从《论语》开讲文义。老师着重讲意思，由学生自己去理解和领会，并要向老师回讲。四、作文。作文是学生读书有了一定水平之后才开始的。一般是在“四书”里摘出一句作文命题，用论说文的体裁写，而且必须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初股、中股、后股、末股等格式去做。故称“八股文”。私塾中也有的塾师教学生对对子作五言诗和七言诗以及律诗等，学点有关声韵的知识，使学生懂得平仄。五、教学活动时间。私塾一般教学活动规律是：上午攻书，中午写字、下午读书、背书。均采取个别讲授的方式。私塾一年的假期集中在麦、秋两季及春节三个时间，平时不放假，更无星期天。有的私塾还上“灯学”，晚上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

私塾教育，学规极严，多以“学以畏而成”、“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为信条。对学生滥用扑刑，体罚的种类有：

“打板子”、“罚跪”、“罚站”等。一些智力尚可的学生也被塾师打糊涂了。有的学生在自己座位上，书背得很熟，只要把书往老师桌上一放，连开头一句竟也忘了。

私塾教育自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以后开始衰落。可是直到“大革命”时期，聊城仍有一定数量的私塾，读经讲经依然盛行。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聊城城内因学校停办

或解散，市民子女无处就学，也出现过一些零散私塾，不过这仅是一种非常时期的过渡教育，已不是教育的主流。

三、维新教育在聊城的推行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帝谕：“将各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堂，以省之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书院为中学堂，县城之书院为小学堂，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一律中西兼习，并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不再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聊城县长期作为府衙所在地，对新事物的接受较为迅速，1902年即将东昌府启文书院改为“东昌府官立中学堂”。其首任堂长为留日学生郭宝珍。该学堂与青州府官立中学堂并冠全省官立中学之首。该学堂于1913年更名为省立第四中学，1914年全省调整后定名为“省立聊城第二中学”。又，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根据山东巡抚饬定：东昌府考院改为简易师范学堂。此为聊城“省立第三师范”之前身。同年，城内摄西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宣统二年《聊城县志》载，此小学堂有“堂长一员、管理一员、教习二员，学生三十名”。此外，纺织厂附办的初等小学堂设在城内孙家胡同；由城内原办之义学改设的蒙养学堂及沙镇太公庙义学改办的蒙养学堂的相继出现，替代书院和私塾，当是聊城县晚清时期维新教育之概貌。

民国时期的聊城教育

一、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翌年元月建立了中华民国，宣布共和政体。国体变更，教育宗旨、制度、机构等均随之变更。民国二年（1913年），教育部设立，替代清末旧学部，并公布《学校系统表》（即“壬子学制”）。规定：“初等小学修业四年，高等小学修业三年”。新学制的颁布，对维新教育又是一次革新。但是，民国的建立，新学制的诞生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反映在聊城教育上则是：各种类型的私塾充斥于城乡，虽有一些学校的先后兴办，教学内容大都以新、旧学相结合为特点。民国初年，原摄西书院改建的高等小学堂迁至任克溥旧宅（原卫衙之侧，现为城内人民公园）建校，更名为“卫仓小学”。民国二年（1913年）“东临道立模范小学”创办，其校址在聊城城内西北隅，道尹公署东邻，即今行署粮局之址。民国三年（1914年），原“东昌府立初级师范学堂附属小学”由城内辛己牌坊口迁二府街路北（现新华剧院之址）重新建校，更名为“省立聊城三师附小”。这样就形成，聊城城内以官立小学为主，乡村除重要集镇先后办起一两处初等小学之外，尚有零散私塾相存的布局。

民国二十年前，聊城中等学校仅有清末建立的“东昌府官立中学堂”及“东昌府简易师范学堂”延续下来。原堂邑县（1956年裁撤，其县城及东部划归聊城）于民国三年（1914

年)有“堂邑县师范讲习所”的创办。民国四年(1915年)有“堂邑县立考院学堂”的创办。次年,堂邑“县立模范小学”、“县立女子小学”相继建校开班。

民国八年(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个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山东的学生发动较早,行动较多,斗争延续的时间较长。当济南学生爱国运动传到鲁西北以后,省立聊城第三师范和省立聊城二中及城内几处高级小学,迅速掀起爱国热潮。在三师学生刘伦卿、二中学生李学曾等人的领导下,组成了“聊城学生联合会”,并很快组织了宣传队、纠察队、调查队、募捐队及国货商场等下属组织。发出了“以实际行动反对卖国贼”、“拒绝对德和约”、“废除二十一条”、“绝不让日本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等口号。同时揭发了卖国政府媚外投降、袒护卖国贼、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三师进步学生还经常分组赴鲁西北各县进行演讲、散发传单;撰写了《泣告全国父老抵制日货宣传书》,遍载各报。三师女学生亦冲破旧礼教的束缚,与男生一同上街游行示威、发表演讲。

受“五·四”运动影响,遂有适应新文化运动的“平民小学”及具有反封建意识的“光岳楼女子小学”的诞生。前者,于1922年,由省立聊城三师九级学生董玉衡等人创办。后者于同年在聊城城内楼南大街路西僧王祠改建(现为工商银行之址)。到1925年,由三师毕业生丁广恩为首任校长的博聊关小学诞生于东关大街路北,后迁址于闸口东。此校一直延续至今,现名为河东小学。聊城城郊则有利用寺院、家庙、会馆改为校址的初级小学的建立。如海晦庵小学、三义

官小学等。1932年秋，堂邑私立武训中学创办。翌年7月，聊城县立师范讲习所建立开班。标志着聊城中等教育也稍有发展。

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往往采用软硬兼施的两手。除利用“枪炮外交”达到侵略目的之外，兴办教会传教，进而开办教会学校以麻醉愚弄中国人民，则是砍向中国人民的软刀子。鲁西北重镇聊城，早在民国九年（1920年）就有外国人涉足。聊城南关及城内楼北白衣堂的两个教堂，是信奉天主教的人们会聚的地方。城外双街，则建有规模较大的基督教堂（现聊城一中西院院内）。据天主教信奉者，现任市政协委员的张玉梅提供：1930年，南关天主教堂就开办专门的“读经班”，吸收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孩子读圣经，也兼学一点初级文化知识。教师是两个姓张的修女，参加学习的大致有二十人左右。由法国人黄神甫主持在楼北白衣堂街教堂内，开办天主教小学。共计男女五个班，女生在东院，有一、三、五，三个年级班。男生在西院，有两个班，共计有教师五至六人，学一般小学课程，兼习圣经。双街教堂于1927年间有美国牧师陶喜古主持办起基督教圣公会“神学班”。该神学班吸收信奉基督教的男女老幼来此读经，兼学点文化知识。聊城教会学校办得时间长，规模大，又演变为完全小学的有基督教聊城中华圣公会办的“文德小学”，其校址在聊城闸口南太平街西段路南。

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在民国时期是鲁西北最高学府，学生来源于鲁西北十几个县。中共党的组织早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便在该校酝酿建立。最初，由校内国民党组织负

责人之一的张廷焕接受了共产主义宣传，在济南参加了共产党组织，1927年春，张廷焕、李思孝、晋陀秘密组成三师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是年下半年，党、团员发展到50人左右。至1928年春，因形势不利，该校共产党和团的活动暂告中断。1931年秋，由刘子蔚、唐书春（又名田海心）等人根据上级指示，在校内建立了“中共聊城中心支部”后改称为“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②。

三师党组织的建立，有力地领导了聊城教育界和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激起聊城三师师生的义愤。9月28日，该校12个班的大部分学生集合，声讨日寇暴行。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刘子蔚等人，做了生动讲演。会后自愿组成“省立第三师范学生请愿团”，要求到南京请愿。为此，与国民党校长、主任的阻挠进行斗争。“九·一八”以后，国民党政府先后与入侵日军签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这一连串的屈辱卖国行动，激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聊城学生积极响应，在中共聊城三师党组织的领导下，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活动。1937年，该校党组织还组织学生张贴革命标语；发动聊城城镇水车工人罢工；开展大辩论等。伴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日益高涨，聊城教育已不能安于校内之学了，同全国一样，广大革命师生，冲破重重阻力，投身于挽救祖国斗争的大课堂中去。

二、日、伪时期反奴化教育简况

“芦沟桥事变”之前，山东省立聊城师范驱逐国民党校长冯光荣的风潮一直延续了数月之久，涉及了山东省教育厅

长何思源和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中共聊城地下党组织和省立聊城三师党组织在驱冯风潮暂息之后，进行了反对何思源的活动，1937年4月，聊城党组织拟定了反对何思源的宣言，宣布何思源把持山东教育的十大罪行。他们分三路赴北京、南京、济南散发宣言，迫使何思源托病去杭州休养③。

山东省第六专署专员范筑先是一位富有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地方官员。中共党的组织在抗日战争之初，便联合范筑先开辟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范筑先的司令部称为“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其“政训处”成为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公开办事机构。1938年5月1日至6日，六区司令部政训处在山东省立聊城三师礼堂召开扩大的政治工作会议，决定在聊城设立“政治干部文化学校”和由政训处接办原范筑先组成的“军事教育团”。该校和团的正职由范司令兼任，副职由共产党人担任。会后即付诸实施，成为聊城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两个学校。聊城抗日战争初期就形成了以抗日爱国为中心内容的革命教育，形势很好。范筑先的女儿范树琨还在聊城城内袁宅子（现楼北地区交通局之址）办起抗日小学，由她任校长，流亡到聊城的青年知识分子轮流执教1938年11月15日，日本侵略军攻陷聊城。城内小学尽皆停办。省立三师、二中等几处中等学校均因战争，先后终止。为推行奴化教育，日伪政权除组建“青训班”外，也筹划原有学校开学事宜。直到1939年秋，在城内，也只有卫仓、博聊关两处小学勉强开课。城郊的刘营、前罗、军王屯等乡村小学在1940年后逐渐开班。至1943年，城内有冯焕堂办起义学，书法家杨萱庭则于西口南办起公正小学，双街教会小学也改称双街小学维持开课。此外，城内也有东临道联立师范和聊城县中

的开办。东临道联立师范1941年冬建于城内北口西路北（今地委党校）。1945年日本投降后改为“聊城简易师范”，至1947年元月聊城解放而消亡。聊城县立中学，1943年9月建校于原省立聊城三师附小之址，1946年夏因战事停办。1947年春终止。

在日伪时期复学和开办的上述小学、义学师生均不甘受奴役之苦，又直接或间接接受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政府的教育，与日本侵略者及伪顽卖国贼做了无形的斗争。

聊城广大农村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队的直接帮助下，迅速建立了抗日武装，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日本入侵者的斗争。1940年聊城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此时期，聊城游击区的教育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以有钱人家延请上了岁数的老私塾先生出来，教给自己子弟一些“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之类。仍习封建文化。这迎合了日伪进行的以尊孔为幌子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奴化教育。二是村上学董（群众推选的办学人员）出头，摊敛钱款办复式小学，学习战前或教师抄写的课本，学生能受些爱国、抗日教育。1940年下半年，抗日政府领导下的抗日小学开始发展，后来逐渐有了油印的毛头纸的课本，学习内容从一字一词上向学生进行抗日的爱国教育。抗日小学的学生参与政治、生产活动，帮助成年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站岗、放哨、查路条、唱歌、演戏等服务于抗日活动。体现了教育为政治服务，与战争紧密配合的特点。

除抗日小学外，在半游击区和游击区，甚至敌战区也建有倾向抗日的小学校。其教员由有爱国思想的人充任。日伪

扫荡时就读“四书”、“百家姓”或日伪政权所发的课本。扫荡过去就教抗日课本。这种学校在日伪政府备案，领取教员的待遇，抗日政府也拨给津贴。故有人称这类学校为“灰色小学”。日伪政府对这种“灰色小学”并不相信，1943年11月就发生了震惊聊阳的教员逮捕案④：聊阳一带的八名小学教员，突遭日伪人员逮捕，以共产党嫌疑被刑讯拷打。这八名教员表现了坚贞不屈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反奴役的赞歌。

随着抗日战争的日益深入，聊城农村教育逐步发展。1944年秋，孙堂抗日高小创办。翌年6月，在三区（现为东阿县辖）界牌村又建一学校，定名“抗日二高”，招生46名，在界牌、王庙、果子王等地游击办学（该校后来定址于玉皇庙村）。孙堂抗日高小遂改名“筑先县抗日一高”。同在1945年，孟营村（现属蒋官屯镇）组建“抗日三高”。许营乡的李楼小学，排称“抗日第四高小”。博聊关小学也曾一度改称过“筑先县抗日第五高小”。

堂邑县位于聊城西四十里，聊城沦陷后，中共党组织立即在此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开辟了聊堂边抗日根据地。并于1939年建立了堂邑抗日政府，后，一度改划为“武训县抗日政府”，该政府设第三科分管教育工作。武训县于1948年又改称堂邑县。这里的教育因战乱、灾荒时办时停。到1948年也形成五个抗日高小。即：堂邑城关完小、武训师范附小、辛集完小、梁水镇火神庙完小、埃固完小。分别称堂邑抗日第一、二、三、四、五高小。这段时期，尚有甘官屯（现属冠县）完小较为著名。

三、老解放区的教育

聊城四郊乡区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均于1945年前后解放。筑先（即聊城）、堂邑两抗日政府领导下的小学教育有所巩固和发展。至1946年，各乡镇建起含高级小学的完小10余处，复试初小40余处。较著名的有：孙堂、孟营、刁庄、梁水镇、四甲李、糖坊、谭庄、李楼、沙镇、道口铺、河洼刘等18处小学。1947年1月1日，聊城县城解放，最初仍名为筑先县。中共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在医治战争创伤、支援解放军南下的繁忙事务中，抓紧了城关区小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在城内，有以光岳楼为中心，按方向命名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小学的形成。统称为聊城城关区第一中心小学。另有以双街小学为中心校的第二中心小学，辖龙湾、前进、北花园、光明四处小学。博聊关小学，在改称抗日第五高小以后，又更名为“聊城城关东关中心小学”，辖三市街、华佗庙、柳园、豆营等17个教学班。聊城城关解放初期的小学教育，在短时间内便有了合理的布局。

遵冀鲁豫边区行署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规定之方针：“……边区教育在新解放区必须结合群众翻身运动，肃清敌人法西斯奴化思想毒素，发扬群众的觉悟程度，并随时地进行生产教育。在老解放区必须结合群众的大生产运动，加强生产教育与时事教育。”聊城小学有如下表现：教育与土改和解放战争密切结合。如孟营小学教师在土地改革时编了这样的教材：“土地还家、合理合法，复查斗争、填满穷坑”。还编了《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分别程度

作为各年级教材。梁水镇小学师生在第四野战军南下时书写标语“东北大军过了关，好比猛虎下了山”，于集一带的小学生则高唱：“青天呀蓝天，这样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前线？叫声呀老乡你是听，这是坚决抗日的八路军”。1947年刘邓大军过黄河，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聊城小学的学生们高唱《我们歌唱刘伯承》：“三月里，天地动，刘伯承是革命的天才军事家，毛泽东的好学生……。”建国前聊城的小学教员在支援前线作战，土改复查，甚至村、乡民政事务等各项工作方面均积极参加，与乡村干部共同工作，被群众誉为“一个教员、半个抗联”。遇有参军和重大政治活动，学校师生则载歌载舞，走在前列，并搞一些配合形势的节目演出于街头、宣传于群众。

1947年，以聊城的沙镇为中心，方圆四十多里的地方，即聊城的西南与阳谷县的西北部曾被划为“聊阳县”。当年，聊阳县即令谭古贞、孙玉贵等在沙镇向庄办起聊阳师范，该校招收来自解放区的青年，经短期培训送往用人单位，参加革命工作。该校于1948年随县治撤销而终止。1948年冬，冀鲁豫抗日第四中学由茌平县武官屯迁至聊城双街，以原天主教堂为址办学。1949年7月改校名为平原省立聊城中学。建国后随平原省裁撤改名为山东省聊城一中。是年八月，聊城地区联立师范创建，其校址为原省立聊城三师之旧址（即今城内考院街）。几经变迁，现演变为聊城教育学院。上述师范、中学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夕，聊城县中等教育的布局。

注：①参看《山东教育史志资料》

②参看李志成撰《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载《聊城史志资料汇编》三集

③参看《聊城县党史资料》1期27页

④参看《聊城史志资料汇编》三集李广怀文章

作者：孙元芳，男，现年50岁。系《聊城市教育志》主编。聊城市政协委员，住聊城龙山西路。

忆山东省筑先（聊城）县抗日战争时期几位爱国民主人士的生平事迹

张 侠

编者按：张侠同志在抗日战争极其困难的岁月里，担任筑先（聊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兼县大队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领导群众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转战于聊城东南乡各地，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出生入死，风餐露宿，挫败了日伪军无数次的扫荡袭击，巩固和发展了聊城的抗日根据地。

这篇《回忆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把党的统战工作写得卓有成效，淋漓尽致，同时又以大量事实具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与敌斗争的残酷场面。希望同志们读读这篇文章，在当前的幸福生活中牢记“创业维艰，守成不易”的名言，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巩固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并与党外人士赤心相处，肝胆相照，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则振兴中华指日可待矣！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筑先县是坚强的抗日堡垒，党和地方武装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由于党的统战政策的贯彻，也涌现出了许多抗日功绩卓著的爱国民主人士。这些民主人士虽然都已先后离开人世，但他们的光辉事迹却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为了了却我多年的夙愿，

在有生之年把他们的生平事迹写出来，一方面教育下一代认真贯彻党的政策，继承革命传统，抵制社会不正之风，另一方面也想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点贡献，这就是我写这篇《回忆录》的目的所在。

位于鲁西北的筑先县（即现在的聊城市），是富有光荣传统的革命县之一。早在1927年10月初，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了鲁西北的第一个县委——东昌县委（鲁西县委）开始了党的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全面疯狂地侵略我国，华北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纷纷南撤，地方政权土崩瓦解，大批国民党官员逃散，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只有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旗帜，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

此时，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毅然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在鲁西北树起了抗日旗帜。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8年末，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抗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军队由四、五百人迅速扩大到了35个支队，号称10万大军。各阶层人士纷纷加入了抗日阵营，社会秩序井然，民众情绪高涨。但是由于敌强我弱，1938年11月15日聊城陷落，范公殉国，鲁西北又陷入一片混乱局面。在此期间，除少数民族败类叛国投敌外，仍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旗帜和范公与共产党精诚团结共同抗日的影影响下，带领本地广大群众积极抗日。

1939年在中共聊城县委领导下，开始筹建抗日县政府。1940年春县政府诞生，张武云同志任县长。1940年秋冀鲁豫行署派牛连文同志接任县长，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将聊城易名为筑先县。1941年春又派我接任县长兼县大

队长，并为县委委员。县政府所辖先后有四个区，地处城东南老韩庄、孙堂、顾官屯和城东大孟营一带。由于党领导的华北“百团大战”的影响，筑先县同全国一样形势是好的。有一片约150个自然村的地区可以公开活动。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正面进攻，逐渐调回了大批军队，来华北搞所谓强化治安活动。筑先县是鲁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日寇占领筑先县城后，当然不会放松对城乡抗日活动地区的进攻，除对我抗日党、政、军、民轮番扫荡、夜袭外，还在我活动区先后安设敌伪据点18个之多，挖封锁沟3条，修碉堡十几个，背后还有阳谷县七级镇的伪军不断向我区夜袭、骚扰。

日寇常驻县城一个联队约四、五百人，后调走一部分尚剩150人左右。伪县警备大队所辖五个中队约500余人，伪区分队约700多人。还有反共顽军齐子修部号称3万余人，常驻荏、博、聊、堂各县。三次公开投日1000余人，编成伪警备大队。其余部队搞“曲线救国”，修据点、筑碉堡暗地勾结日寇，反共反人民。另外敌人还发展组织会道门，利用群众性的迷信组织限制和反对抗日。最困难时期（1942年冬——1943年春），我县村村有会道门的组织和活动，有的土匪投日，充当敌特务队长、伪乡长；有的和反动会道门勾结在一起，乘机抢劫民财，危害地方。总之，敌、伪、顽、匪、会五鬼纠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反动营垒，象沉重的大山一样，压在筑先县抗日军民身上，将我抗日活动地区分割成许多小块。由于日寇的扫荡，土匪的抢劫，自然灾害的影响，造成了民不聊生，路有饿殍的情况。这时县政府，县大队严重减员，有的伤亡，有的弯腰回家。也有个别的投敌叛

变。减员最严重时，县大队仅剩下二、三十人，加上行政人员不过四、五十人。后经过我们发动群众，进行整编教育，县大队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建立了四个中队、三个区队，计120人，县区武装最多时达到近400人。以400人左右的地方武装面对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的近2000多的武装敌人，其环境恶劣和战斗频繁是可想而知的。1942年第一季度在联防区大小战斗就达24次之多，每月平均8次，人民生命受到摧残，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我党政军民在极端困难之际，却涌现出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财产的毁灭，以范公为榜样，与我党政军真诚合作。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反对帝国主义，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8年范公殉国不久，就有聊城东南于集乡梁庄的梁伯河，他是上海东亚体专毕业，曾任泰安三中、聊城二中、三师的武术体育教员，群众称他能飞檐走壁，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八路军先遣队第一游击大队，任队长，与日伪顽匪会道门开展了殊死的斗争，在战斗中负伤后被敌人杀害，时年38岁，可惜我仅闻其名，未见其人。我所接触的几位民主人士虽已离开我四十多年了，但他们的音容和事迹却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现根据我的回忆和一些同志们提供的材料，特别是梁金中同志提供的材料，对他们的生平事迹系统地加以整理。

由于时隔四、五十年之久，对每个人的生平事迹仅是挂一漏万，经谭启明、王鲁光、梁金中、宗曙光、王植竹等一些老同志及其后代吴庆春、白建华等同志的修改、补充和本人进一步的斟酌修改始定此稿。应该说这一稿子的写成包含

着参与这一工作同志的汗水和心血，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由于本人水平所限，以及其中材料有的没有查证核实，难免存有不妥和错误，恳请知情的同志、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现以姓氏笔划为序列述如下。

王如兰

筑先县城东南王寨村人，兄弟三人。二弟王如菊是共产党员，土改时曾任农会会长。三弟王如惠，其子王鲁光是共产党员，建国后曾任中共聊城县委书记兼县长，次子王陈洲曾任王寨党支部书记多年，他们家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

“七·七”事变前他们兄弟就已分居，各立门户。如兰先生教小学多年，有土地20多亩，一头牛，全家六口人以种菜园谋生，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具有较高的民族觉悟和爱国心，为人正派，主张正义，在八大寨（即王寨、裴寨、李华庄、吴堂、柴庄、祝寨、任寨、韩庄）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有很大的号召力。他与抗日政府风雨同舟，密切合作，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抗日民主政府把八大寨划为实验村，一切政策法规先通过实验村，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如村政建设，他带头在王寨推行。过去的旧村长是地主富农分子把持，或轮流当村长。抗日政府接管后，首先在实验村“还政”于民，实行民主选举。但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低，多数不识字，采取农民分组酝酿推选候选人，然后用在候选人背后设碗投豆粒的办法，选出农民真正拥护的村干部。

在平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根据地，必须改造

地形，将村与村之间的大车路挖通改造为抗日交通沟。这项工作首先从王寨开始。并以如兰先生为首，在八大寨组织农民率先完成。

他带头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组织民众打狗、拆寨墙，坚壁清野（藏粮埋粮），抗日政府在此取得经验后，在其他农村推广。

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在八大寨办了一个多年级的完全小学，先生为名誉校长。这个小学是他亲手筹建起来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工作人员经常来往他家吃住，他在生活上待工作人员如亲人，在工作上积极出谋献策。

鼓励支持青年积极参加抗战，他常说：“日本鬼子要灭亡中国，青年人只有参加抗日才有出路”。

先生不幸于1953年病逝，享年67岁。我们失去了一位与共产党真诚合作的民主人士，人民永远怀念他。

白风义

“七·七”事变前他是聊城县王官庙的集头和会首，是一位具有江湖豪侠气派的人物。为人正直，仗义疏财，善于结交社会上所说的三教九流的人物，并爱抱打不平，因此在当地百姓中颇有名声和影响。

1938年11月聊城被日寇侵占后，当地土匪、盗贼、会道门蜂起，闹得民不聊生。这时，八路军游击队长梁伯河、四大队长徐翼、东阿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苏民曾多次与他畅谈抗日形势，进行爱国主义与前途教育，他说：“你们怎么领着干，我就跟着怎么干，我决不与你们犯顶”，他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白风义被拥戴为民团团长（约30多人、枪）维持社会治安。他不负众望，干得很有成绩。

1938年地下党员刘子华、裴动民、宗曙光去邯郸开会，返回途中至冠县柳林被敌人扣留，认定是共产党员要处死，刘子华说是白的亲戚，是来做生意的。敌人派人来询问白风义，他对来说：“这三人都都是我的亲戚，是我派出去做买卖的”。敌人释放了他们。

1939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以王明君为头子的小股土匪七人，持枪抢劫王官庙庙会，四月初一日被他率团全歼。当年的冬天，国民党县政府的残部，土匪出身的夏长法拼凑了四、五个土匪在夜间绑架了赵寺富裕中农郭玉昌，他闻讯后率团身先士卒活捉了土匪，缴获了武器和自行车，救出了郭玉昌，维持了社会秩序。

1939年秋，当地红枪会头子陈玉怀、陈万泗公开投靠日寇，当了铁杆汉奸。在其本村花牛陈修筑了据点。当八路军游击队长梁伯河率部袭击陈玉怀时，白风义命令民团掩护，接应了梁伯河部。1940年秋聊城伪县长和伪乡长冯玉柱率伪军扫荡孙堂一带，白风义率部打得敌人屁滚尿流逃回了城里，并缴获战马7匹、自行车数十辆和一部分武器弹药。陈玉怀在日寇指挥下偷袭我八路军游击队，抓走了队长梁伯河和何器之同志，并烧了何的房子，抄了梁的家。他利用与二陈的旧交设法营救了梁、何二同志。但是由于他与二陈思想立场上的分歧（即一是爱国坚决抗日；一是卖国求荣决心当汉奸），因此他们之间的旧交情旧关系随着时间推移，斗争形势的发展逐渐断绝，一直发展到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程度。1940年二陈率领数百名红枪会员配合日寇气势汹汹窜到

他的祖居大白庄（他有土地几十亩，四合院房屋几十间，牲畜农具俱全，子孙几十口，是一个儿孙满堂的大家庭），二陈竟丧心病狂的将其主要的十几间房子和衣物、用具、农具全部烧光，迫使其全家无法生活。从此他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进一步提高了民族觉悟，识破了日寇、汉奸的狼子野心。

1939年秋末，国民党顽军冯寿朋（外号二皮），有五匹战马脱缰跑到白风义团的防地，被团丁逮住。第三天，他就将马匹全部交给我八路军先遣纵队第四大队徐翼大队长，增加了我八路军的力量。

1940年夏，他率领全团毅然投奔八路军，建立了运东抗日游击大队，被委任为大队长。共产党员胡洋生任政委，何器之任参谋长。此时约一百多人和枪，后来很快发展成三、四百人的抗日武装，后改编为军分区三团，白任团长，马布克任政委，活动在筑先、阳谷、东阿、茌平等县交界处，有力地打击了日伪顽会匪的反动气焰，保卫了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定了社会秩序。

后来，他因年已花甲，腿脚不便，率队行军与敌战斗确有困难。只好带着几个武装通讯员秦长爱、姚燕翎、赵兴贵等人单独住在筑先县、东阿、阳谷交界处的孙、陈庄和赵寺等地。这时他利用其社会关系为我军购买药品、弹药等敌人禁运的物资。我们一些军政工作人员到他家，均是热情招待。其爱人李月青也是一位对抗日人员热心肠的人，抗日人员都说到他家如同到自己家里一样温暖。

在日寇扫荡，环境极度恶劣的情况下，他带通讯员随群众转移，有时跑到瓜棚里、红薯地里，饿了扒几块红薯充饥，然后再留下几个钱，严格遵守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总之他在极度艰难困苦抗日岁月里，抗日意志坚定不移，在抗战期间以及解放后，他曾多次申请加入共产党，但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还是把他留在了党外。他对其子女进行教育，要求跟着共产党走，要爱国爱民，因此为子女起名为新民、爱华、瑞华、苏华、建华等。1941年送次子参军。1948年送女儿随军南下。1951年送女儿参加志愿军，1953年送新婚十几天的长孙参军，1958年送三子参军。其子孙先后多人成为中共党员。

1947年土改复查时，县里个别领导人因执行政策过左，把他当成“石头”搬掉，而后又平反恢复了名誉。1947年5月，任聊城县裁判委员会委员，9月任聊城商联会会长。1950年5月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被选为代表参加主席团。1959年6月，任政协委员常委。他于1960年病逝，享年79岁。

刘润常

筑先县（聊城）城东南李海子村人。自幼家庭贫寒，只念过几天私塾就辍学，在家拾柴、割草。30多岁出支过继自立门户，有土地7亩，因人多地少，靠做香挣钱补助生活。

1928年（民国17年）军阀混战，地方政权不断易人，社会秩序混乱，盗匪蜂起，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当时，刘润常52岁，为了保家自卫，他村成立了黄沙会，村民父老推他为坛主，从此全村青壮年纷纷自愿入会。他们夜间磕头跪香练武功，白天劳动生产。附近百姓闻讯也要求设坛传道，在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里就有百余村参加了他的会，顿时会威大

震，小股土匪不敢入侵骚扰，百姓暂获安宁。

1929年7月10日大土匪王金发攻占了县城，四处外出牵牛架户，奸淫烧杀，无恶不作。9月，一天的傍晚，匪徒们窜入黄沙会的王堂村。润常闻讯后，立即集合了2000余名会员分三路包抄该村，匪徒们见势不妙，惶惶夺路而逃，退回了城里，从此，匪徒们未敢再犯。

1930年他被推选为永清团长，因保家剿匪有功，10月间当地农民以永清团的名义给他送了“义勇堪仰”的金字，并唱戏四天以示庆贺。

1936年春，他被山东省国民党韩复榘省长调莒县训练农民，在大队部任参谋，1941年夏天卸职回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润常一家是个革命家庭。其弟刘润笃曾任八路军某部骑兵团指导员，1941年与日伪军战斗时牺牲。侄子刘锡爵任八路军某部连指导员，与日伪军战斗时牺牲。其长子刘锡利，在八路军某部任班长，和日伪战斗中牺牲，次子刘恒光（锡鼎）在县司法科工作，后任区长，卫生局长，病逝于工作岗位上。族弟刘子华（润生）系地下党员，在该村建立了党支部。他在刘子华同志和村党支部的教育影响下，提高了民族觉悟，奠定了抗日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县抗日民主政府也经常邀请他到政府开会议政，听取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宣传、教育。因此，他坚定地与共产党合作，积极响应抗日的号召，暗地利用原有的社会基础重新组织整顿了黄沙会，公开抗击日伪军。

1941年冬的一天，敌伪据点花牛陈的敌人扬言要扫荡他家乡八大香坊（即前高、后高、耿堂、冯庄、梁堂、董桥、

李海、梁庄)。腊月二十四日，他召集各村坛主，宣布“不抗日打鬼子日子没法过，以后打鬼子要当日子过”。当时也有人说：“老百姓怎么也打不过日本鬼子，弄不好惹大祸”，但多数人抗日情绪高涨，决定二十五日在于集亮团。那天集合了千余会员，有五十二个村参加大会，他在会上作了抗日动员并表了决心。

第二天上午，周庄日伪据点用四、五十人作幌子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以骑兵向黄沙会防地后高香坊骚扰。他闻讯后，击鼓集合会员，率领部分会员赶到战场迎击敌人。敌人听到鼓声四起，在将要被包围之际，退到阎屯村西相持。此时他将各村陆续来增援的上千会员布置到阎屯以西一些碱埧子内，约半华里南北长方形的阵地上。敌人又以花牛陈、周庄等据点配有轻、重机枪、小炮的日伪军200多人以日军指挥督战，卷土重来。刘润常号召会员为保国卫家和日寇死拼一场，待敌人进至一、二百米时，他命令本村会员越出阵地扑向敌人展开肉搏。会员们迷信神符，勇猛奋斗，毫不畏惧，他身先士卒站在高处指挥战斗。此举，正中敌人之计，他首先不幸负重伤，接着会员刘锡奎牺牲，其父刘润身见儿子牺牲，持枪复仇刺杀敌人，不幸身中数弹当场牺牲。润常的胞弟润笃。会员润坤也相继牺牲，并被敌人浇上汽油个个烧焦，其惨状目不忍睹。当战斗进行到如火如荼白热化之际，我县大队由谭启明等率队闻讯赶到参加战斗，日本指挥官被我县大队击毙，敌人伤亡惨重，再加上会员继续增援，敌人狼狈逃窜回据点。

刘润常因负伤过重，流血过多，抬回家里当天便牺牲了，享年65岁，他和他弟弟刘润笃，会员刘润身、刘锡奎、

刘润坤牺牲的噩耗传出，几十个村的父老兄弟姐妹无不悲痛惋惜。对敌人的残暴行径非常痛恨。我抗日民主县政府立即对死者进行了抚恤，批为抗日烈士以示表彰。

血的教训教育了我县党、政、军、民和所有抗日人员。党中央毛主席制定对待会道门的政策是“破除迷信，瓦解其组织。”在群众抗日觉悟的基础上组织各种类型的群众抗日团体，刘先生虽有抗日爱国之心，但他以旧社会的迷信组织会道门，打孤立无援，乌合之众的土匪是可以胜利的，但和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日本侵略者斗争则必然要失败的。在此之前，我也未认识到这一点。烈士们流的血教育了我，使我懂得了以后如何认真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尤其对会道门政策，如何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加倍地向日伪讨还血债，为烈士们报仇。

吴汉三（名士杰，字汉三）

祖居筑先县二区南杜庄（现聊城市于集乡南杜庄），生于1887年，独生子，幼年丧父，家贫，赖母亲耕纺抚养长大。他昼夜苦读，常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勉自励和教育子孙，具有一定的民族觉悟和爱国心。他曾在东昌府（聊城）座铺管家，“七·七”事变后回家率领子孙务农和开烧酒店。上有老母、下有子孙计14人，有良田五、六十亩，房屋数十间，牲畜农具俱全。由于他家劳动力强而多，再加上善于经营，粮食年年有余，生活优裕，称得上子孙满堂小康富裕之家。因他为人正直，办事认真公道，不仗势欺人，不小看人，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群众中有什么

纠纷，爱找他评论公断，人称“吴大帅”。“七·七”事变后，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纷纷溃逃，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思想十分苦闷。我抗日人员每逢住在他家，他总是热情招待，经过我们对他宣传教育，尤其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他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并对我党政军人员的廉洁奉公，不怕牺牲，坚决抗日救国的精神表示赞赏和钦佩。

1941年秋，齐子修部团长田福州公开投敌。一天上午田率领伪军1000多人跟随100多名日本鬼子，配带有钢炮、重机枪等优良武器，气势汹汹直扑我三区抗日根据地，先后在姚庄、马海子、九家赵、柿子园、果子王、周庄、高圈等村安了据点。敌军所到之处，抓壮丁、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未抢走的粮食和面缸、油罐里撒上尿，厕上屎，当地群众纷纷由洼东逃往洼西二区南杜庄和太平庄一带。有亲友的投亲友，无亲友的流落各村街头，哭天嚎地，愤怒控诉日伪军的残暴兽行。当时二区联防队尚处在半公开状态，经常晚上打击小股牵牛架户的土匪，伪军。我二区根据地范围不大，仅三、四十个村，其中骨干村不超过二十个，且周围敌人据点星罗棋布，南有阳谷县七级镇伪军赵二虎据点，西有谭庄、周店据点，北有刘道之、高香坊据点，距此均不过十华里左右。这天我县政府住该区太平庄（南杜庄南一华里左右），县警卫连战士不足100人，武器差，弹药缺，但战斗士气很高。洼东敌人扬言要各据点的日伪军全部出动，扫荡合围这块小小的联防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具有抗日民族觉悟的吴汉三先生，带着几个小伙子，晚上七、八点钟到了县政府所在地，找到了我，恳切地说：“日伪龟孙子们是一群丧失

人性的野兽，真不叫老百姓活了，不和他干是死，和他干不一定是死，不如和这些龟孙子们拼个你死我活，就是死了也痛快。县长你说怎么办，县政府今晚是走还是留”。我说：

“汉三老兄，你和父老姐妹的心情我是理解的，由于派出去的各路侦察员还未回来，也未与其他同志商量，县政府是走是留尚不能答复你，请你先回去休息，待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告诉你”。

当时，县政府内部对此也认识不一致，有的主张我们跳出包围圈，保存力量和敌人打游击。这是符合党中央毛主席所提倡的持久战、游击战的精神；有的主张在百姓危难之际不能抛下群众不管而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各路侦察员均回来，报告说：“各据点敌人都扬言第二天合围这个地区”。县政府的干部有些人主张将100多人的县警卫连留下来，叫我和县政府跳出包围圈，这样可以支援当地群众与敌人斗争。最后我们决定由县政府的秘书华川同志和公安局长李诚同志率县政府全体人员立即集合出发，跳出包围圈。我和县警卫连武装人员留下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与敌人展开斗争。散会后，吴老先生听说县警卫连和县长不走，老眼流出激动的泪花，我说：“请吴老兄回村后给我向群众借120套便衣，拂晓前我和县武装人员全部到你村去，换上便衣，和来扫荡的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请转告父老兄弟姐妹们，县政府全体指战员誓死和群众战斗在一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拂晓，我们移到南杜庄，全体指战员换了便衣，准备打大仗、恶仗。汉三同志也脱了长衫换上武装，背上一支马枪，腰系一条子弹袋，骤然由文人变成一位民兵联防指挥员。广大群众见汉三同志这么大年纪（50岁），不顾个人安

危和财产得失，准备和敌人拼命，保家卫国，并又有县政府、县长留下来大力支持，因此各村群众纷纷磨刀擦枪，轧炸药，起用土枪、土炮、鸟枪，制造手榴弹，在各村内临街的房顶上修筑工事，户与户挖通。总之，男女老少都行动起来了，誓死与敌人血战到底。幸喜，第二天汪东的敌人忙于抓夫修据点，抢东西，没来合围扫荡。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几十个村的联防区，初步完成了备战任务。由民兵推选，县政府任命吴汉三同志任联防区大队长。从此，联防区公开打出了抗日保家卫国的旗帜。自1941年秋到1942年秋的一年里，日伪频繁进攻联防区，每次战斗汉三同志都手持马枪，戴上花镜，身先士卒指挥广大民兵与敌人战斗周旋。1942年秋，七级镇据点伪军头子赵二虎率300多伪军来联防区裴寨安据点，汉三率领民兵围困敌人三昼夜，迫使敌人撤走。他配合我八路军打了很多出色的漂亮仗，保卫了联防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战争锻炼了人民，锻炼了汉三同志，使他由一个文人锻炼成为一个出色的指挥员，成了一个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民族觉悟的爱国带头人。

1942年夏天，联防区的形势最好，麦季丰收，社会秩序井然，联防区内没偷盗，没赌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民喜气洋洋，抗日歌声四起。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来联防区，召开了联防民兵及县区武装大会，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表彰了吴汉三同志，赞扬了他拥护共产党、毛主席所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政府领导下率领广大群众与日寇展开殊死的斗争，保卫了家乡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但是到了1942年秋天，日寇以一个中队的兵力（实际是

两个小队70余人)配合伪军一个大队约1000余人,由伪军副大队长赵振华带领,气势汹汹直扑我联防区南杜庄一带。我军和联防区民兵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按照毛主席“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转移而避实就虚,保存实力,乘机打击敌人。敌人当天就在我联防区安了十九个据点,在南杜庄修筑了坚固的中心据点与碉堡群,并在据点墙上大写“捉拿住吴汉三者重赏”的布告。妄图迫使汉三同志投降,瓦解消灭我联防区的有生力量。这些失去人性的东西来联防区后大肆抢掠,抓夫、奸淫,烧房子,无恶不作,汉三同志的家更是抢劫焚烧的重点。美好的家园骤然变成了废墟。

从此,汉三同志家毁脱产参加抗日,在敌人据点林立险恶的环境中,不顾年老体衰,怀着国仇家恨,抗战到底的信心,率领一大批民兵来县政府集合,随县政府行军活动继续抗日。另一部分民兵埋枪投靠亲友。在汉三同志抗日精神的影响下,经过一年多的战火锻炼,民兵保家卫国的民族觉悟普遍提高了一步,因此,在敌伪威逼利诱复杂的斗争中,未发现一个民兵投敌叛变,为收复该区奠定了良好的思想与组织基础。

当年冬天,汉三同志跟随县政府行军。由于他年迈体弱,步行跟不上队。我们就为他买了一头小毛驴骑上,由于冬天寒风凛冽,汉三同志骑在牲口上冻得直打哆嗦。我就将棉大衣脱下来披在他身上挡寒。我们这些年轻人行军还不感到太冷,但拂晓进村后停下来,确实寒冷难熬,只好在那里跺脚取暖。汉三同志见到此景,便又将棉衣披到我的身上,他说:“冻坏了我不要紧,冻病了县长可不行,你还要办公哩。”我又将大衣披在他身上说:“我年轻,身体好,老天爷不会叫我病的,你年纪大了,你是我的老大哥,还是你披

上。”就这样一件棉大衣推来推去，最后还是叫他披上。这一冬天，每到行军必是如此，汉三同志激动地说：“兄弟，你放心吧！我誓死也跟共产党、毛主席抗日到底，我这把老骨头豁出去了。五十多年过去了，汉三同志在抗日危难时刻的这种坚贞不屈的豪言壮语，经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认为，联防区的创建发展和存在，汉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抗战胜利，筑先县县城解放后，汉三同志任县政府建设科长兼任县农场主任等职。1952年聊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他被选任政协副主席。1959年秋，午休未醒与世长辞，享年72岁，举丧时县停止广播，下半旗致哀。汉三同志把晚年的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

张廷俊（字英忱）

筑先县孟营村人。“七·七”事变前曾任孟营高小校长，具有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实业精神的知识分子。

1937年张廷俊组织学生利用校地五亩搞实验田，种植棉花等农作物，其收入作为办学经费、购买教学仪器、补助贫苦学生等。实行勤工俭学，为贫苦农民子弟办了件大好事。

县城被日寇侵占后，他动员儿子张景让（张谦）和本村青年孟筱澎等参加八路军，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张谦后转入筑先抗日县政府司法科工作，筱澎曾任武汉市委书记，其族弟张廷维（宗谦）也是共产党员，长期做地下党的工作，廷维有时委托他代收上级信件和接待来往人员。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心里明白，本村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国民党员。此时他开了一个中药铺，为当地群众治病，久而久之，中药

铺变成了党的联络点。

1943年筑先县遭到了百年不遇的大灾荒，附近村饿死了很多人，这时神汉巫婆四起，求神祈雨。他挺身而出，宣传组织群众破除迷信，拆庙，毁神像，筹集资金，打了十几眼井抗旱，种瓜种菜近百亩，进行生产自救，竟使全村没饿死一人。

1944年秋，他领导全村高小师生早上跑操唱抗日歌曲，配合民兵盘查行人，与日伪周旋，使小股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以后敌人集中了2000余人，进攻该村并指名要抓他，第一天没抓住他，第二天拂晓奔袭该村逮捕他，仍扑了个空。敌人恼羞成怒，便抓了十几名百姓。有的被杀害，村内一度搬空，他从此到根据地参加了工作，任县议员。1944年冬他参加了冀鲁豫行署召开的在根据地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会议，回来后协助政府积极发动群众，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45年夏，他又任孙堂抗日高小校长，领导师生养猪积肥，开荒种地，种棉花等作物，增加办学经费。1946年春他再次回本村办学，校名为“筑先县第三高级小学”。为配合解放战争他还编写教材、宣传品，组织文艺宣传队等。由于他坚决抗日，拥护共产党，维护人民利益，敌人对他恨之入骨。该村暗藏的反共还乡团骨干分子企图谋杀他，村党组织和学校师生为保护这位爱国人士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和王鲁光等同志被推选为筑先县人民代表，出席成立华北政府的选举会议。1953年在聊城第二届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上，他被选为聊城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8年病故，享年77岁。

何器之（名玉成），字器之

他生于1903年，卒于1972年，系筑先县中杜村人。出身书香门第。1923年，中学毕业后考取济南矿业专科学校，1935年，曾任聊城13乡（王官庙）乡长，聊城沦陷后，1939年春组建八路军先遣纵队第一游击大队时，任副大队长，当年秋天被红枪会头子、汉奸团长陈玉怀抄家逮捕，受到严刑拷打，被关在猪圈里。但他坚贞不屈，后经我党通过社会关系将其营救出来。从此，他更认清了敌人的反动本质，激起了对敌人的愤恨，1940年麦后，他任八路军运东抗日游击大队参谋长，1941年兼任四军分区修械所长等职。

1944年春筑先县为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县政府决定建立抗日游击高小，经领导批准他调任校长。他来到教育战线后，邀请了一些民主人士，老教育工作者哈东亮、孙笑仙、苗厚昆、许肖梦、朱明顺等办起了筑先县第一个抗日高小（简称抗高），招录初小毕业的15—18岁的男女学生入学，教育内容是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如教育学生坚决不当亡国奴，为抗日贡献力量等。学生还配合各村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按军队建制编成班、排、连。敌人扫荡时，他率领全校师生打游击上课，把树林村头当课堂。学生的背包行李变成了课桌凳子，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抗高还是一支文化宣传大军，配合中心工作演唱抗日歌曲，活报剧，书写张贴标语等。它又是一支工作队，配合政府工作人员，麦秋两季征收储存公粮等。

教职人员的待遇和脱产的抗日工作人员一样是很微薄

的，每月每人仅由政府发36斤小米，2斤油和250斤烧柴。在此艰苦环境里，他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有用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从建校到1949年该校向国家各条战线输送了300多名优秀学生。

1949年他调任聊城地区联立师范教导副主任。1950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任聊城二中副校长（当时县长兼校长），1960年任校长，1965年10月离休疗养，1972年病故，享年69岁。

何器之同志从抗日战争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勤恳恳为教育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哈东亮（字弼臣）

筑先县哈庄人，他是清末童生，学识渊博，勤勤恳恳为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是一位心底善良具有先进思想的爱国民主人士。

民国初年，他毕业于山东省优级师范（大专）后，在本村创办初级学堂，1919年他多方筹集资金，在政府赞助下，于1920年又创建了孙堂高等学堂，是孙堂高小创始人之一。当时在聊城县公署劝学所（1923年改教育科）任县督学，工作四年，1924年任聊城县师范讲习所长一年，而后又在图书馆和教育科工作。1927年任永清区副区长兼孙堂高小校长，1930年后，任老韩庄高小校长五年。1938年聊城县城被日寇攻陷后，他发誓不当亡国奴，不替敌人办奴化教育，毅然回本村开办中药铺，为当地百姓治病。

1940年秋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聊城易名为筑先

县，他拥护抗日民主政府，积极参加政府召开的绅士名流会议，并参政议政，给政府提了很多好的建议。政府动员各界名流人士参加抗日工作的来往信件多数由他执笔起草。抗日高小建立时，他虽年已花甲，须发皆白，但仍在高小任教。敌人扫荡时他随学生手执拐杖一齐行军，有时由青年人搀扶着走。他不辞劳苦，不惧艰险进行游击教学。他说：“筑先县的抗日教育咱不办谁办呀！要教育学生爱祖国，誓死不当亡国奴。”他这种爱国热情为人师表的行动鼓舞了全校师生，树立了克服种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在全县知识界中，有很多知识分子是他的学生和同事。他对古文古体字颇有研究，大家对他十分敬重，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就向他请教。他诲人不倦，谆谆教导，因此，大家尊称他为“哈老”。

这位令人尊敬的哈老于1957年退休，1966年病故，享年84岁，“哈老”虽与世长辞，但其革命思想和治学精神在聊城教育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陶长林

筑先县城东南王堂村人，贫农出身，不识字，务农，会本匠活儿，曾与别人开几年劈柴园子，是一位纯朴老实忠厚的中年人。抗日时期经本村他的木工师傅王金平介绍，充当蓝枪会大坛主陈殿桢的顶门大徒弟，也是陈的大保镖。

1942年秋，当抗日军民处在敌人据点包围，扫荡频繁，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日伪新民会利用以王殿明为首的红枪会和以陈殿桢为首的蓝枪会反对抗日势力。那时几乎村村有会

道门活动，对抗日人员威胁很大。县委根据敌工部的汇报，认为蓝枪会纯属迷信组织，出身好的陶长林，是被敌人利用了，而红枪会头目王殿明是卖身投靠日本，坚决与我为敌，因此，县委决定拉陈打王，并由政府贯彻执行。

由于陶长林出身贫寒，自幼劳动，思想作风较朴实，对共产党抗日政府的政策容易接受。在此之前，我县政府工作人员高世禄到敌占区征收粮款时，也经常去他家吃住，他接受了些抗日教育，已有一定的抗日思想基础。

1942年秋，我抗日联防区失陷后，他曾以陈的大徒弟和老师的名义率领几百人甚至近千人的武装会员，配合日伪军扫荡城东南我抗日联防根据地。铁蹄所到之处实行了烧杀抢光政策，日寇和伪军抢牛羊家畜和贵重物品，有些蓝枪会员连犁耙镰刀等生产工具也抢走了。这种毁灭性的扫荡，使我抗日人员难以生产和生存。在此千百万人民生死存亡之际，我抗日政府通过陶长林对其某些会员严加管教，自此以后的扫荡才减轻了一些破坏。他为抗日事业办了一件好事。

1943年春天，敌人利用星罗密布的据点和蜘蛛网式的封锁沟，疯狂地扫荡合围寻找我抗日县区武装，企图一举歼灭之。一天拂晓，我县政府和县大队（约300人）为避开敌人的扫荡，从封锁沟东的三区行军到封锁沟西二区的前高香坊村，该区昨天刚被扫荡合围过。拂晓，我县大队尖兵，接近前高香坊村时，被昨晚住在该村的蓝枪会员所阻。尖兵问他们是那部分的，对方回答是陶老师的人，部队只好停下来。此时东方天空已呈现鱼肚白，县政府和县大队如再另行选择驻地，会很快暴露目标。南有魏庄据点，西有谭庄、周店据点，北有刘道之据点，东有封锁沟和花牛陈等据点，有的距

离此处仅有几华里，如隐蔽不好，马上有遭到敌人合围的危险。在此进退两难之际，县大队副马锐锋同志来到我面前说：“宿营地已被昨天配合敌人扫荡的蓝枪会陶长林的人占了，怎么办？”我说：“我去见他，叫他们拉走住别的村。”马问我：“你带多少人去”，我说：“只带两个通讯员就行了”。马认为太危险了，我说：“又不是去打仗，带很多人有什么用呢？”我带了两个通讯员去见陶，当我刚接近该村时被持长矛大刀协会会员阻拦，问是什么人，通讯员回答：“是张县长去见你们陶老师的。”对方问“多少人”，通讯员回答：“三个人”。他一听只有两三个人，才让我们进村。几十个拿长矛大刀的彪形大汉前边领路，我们到了陶的住处，又是三、四十名佩带大刀的彪形大汉守卫警戒伺候。这时，陶还没有起床哩。他的随身大徒弟叫醒他，说是张县长来了，他才慌慌张张地起来，把我们让到他的住室。

进屋后，他说：“你怎么来了？”我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他说：“有啥事说吧！”我说：“请你的人和我带来的人均都退出去，只剩咱俩说吧！”他立即命令所有会员退出去，我的两个通讯员也随着退到屋外。

我说：“你制止了某些会员上次到抗日根据地抢东西是为抗日立了一功。我知道，你虽当了老师也没有仗势发财，你家仍是过着清贫的生活。前几天政府给你家送去了几百斤救济粮是否收到？”他说“已收到了，谢谢政府的关心”。我说：“眼前还有什么困难，只管说”。他说“日本人、汉奸和陈老师光叫我们来配合他们来打八路军，可连一文钱的菜钱也不给，不来又不行。县长你说光让会员吃粮不吃菜能行吗？我本身又没钱，你说怎么办呢？”我说：“那好办，

今天你这几百人的菜金钱由县政府拨给，以后你向日本人和汉奸要，不给钱就不来或少来人。另外，你今天马上集合会员，将人全部带走，到村西边董桥住。腾出房子让县政府县大队住，你并负责向城里方向派出警戒。有情况及时报告我们。如城里敌人出动，你们掩护县政府县大队撤退。”就这样他马上吹哨子，集合会员，按照我们的意图行动了，县政府县大队顺利地住进前高香坊村隐蔽起来，他以其合法的身份，在此紧要关头，保护抗日力量，起了一般人起不到的作用。为抗日事业立了一功。

在生活上他是一个艰苦朴素的人，并未因自己当了陈的大徒弟发国难财而大吃大喝，腐化堕落。他始终保持清贫农民和木工的本色，抗日胜利后，他在县政府工作了一段，因家中无人，回家务农。1977年4月病故，享年71岁。

高世禄

筑先县城东南高香坊人。“七·七”事变前曾在山东省济南旧政府当过小职员，与社会上层人物交往较多。家有土地20多亩，虽系中农身份，但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七·七”事变后，他对抗日工作非常积极，一心一意为抗日救亡奔跑，从不计较个人的职务、地位和名利。抗日民主政府号召挖抗日交通沟（即村与村的大车道路挖成一米多深两米宽的交通沟）组织破路委员会，他是委员，积极领导此项工作，从1940年秋破土动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县二区于集以南抗日人员经常活动的村庄，基本上村与村挖通，联成一片。

每年麦秋两季抗日政府征收抗日救国公粮，他是征收公粮委员会的委员。他积极参加征收工作，常常利用社会关系，不避艰难到敌占区为抗日征粮、征款。他一身廉洁。抗日政府号召坚壁清野，他负责督促检查此项工作。1946年解放军包围聊城时，他在兵站负责粮草工作。由于他年纪大，脾气好，同志们风趣的称他为高委员或“高委员长”，他笑了笑了之。总之，他在抗日过程中，象一头老黄牛，在抗日工作的每一个岗位上都忠诚的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不图名利地位，不避艰险，坚定不移地与共产党真诚合作，抗日到底。

抗日胜利后，高世禄加入了共产党，1949年10月，任交通科长。1952年任县农林局长、建设科长、财粮科长等职。五十年代末期病故，享年60岁。

聂湘溪（原名聂澄泽）

聂先生系筑先县后军屯人，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富有之家，拥有田地四、五百亩，他自幼聪慧过人，五岁读书，十一岁读完《十三经》，十三岁应东昌府试，有聊城才子之称。后就读北京师范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毕业时获得优异成绩，又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深造，孜孜攻读，获得了渊博的知识。

聂先生曾接受过康梁改良主义思想，后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反帝制，鄙保皇，力主共和，反对封建制度。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提倡剪辫子，剃秃头，他首先响应履行，遭到乡邻亲朋非议，慈母不准进门，但他始终不悔。

1915年袁世凯卖国求荣接受日本帝国主义丧权辱国的二

十一条，聂先生以山东省学生代表的身分，赴京请愿，在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的军警刺刀恐吓下，他威武不屈，慷慨陈词，晓以民族大义。其民族气节，令人感动。

1918年，聂先生被选为山东省京议员，在反对军阀政府政治腐败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山东省的督军张树元，贪污军饷三百万元，聂先生与副议长王鸿一等秘密搜集了张克扣军饷、吃军队空额等罪状，在省议会提出弹劾，电告北洋政府，张因此被撤职。

张自忠任天津市长时，聂先生任市政府秘书长兼传习所所长(培训行政人员)，“七·七”事变后天津行将沦陷，各机关一片混乱，所里会计翟东升向他请示：“现存两万元的公款，如何处理？”聂先生毫不犹豫地说：“全部上交”。这与当时那些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见利忘义的官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会计逢人就说：“清廉二字聂先生受之无愧”。

聂先生曾被聘请于山东省立二中任教并担任语文、数学两门课程，他以卓越的才华，渊博的知识，哺育着莘莘学子。学生胡景范等人回忆说：“聂先生语文不但能清晰地传授词章知识，而且在情感上能引起学生们的共鸣，人物的忠奸、问题的是非曲直，判若泾渭。在数学课讲立体几何时，用大白萝卜制成各种立体模型，加强学生的直观性，而且语言简洁，准确，逻辑性强。我们能够考入北平大学、北洋大学均是他给打下的基础。”聂先生不囿于学生只掌握书本知识，更教育学生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当时，虽建立了民国，但实权仍在北洋军阀手里。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保守势力甚嚣尘上，国将破碎，聂先生教育学生要追求真理，趋向民主共和，走向光明。学生李维德(北

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忆说:“我倾向革命,力主打倒北洋军阀,与聂老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大举进攻中国,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京津相继沦陷,有些达官政客摇身一变成为日寇的鹰犬,而聂先生则扮成平民百姓潜回家乡,从此过着闭门不出的隐居生活。这时聂先生故乡——鲁西北的范筑先将军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发动群众,广络有志之士共同抗日,聂先生以社会贤达的名义参与其事。1938年11月15日聊城陷落,范筑先将军殉国,聂先生的家乡顿时又陷入一片混乱,日伪军横行,土匪、会道门蜂起,国民党残部叛变投降日寇,闹得百姓惶惶不可终日。聂先生深居简出,沉默寡言。济南和聊城县日伪方面均有意邀请他出来搞维持会,但被聂先生一一拒绝,他认为与这伙人为伍将是一生莫大的耻辱。

我八路军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在敌后建立三三制(即共产党员三分之一,国民党员三分之一,无党派民主人士三分之一)抗日政权的指示,在范将军殉国后,深入鲁西北各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县、区、村三级政权。为了贯彻上级党委和政府各项政策,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县党、政、军、民工作人员均兢兢业业努力此项工作。我和专署专员谢鑫鹤,二区区长谭启明等同志,曾多次到聂先生家(敌占区,后变为游击区)登门拜访过,向聂先生宣传我党我政府的各项政策。并虚心听取聂先生的见解。我在和聂先生的交往中,感到聂先生的胸怀豁达开朗,落落大方,不拘泥于人,不囿于物,能言善辩,谈笑风声,平易近人。凭他的渊博知识和多年仕途的经验,对当前时局各派政治势力所

执行政策及其发展前途均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记得当时聂先生曾说：“我弟淞溪在黄埔军校毕业，现任国民党高级军官（师长），但人各有志，我认为蒋介石对内消灭异己，对外消极抗战，政府本身腐败无能，从长远看是没有前途的。”在谈到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汪政权时，聂先生说：“异族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中国，执行的是野蛮政策，伪汪政府是为虎作伥，前途也不会光明的”。在谈到对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策时，先生则坦诚地说：

“我不是当着你县长说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好，我以肺腑之言称赞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是中华民族的新生力量，是中国独立的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怕苦，不怕死，光明磊落，以实际行动唤起了民众并与之成为鱼水关系，俗话说‘得民者昌，逆民者亡’，这种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将来在中国掌权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不是其他政治势力。”

聂先生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抗日民主政府根据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政策，在敌占区伪政权人员则进行“人在曹营心在汉”的教育，在其可能范围内向抗日民主政府缴纳一部分救国财粮；在游击区（即敌我双方均常去的地区）则教育两面政权（即敌、我政权）应付敌人，依靠抗日，将征收的财粮，向敌人应酬一部分，另一份交抗日政府；对我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抗日村政权则要求不准向敌人缴纳一文钱，一粒粮。当时聂先生家乡是敌占区，后来才变为游击区，至1943年上半年才变为我占区。为了聂先生的人身及财产的安全，我们和聂先生初期交往时多是在夜间秘密进行，后来环境好转，才改为白天。也就是由秘密、半

公开直至公开。不论是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情况下，只要我们抗日人员登门拜访，聂先生总是热情相待，从未冷落过。他是那一带的大户，在向抗日政府交纳抗日财粮方面，总是积极带头。因此，聂先生家乡一带的征集财粮工作进行得较顺利，更可贵的是先生在极其严峻险恶的情况下，不顾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危，以其威望掩护了我抗日军政人员的安全。据我二区区长谭启明同志说：“1942年冬季的一天，天刚亮，二区区政府区队驻前高香坊，发现村南村北及东边阎屯均有敌人奔我们来，始知被敌人包围了。我带领区队往东撤不行，只有北撤，拟在邢庄突围，到邢庄村边，又发现穿黄军装的敌人赵振华部（伪县警备大队副，死硬汉奸）向我们冲来，而背后又有从阎屯出发的敌人向我们围击，我只好率部再往西撤，去八大庄有蓝枪会掩护，经短时激战，一直撤到后军屯聂湘溪先生家，到他家后，我军政人员共60人左右，分别住他家几座房子，他不但热情相待，还派人四处侦察，监督敌人的行动，并派人为我们站岗放哨。这次敌人合围扫荡二区，我军政人员除傅朝英（通讯员）被俘外，别无伤亡，多亏聂先生和蓝枪会群众的掩护。”启明同志又说：“据当地群众反映，聂先生在‘七·七’事变前就比较开明，聂先生从外地每次回家，离家几里就下车步行，见了乡亲主动说话。”

以上虽是些琐碎事，可见聂先生的性格品德非一般人所有。我认为聂先生是一位正直爱国，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经得起考验的有志之士。

1947年，聂先生因病与世长辞，享年58岁。他的病逝使我党失去了一个真诚的朋友，虽然他已离世，但先生的音容

却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以惋惜的心情怀念着离别近五十年的这位老朋友。

抗日火焰炽烈地烧燃着，筑先县的人们在这场斗争中考验和锻炼着自己。以上几位民主人士有的人后来成了共产党员，他们在“七·七”事变前的旧社会里，大多数是生活舒适而优裕，在政治上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由于他们正直、纯朴、忠厚、办事公道，在人们心目中有一定威望和影响。他们都有要求进步，向往光明的愿望，其品质是可贵的，其生命的光辉，还在于他们后半生接受了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共产党真诚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在不同的战线上为抗日大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历史功绩后人永远不应该忘记。

这些同志一生中如果没有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这段历史，也只能作为一般人了此一生，不闻于世。反之，如果我县抗日各级民主政府不认真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真心实意地团结各界上层非党民主人士，共同抗日，而筑先县这个特殊抗日阵地也很难坚持。地委书记石新安同志曾说：“筑先县这块阵地，光靠我军几支枪是不行的，只有靠认真执行政策，尤其是统战政策”。我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坚持、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爱国民主人士在紧要关头不顾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与党相互信任，亲密无间，真诚合作而换来的。

统一战线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革命事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每个革命发展阶段如何领会其精神实质，不左不右正确地执行，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在抗日初期王明曾提出一

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右了，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限制了抗日力量的发展。党中央毛主席纠正了他的错误路线后，革命事业才前进发展了。在伟大的土改运动中，该县个别领导人头脑发热，偏离了路线和政策，不顾历史，不分青红皂白将在抗日时期与我党合作，有过贡献的某些民主人士，以这样那样的错误不加区别的给予惩处，使其遭受不白之冤，有的甚至株连其下一代，这不能不使我党失掉一部分群众，给党造成不良影响。回顾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应该坚决正确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史学家傅斯年

杨遵田

傅斯年字孟真，汉族，著名史学家、教育家。1896年三月二十六日，生于聊城北门里祖宅。乃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第七代孙。1902年在籍读私塾。1906年入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1908年冬，随进士侯延爽至天津。翌年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文科国文系。1919年在该校毕业后，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生，先赴英国爱丁堡后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及生理，兼治数学。1923年由英赴德，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1926年冬，应国立中山大学之聘归国。翌年春，就任该校教授，兼国文、历史两学系主任。同年夏，在该校创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受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十一月九日，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历史语言研究所宣告成立，他专任研究员兼所长。在担任所长期间，先后兼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1934年任北京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5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曾任旧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48年春，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立法委员。1949年一月二十日担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十二月二十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台湾省参

议会议场，享年五十五岁。

傅斯年自幼勤奋好学，志向远大，酷爱文史，有神童之称，十一岁便读完了《十三经》，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创立《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由他担任主编。该刊是当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之一，首期于1918年元旦出版，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引起社会的关注，同时，也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恶毒攻击。当时有位“文通先生”撰文诽谤《新潮月刊》说：“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并叫喊“政府理应镇压”。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是北大学生代表之一，与罗家伦齐名。他积极参加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响应“拥护民主”、“拥护科学”和“文学革命”的口号，宣扬新文学，提倡新思想，针对当时十分猖獗的复古尊孔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经常在《新潮》、《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痛斥袁氏帝制余孽“国故派”刘某倒行逆施的谬论。“九·一八”事变后，他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唤起民众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同年十月，他出版《东北史纲》（卷一）一书，以不可辨驳的事实，阐述东北三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决不容许日本侵略者践踏蹂躏，表现了一个史学工作者尊重历史史实的严肃态度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严正立场。他担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和旧政协委员期间，是享有较高声誉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国民政府当局对他的才华和能力较为赏识和器重，但他对党政要员的腐败无能极为不满，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其弊端，发泄不平，故有“傅大炮”之称，这里可以看出傅斯年性情刚烈，

说话率直，不溺于富贵，不畏权势之品德。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个人名誉和学者身份与褚辅成等六人，由重庆到达延安，面谒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聆听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民族团结、和平建国的大政方针。同年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并负责学校北迁工作。在原日伪北大供职的容某，专程由北京来重庆拜访傅斯年，他拍案大怒说：“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文章标题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傅斯年此举曾一度在社会上传为佳话。为了保证北大领导层和教职员工的纯洁性，他到职后曾发表过一个声明，他说：“……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岂不成了国家的罪人……”。这里可以看出他致力于国民教育的高度责任感和对丧失民族气节者的憎恨。因此他得罪了一些人，但他毫无顾忌，他曾这样说过：“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却不作乡愿。”“不作乡愿”实在是他本人品质的真实写照。因他致力于国民教育建树颇著，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立法委员。在中央研究院任职期间，凡院内一切制度的确立、各种规章的制定及院士制度的施行，襄赞之力实多，因而被誉为学术界能治学又能治事之稀有全才。然其毕生心力则大部尽瘁于史学研究，在其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筹措语言实验、古物发掘、人体测量及民族调查仪器百余种，先后造就各类优秀研究人才近百名，刊行历史、语言、考古、人类等诸学科专著七十余种，发表论文五百余篇，中外图书入藏多达四十余万

册，皆其领导擘划之功。1949年他就任台湾大学校长职务后，在第四次校庆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详尽阐述了他的办学之道和对青年一代殷切的希望。演说的最后部份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一个大学必须大家一心去办才能办好。我所谓大家者，包括全校教职员、学生、工友在内，同学们能勤劳改善，先生们自然感到鼓舞；先生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同学们自然得到启发；大家一直向学术进步的路上走，这个大学自然成为第一流的大学……。我希望我们全校有个意志，这个意志就是使学校进步”。另外，他还在《中央日报》、《新生报》及《校刊》上发表谈话，说明他的一为学术，二为青年，三为中国、世界的文化以及扩充知识、追求真理的办学宗旨。在具体工作中，他强调：“办学要先替学生解决所有的困难，让他们有安心求学的环境，然后才能要求他们勤学。”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先从提高师资水平入手，以优惠待遇征聘有识之士到台大任教，坚决停聘了那些教学既不行又不负责任的教师。为掌握在职教师的工作状况和教学进度，他常常巡查教室，并在教师下课以后，到学生中间，听取他们对教学的意见。这样做既能随时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又能促进教师的责任心。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教学质量的重视和事必躬亲的认真态度。他在台大任职的两年，虽然工作千头万绪十分繁忙，但对接见学生、答复学生的来信从不忽略，而且很少假手于人。平日他对学生生活细节也非常关心，常到饭厅去看看是否足够营养，到学生宿舍去瞧瞧是否整洁。他对学生不像是校长对学生，而是像慈母对爱子。他对学生及属下的真挚感情和办事认真、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深受广大教职员工及学生的爱戴和崇

敬。为了怀念这位学识渊博、治学谨严、素负盛名的已故校长，台湾大学将他生前专著《东北史纲》一卷，《性命古训辨证》三卷，论文百余篇及稿本《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等辑印为《傅孟真先生集》六册。1951年1月13日“台湾大学纪念傅故校长筹备委员会”做出决议，将台大校园门前的椰树林区辟为“傅园”，傅斯年的灵灰安葬于此，以资纪念，永示后生！

注：此文参考《台大史报》、《中国时报》、《民国人物小传》、《中外杂志》及白万祥先生、傅振伦先生等提供的资料。

杜光坝小传

李瑞阶

杜光坝（1900—1975）字毅伯，聊城老韩庄人，出身书香门第。父履平，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东昌府中学及东昌府师范，后擢任山东省视学。光坝幼承家教，禀赋颖异，幼年就读即斐然有声。1920年北京大学预科毕业，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以故未成，继续就读北京大学法科。次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攻政治学，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公法，获法学硕士学位。次年夏，博士科试及格。正撰博士论文时，屡为国立中山大学函促，遂于1928年回国，当年六月，受大学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兼教务长。既而青大易名为国立山东大学，仍长教务。1936年因病辞职。1937年受聘为教育部专门委员兼高教司第一科科长。抗战军兴，受命筹设国立湖北中学及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职员服务团，自任第五团团长。1940年，赴国立西北大学，历长总务、训导、教务及文学院。1942年，回重庆任监察委员。1948年当选为立法委员，迭主外交委员会事务。入台后，又兼任东吴大学、东海大学教授，并兼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所长，制定非洲研究计划，屡次出国考察。1968年春，受聘为美国辛辛纳提大学客座教授，获该校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70年12月，被海牙国际公断法院聘为公断员，国

人荣之，多年勤劳过度，1975年9月20日以心疾在台湾逝世，终年七十五岁。光坝勤于治学，著译书十余种，其中《现代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及《民主国家宪法问题》两书尤为风行。历任各大学教授，培育英才甚多，尤以主办外交研究所时，英俊更多出门下。逝世后，赢得门人的追思怀念，即在朝人士亦称学绩蜚声云。

鲁西北现代教育先驱孙东阁

生平事略

孙竹事 许欽明

出身农家的教育名流

孙东阁，原名孙宝贤，1880年出生在山东省临清县东张堤村（现为临西县）一个农民家庭里。他自幼聪颖过人，早年在村私塾随张五秀才读书，勤奋用功，才智超众，深得老先生爱戴。十八岁入县旧制中学学习，功底深厚，每有独到见解。后在亲友资助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1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孙先生初在北京私立山东中学任教，继被调回省任教育厅督学。1919年出任省立聊城第三师范校长。1930年回任省厅督学。1931年任临清六县联立乡村师范校长。1937年为避战乱到川、陕地区任教。解放后任教于历城县中学，曾作为模范代表参加过省教育工作会议。后经省长赵健民介绍，担任省文史馆馆员，并当选为省政协常务委员。1965年5月病故于济南，享年八十五岁。

孙先生执教数十载，桃李满天下，是一位出身农家的教育名流。他把毕生精力投入了人民的教育事业，热情关怀和培养有志青年，对党的教育事业和鲁西北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鲁西北现代教育的先驱和著名教育家，是值得我们

永远怀念和学习的楷模。

深受爱戴的民主校长

孙先生在聊城三师和临清乡师先后任校长十七年之久，在社会各界是位德高望重的民主校长，并深受广大师生所拥护和爱戴。这是和他积多年办学之经验，非常推重尊师爱生和民主办学分不开的。

当时学校教职员受聘于校长。三师前任校长徐中显系临沂人，教职员二十余人，大都是临沂派系。孙先生初来，很多人准备卷铺盖。但他改变了以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把包括教务主任张伯溪和训育主任乔井梧在内的大部分教员均予留任，很快稳定了教学秩序。后又从北师大和济南优级师范毕业生中选聘了一批青年教师，建立了一支教学骨干队伍。

孙先生为人正直厚道，用人上选贤任能，没派系门户之见。对教职员一视同仁，同乡同学不予偏袒。北师大毕业生刘少清年轻有才干，来校不久即任教务主任；老教师乔井梧富于工作经验，留任训育主任多年。

孙先生为一校之长，但从不摆架子，待人十分谦恭和气。工作兢兢业业，勤于操持，但在具体事务上不揽权力，总与同仁协商处事。除大事在定期的校务会上研究外，教务、总务等工作放手下级去做，不加干涉。

当时办学经费虽然困难，但孙先生始终主张按月发放教职员工资和学生助学金，从不在师生身上揩油。为办好伙食，坚持从学生中推选厨长，每学期改选一次。在三师时，

每年为学生发一套制服，有一年还发了个床单。这些事情受到了师生员工的交口称赞和拥护。

孙先生十分爱惜人才，不仅谆谆训育，还乐于助贫就读，资助了难以数计的学生。学生有什么问题乐意找校长排解，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教诲，从不发脾气和任意处罚学生。使学生心悦诚服，自觉改正错误和缺点。三师讲习班学生邵河林，乡师二级一班学生张祥甫、李振海等家中困难，虽有助学金，仍不能维持生活，孙先生就多次解囊相助，或安排他们干添油、擦灯罩的零活，挣来半个工友的钱，以克服经济困难。三师毕业生栾居荣有体育特长，但家境困难，孙先生就资助他考上上海体专，毕业后回校任体育教师。任景福音乐功底好，在孙先生的帮助下，考上上海音乐学院，后来成了四川名音乐家。还资助崔景和到上海深造，使其后来成为三师出色的美术教师。孙先生宁肯自己省吃俭用，不仅时常资助贫寒学生求学深造，还多次向临清私立武训小学捐款，计有千余元，甚为时人所崇敬。

在孙先生的悉心主持下，三师、乡师的教学秩序良好，教师感奋，乐于施教；学生有志，勤于所学。不少教师如王晋庭、张国昌、陈子源、李可亭、吕济川等，达到了教授、副教授的水平。众多学生考取了名牌大学或成了优秀教师。他们回忆起自己的成长，无不深深怀念孙东阁校长。

改革旧学制的探索者

孙先生执教伊始，正逢军阀混战的年代。他对祸国殃民的黑暗政治极其厌恶，把中国落后之根本原因归咎为洋人和

买办资产阶级交相作恶，及人民愚昧。立志教育救国，改革旧制，完善教纲，培养大批师资新人，进而普及民众教育，以改造和推动社会。

聊城三师原有讲习班、预科班和本科班，学制分别为二、一、四年，这种学制与培养掌握现代知识的人材不相适应，在孙先生倡导下，于1922年改行了新学制，即前师三年，后师三年，还增设了专业课程，分为文理两科。

孙先生不仅关注学生掌握真才实学，而且更重视学生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时值教育界复古风盛，省教育厅长王寿鹏系前清状元，极力提倡四书、诸子百家等古文。孙先生对此强烈不满，斥其为“贩卖古董”，想再走“八股文”的老路。他不仅不去聘请那些秀才、举人任教，却反而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如三师教师阎仲容、韩士珩等，常从《晨报》、《大公报》、《向导》和《新青年》等报刊上选讲革命文章，使学生们接触到新事物和革命思想。乡师语文教师赵贯一知识渊博，除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诸如左拉、莫泊桑、朱自清等人的进步作品外，课余还经常讲共产党反“围剿”以及国共合作的斗争形势，使学生们受到启迪。乡师训育主任马天庆积极支持学生参加“读书会”，二级二班“读书会”的活动，就在他的办公室进行。利用“读书会”活动，他经常向学生讲国家大事，国民党政府腐败及终将灭亡的道理，激发了有志青年学生的革命热忱。

孙先生在乡师兼任历史课。讲近代史时，向学生们讲授帝国主义侵略和满清统治阶级丧权辱国的史实，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以及红军的反“围剿”斗争的情况。一次期末考试时，还出了“列宁是什么

人”、“什么是苏维埃”的试题。

在孙先生的支持下，三师、乡师均出版了校刊，三师《周刊》提倡新文化、新思潮，发表批判军阀投降卖国、争权夺利的评论、小品文，也发表研究杜威教育和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学术论文。乡师校刊经常刊登抗日救亡新闻、登载时事评论和抗日文艺作品等，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934年旧历年关，中共乡师党支部领导抗日的学生开展了一次大的宣传活动。油印了四、五百份传单，并将其折成四方形小包，内中各装一枚铜钱，待夜幕降临后，突然在露天剧场上空抛撒，观众顿时骚乱起来，争相抢拾传阅。次日全城大街小巷议论纷纷。这次活动既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也使敌人受到了震动。

孙先生热心支持学生的自治活动，由学生推举“学生自治会”的正副主席。为便于他们活动，在乡师专设了两间自治会办公室。每学期召开有关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的校务研讨会，都有学生代表参加，提出改进教学的意见。学校经常举行班级辩论会和学校演讲竞赛会。学生们交流学习心得，抨击时事政治，既增进了学识，提高了政治觉悟，又锻炼了演讲能力。如三师学生张培介、赵文伟等讲演起来很有些演讲家的气魄。在乡师的一次演讲会上，赵健民针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形势，抨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所谓“曲线救国”实则卖国投降的政策，受到与会师生的高度赞赏。此时乡师的气氛十分活跃，办有黑板报，组织了篮球队、话剧团。由颜菊清等参加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一元钱》、《姊妹花》、《孔雀东南飞》等抗日和反封建剧目，在临清各界和农民中产生过一定积极影响。

孙先生主办师范教育多年，对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师资人才，积有深切之体会。在乡师提出了明确的育人标准：“学生要有革命精神，要有健康的体格，要有农工的劳动身手”。这几行大字在校门两旁的白粉墙上赫然在目，激励着六县来求学的热血青年。

乡师还谱写了自己的校歌，是对其办学宗旨的最好注脚。歌词是：“清渊（临清旧称）古郡，卫河之滨，联立乡师崭新焉一新。萃六县之英俊，历四载之陶甄。要有农工身手，要有科学脑筋，要有艺术兴趣，要有革命精神。努力，努力！前进，前进！发展乡村教育，改良社会习惯，吾侪切莫惮艰辛。”孙先生常和师生们一起唱这首歌，以抒发献身乡村教育之激情。学校大门前有一片空地，他经常和师生员工一起种菜，对办学宗旨做到身体力行。

兴办民众教育的先驱

孙先生自幼为武训办义学的轶事所影响，学生时代更加体会到穷人读书之艰辛，常怀着扶贫就读的拳拳之心。回鲁西北任校长后，实现这种夙愿的机会到来了。

在聊城三师，他集教务、政务于一身，已是十分繁忙了。但每当他察知城内穷苦人家的孩子仍不能就读时，便感到心中很不安。由于受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燕子矶小学的启示，遂决心创办平民小学。把三师附近上不起学的贫苦儿童组织起来，集中到学校东边一处宅院里学习。起初四、五十个学生，两年后发展到一百多个学生，分为两个复式班，由师范高年级每班轮流教课一个月，并选出主任一人，负责行政、教务工作。平民小学的学生免交学杂费，上课选在下

午师范自习时间。这样，不仅给南半城的贫苦子弟带来了学习机会，也锻炼了师范高年级学生的教学和办学能力。

三师原没有招收女子入学的先例，孙先生决意扫除违背时代潮流的旧传统，率先开了鲁西北女子师范教育之先河。于1923年招收了两个女子班，一级八十人，设立了三师女子学部。1924年又招收了第二级女生。这给后来三师改行新学制，实行男女同校合班打下了基础。

孙先生曾两次任省厅督学，先后多次到鲁西北视察教育，亲眼看到学校少、师资少，兴办教育困难重重的境况，次次牵动他返乡执教之夙愿。于1931年秋他第二次辞去督学之职返抵卫运河畔的家乡临清。当时鲁西北各县负责教育的人员多系三师的毕业生，经老校长倡导，便有临清、夏津、馆陶、清平、冠县等六县响应，决定集资举办联立乡村师范。乡师建于1931年秋，校址设在临清城东门外原省立第二职业学校旧址。省厅任命孙东阁为首任校长，起始招生两个班，男女兼收。学制原定三年，后改为四年。学生每人每月享受五元助学金。课程设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教育概论、心理学、公共卫生、农业、三民主义以及音、体、美、手工等科。

1937年10月临清县城陷落，乡师自行解体，孙先生亦被迫流落异乡。乡师的历史虽然仅有短暂的六年，但孙先生呕心沥血所开创的乡师教育的业绩将永垂史册。乡师不仅为鲁西北六县培养了一大批进步师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乡师发展起了党的组织，为鲁西北抗日游击战争准备了一批优秀干部。乡师学生在组建地方抗日武装中起了先锋作用。如抗日初期临清吕寨区马镜波和崔绍武领导的义勇军，抗击

了日寇，保卫了地方，建立了宏毅县。后这支队伍参加了范筑先将军领导的部队，改编为第十六支队，以后随八路军东进纵队东进，组建为卫河支队。赵健民在冠县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第三营，战斗力很强，使日伪闻风丧胆。临清第一任抗日县长史烈光、馆陶抗日县长孙琳盘等都是出自乡师的学生。

革命师生的保护人

孙先生虽为无党派人士，但他极富爱国之心，一贯同情支持革命，憎恶军阀、官僚和国民党反动派、同邪恶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党的事业和保护革命师生做出了贡献。

早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对反动当局迫害进步学生，他就极力反对，曾直言不讳地说：“凡是师范的学生我都保护，肯定的说，他们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使三师许多学生免遭迫害。

北伐革命战争时期，他衷心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持进步学生张廷焕、宋占一、李连成、谷金兰、马金钊、耿春祥等分赴广州、武汉军官学校和农民讲习所，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技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三师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公开进行大辩论，甚至打起架来，在斗争中广大师生分清了革命与反革命。1928年春，国民党在校内的活动有些消沉，而共产党、共青团的组织得到了发展。五个年级都有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有党团员五十人左右。孙先生同情和支持学生们参加革命组织，其三子孙仰周也加入了共青团。后仰周参加了革命队伍，曾任鲁西北抗战日报社社长，冀鲁豫边区出版社负责人，1942年遭日寇袭击牺牲于范县。

后来国民党在三师制造白色恐怖，逮捕了共青团员刘兰惠、舒连景等人，孙先生亲自出面营救，将其保释出狱。共青团员刘荫昌为当局缉捕对象，孙先生便提前发给毕业证，增发助学金，让其提早离校走脱。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推动下，乡师党支部组织过三次革命运动，都得到了孙先生的有力支持。一是组织罢课，反对六县国民党县教育科长会议，对助学金发放“济富不济贫”的决定进行坚决的斗争，结果取得了胜利；二是利用漫画、传单或说理斗争，揭露国民党员训育主任玄大庸、赵干堂压制学生运动的罪状，迫使其反动气焰有所收敛，或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三是开展“读书会”活动，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救亡运动。这种读书会，名誉上是学生自治会领导下的一个课外学习组织，实则是党的外围组织。参加读书会的积极分子后来很多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如史烈光、李奎元等。

“九·一八”事变后，乡师学生带头闹学潮，游行示威，要求抗日。对同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的学生代表，孙先生在他的办公室给予热切鼓励。代表返校后，孙先生十分关切，给予慰问和勉励。

1932年，乡师党支部书记李恩荣被叛徒告密，敌人要逮捕他，孙先生得知后，及时安排他转移而脱险。1934年，临清国民党县党部奉上司之命，要查处乡师学生孙琳盘接收上海共产党组织所寄文件事，孙先生被传到县党部问询此事，他未及返校，便电话通知教师郝冠英速将文件转移到他的住室。待县党部人员带警察来搜查，未获凭据，只好愤怒而去，使孙免遭迫害。

忆李俊昌教授

金永昌

李俊昌教授别号杰民，1905年7月28日（农历六月二十六日）生于山东阳谷县城北四甲李村（现属聊城市）。自幼在家读私塾，后到山东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上学。1923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初中班。他是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同窗好友，1926年秋我们在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初中毕业后，一同到上海升学，他考入私立上海艺术专门学校，我考入私立惠灵英文专门学校，每逢假期时常来往，亲密无间。

记得他在田汉先生主办的南国艺术学院学习时，我和阮庆来、张立宋于暑假中到该校同住。我们四人经济不裕，经常到街上小摊买饭吃。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对于时事敢抒己见。当国民党军队初到上海时，有个口号是“一切权力属于党，党权高于一切”。他就说这个口号可以改为“一切权力属于蒋，蒋权高于一切”。白崇禧在上海掌权，专门迫害进步人士。俊昌常说，这些新军阀无法无天，乱杀百姓。害民贼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我们叫他不要乱说，他则认为我们是不识时务。我们在南国艺术学院同住期间，他常和两个同学密谈，后来才知道一个叫冼星海，一个叫洪潘，当时都是进步学生。

1928年俊昌转入国立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钢琴、小提

琴和声乐。他在北平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出，担任钢琴独奏节目。1931年他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院留学，次年转到法国巴黎西撒·佛郎克音乐院学习声乐和钢琴。当时他的老同学冼星海正在巴黎就读。他们两人和曾竹绍、郑志声同交一份学费，跟一位法国音乐家学声乐。俊昌在法国和冼星海过往密切。星海学成回国后，走上革命的道路，为人民革命事业写出了不朽的乐章。解放后出版的“冼星海画传”有一张照片就是俊昌和星海、曾竹绍、郑志声等在法国求学的合影。

俊昌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由巴黎回国，抗战初期到武汉经冼星海介绍在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任教。武汉沦陷后，迁到重庆后仍在战干团及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工作。1940年秋到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乐剧科主任。以后又到重庆国立音乐院教授钢琴和声乐。1943年秋到安徽阜阳教学。1944年春在安徽金家寨安徽师范学院创办音乐系，任系主任，后迁芜湖。为提高教育质量，曾邀请南京国立音乐院教授江定仙、陈振铎等人到该系兼课。

解放后，安徽师范学院与安徽大学合并。1950年回山东济南市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任教，1956年秋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音乐周，1958年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和山东省人民代表。1964年曾在病榻口述“山东省音乐界今昔对比”的材料，并在山东省人代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上做了书面发言。1964年2月21日因心脏病在济南逝世，终年56岁。山东省艺术专科学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人民音乐月刊》刊登了他逝世的消息。他的老师田汉先生还专门发来唁电，表示悼念。由此可见，国家和人民对于这位无党派爱国主义者、音乐教育家是十分敬重的。

傅懋勳教授生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顾问，民族语文杂志主编，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傅懋勳同志因病于1988年9月13日21时17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77岁。

噩耗传来，人们都为失去这位蜚声海内外，把一生献给祖国民族语文科研事业的学者而悲痛万分。

傅懋勳同志，字兹嘉，1911年5月16日生于山东省聊城县。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9年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曾任华中大学、华西协成大学讲师、副教授。1945年任华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研究语言文学，1950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年底，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国工作。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少数民族语言组组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该所与民族研究所合并，任副所长。曾先后兼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和云南民族学院教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顾问，国家民委五种丛书编委

会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诸民族语言文字编写组主编，中澳合作中国语言地图集主编之一，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四、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傅懋勳同志从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著述宏富，四十年代初发表的《维西么些话研究》是研究中国云南纳西语的早期学术专著。1948年出版的《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对纳西族东巴经做了科学的记录和译解，是研究纳西族文化历史的重要成果，为文学发展史研究、古文象形表意文字的解读、纳西族语言史和同系属语言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文献。1950年的博士论文《彝语描写语法》是四十年代初期他亲自到四川凉山地区搜集资料写成的一部比较系统的语法书，常被外国学者引用。1981年、1984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上、下册，是根据他四十年代收藏的写本，潜心研究写成的另一部专著。对东巴文释读的功底之深反映在对这种图画文字的解读上，经他的研究与解读，使人们看到古代图画文字的一种最有价值的范本。傅懋勳同志对纳西语和东巴文的研究取得了举世闻名的成就，他的研究领域还涉及彝、羌、傣、佤、维吾尔、汉等多种语言，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

傅懋勳同志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规划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五十年代起，作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的组织者之一，参加领导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举办训练班培训七百多人组成七个调审队分赴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土语进行普遍调查，记录了大量的词汇、语音、语

法材料，这在中外语言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协助党和国家领导部门制订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指导了为我国十多个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性的论文，阐述创制文字的基本理论和步骤。他指出，设计文字方案必须选择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对方言土语加以比较，并详细论述了比较的步骤和方法。在设计文字方案方面，他以已有文字的各种语言为例，说明文字与音位之间的种种关系和设计字母的一些原则问题，他参与制订了我国民族语言学科的长期规划，并组织实施。为了巩固民族语言研究以往的成就，适应新的需要，创造新的业绩，在《民族语文》创刊号上发表的《全面开展民族语言研究》一文中，他提出了语言现状的调查研究、创制改革文字的研究、关于无文字的語言的使用和发展问题的研究、语言规范化的研究、词典编写工作和词汇学的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翻译问题的研究、语言类型和对比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古文字和古文献语言的研究、少数民族诗歌韵律的研究等十个方面的研究课题。高瞻远瞩，符合民族语言学科的实际，尽管过去十年了，现在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傅懋勛同志在培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人才方面不遗余力。除了在高等院校中担任教学任务外，还主持举办了三次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他的学生遍及中央和各地民族语文工作机构、民族院校和有关科研单位，有许多人已成为专家、教授和负责干部。在晚年，他总结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近五十年的丰富经验，为《民族语文》杂志撰写了29篇《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讲话》。这个《讲话》原计划连载30

次，最后一讲只口述了初稿，没来得及整理成文他就住进了医院，不料这竟成了他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

在傅懋勛同志的积极倡导下，1979年创办了《民族语文》杂志，从规划办刊方针任务到制订编辑工作原则、物色编辑人员、沟通国内外学术交流、审定稿件乃至主持编委会议，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使这份杂志为促进民族语言学科的发展、培养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傅懋勛同志曾赴苏、日、法、美等国考察，进行学术交流、参加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为我国对外学术交流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傅懋勛同志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新中国建立初期即从海外归来，把渊博的知识奉献给人民，在中国民族语言学科的建设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公认的语言大师。他尊重少数民族，在民族团结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追求进步、严于律己，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决拥护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支持各项改革，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

傅懋勛同志待人谦和、真诚。他善于发现人才，提携后进，指导过许多研究人员著书立说，培养出硕士、博士研究生。他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尊重集体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

根据傅懋勛同志遗愿和亲属意见，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的遗体已于1988年9月15日在八宝山火化。傅懋勛同志的优良学风、崇高思想、献身祖国民族科研事业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秦汉隋唐史学家傅乐成

杨道田

傅乐成字力更，号秀实，聊城人。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6月29日生于聊城祖寓北门里。自幼在籍读私塾。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随家迁至济南，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在该校毕业，旋赴北京辅仁中学就读。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春，赴贵州铜仁国立第三中学高中部读书。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在该校毕业，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抗战期间联合举办之大学）历史系读书。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在该校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南京在珠江路教会中学任语文、历史教员。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夏，应聘到国立河南大学任助教。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10月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后任历史系助教。1956年升任讲师，旋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荣誉博士学位。1959年升任副教授。1964年升任教授。在他任教授的十几年中，除在台大授课外，还在陶仁、辅仁、师大、成大、淡大等高等院校兼课，还兼任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主持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和秦汉史研究室的工作。1984年2月11日夜，病逝于台湾大学医院，终年62岁。

傅乐成自幼聪慧，勤奋好学，酷爱文史，善唱京剧。青年时代政治思想较为激进，爱国之心尤为强烈。在北京辅仁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他为辅仁中学学生代表，并被推选为游行领导人之一。游行当晚即被捕入狱，后经其伯父傅斯年保释出狱。在贵州铜仁国立三中读书时，主持校内墙报、编辑校刊工作，热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期间，为该校“诗学会”主席。并曾组织领导“捣孔会”（孔：指孔祥熙），经常发表文章抨击贪官污吏。在大学执教期间，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富有同情心的史学教员。有时他批评学生也非常严厉，正如台大师生对他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位钢嘴豆腐心的人”。学生遇到困难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方面的，他能慷慨不吝地伸出援助之手。被他资助过的学生、工友不在少数。他待人诚恳，乐于助人，提携后进，视学生如子弟的品格，深受台大师生员工的钦敬。他在美国留学研习期满，校方以优厚的物质条件和工作环境，聘他在该校任教，被他婉言谢绝，后经哈佛大学校长委托胡适从中斡旋，他也没有允诺，执意回国从事他的史学研究工作。他对自己的亲属加入美国籍极为反感，斥之为“非我族类”，并责问他们：“研究中国历史为什么要在美国研究而不回中国”。从此可以看出他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回国后，他除了坚持正常的授课外，其他的时间全部用到秦汉隋唐史的研究上。台湾史学界称他为“台湾秦汉隋唐帝国的祖师”。他的研究成果中的独到见解，曾被日本《史学杂志》给以高度的评价。他一生著述甚丰，皆为史学论著，较有影响的有：《中国通史》上、下册，《秦汉史论文集》。

《隋唐五代史》等著作，其他论文散收在许多报刊杂志上。他的史学论著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为台湾、香港、日本、南朝鲜及东南亚各国高等学府学习中国史之必读书。

傅乐成性情耿直，不善苟合，有傲上而礼下，扶弱而击强的美德。步入老年后，体弱多病，孤身一人，思乡情深，时常独自低吟“不敢望到南京城，但愿生入吴淞口”的词句，在这悲凉的吟诵中，流露出他对故乡的眷恋和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期盼。在他1969年2月所写的一章自述里曾这样写道：“……服膺老庄，欲望甚低，从政经商，索无兴趣，且秉性生硬，自知绝非政经界中人也。年将老大，来日无多，候四、五年后，合于退休资格时，决辞退教职，专事著作，撰写书二三种，以贻来者，则毕生之望足矣”。当时年仅47岁的傅乐成，已萌辞退教职之心，且打算专心著书以嘉惠后人，可惜这个计划终未实现。他还设想撰写一部《傅斯年传》也未能完成。傅乐成病逝后，灵骨焚化，暂厝台北市善导寺内，生前曾嘱亲朋好友，待祖国统一后，将其骨灰与其先父一起归葬聊城原籍。为了怀念这位著名史学家，台湾大学、中兴大学、台湾史学会曾为其联合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设立“傅乐成教授奖学金”，台湾大学将其生前主持的“秦汉史研究室”易名为“傅乐成教授纪念研究室”永示后生。

附：傅乐成著述要目

公元1950年发表论文《西汉的几个统治集团》；

公元1953年2月发表论文《杜甫的死》，同年12月发表论文《突厥的文化和它对邻国的关系》，论文《回纥马与

朔方兵》；

公元1954年发表论文《杜甫的政治》；

公元1957年发表论著《隋唐五代史》；

公元1958年发表论文《唐人的生活》，同年发表论文《玄武门事变的蕴酿》；

公元1960年发表论著《中国通史》；

公元1962年发表论文《唐代夷夏观念之改变》；

公元1963年发表论文《唐代宦官与藩镇的关系》；

公元1969年11月发表论文《中国民族与外来文化》；

公元1972年发表论文《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公元1974年发表论文《天宝杂事》；

公元1976年发表论文《汉法与汉儒》，同年发表论文《汉代的山东与山西》；

公元1978年发表论文《西汉文景时代政情之分析》；

公元1979年发表论文《论汉唐人物》；

公元1980年发表论文《李唐皇室与道教》。

（此文参考资料：台大史系导报，以及傅乐新、傅乐桐等提供的资料。）

辽金史学家傅乐焕

杨遵田

傅乐焕，辽金史专家。1913年9月23日出生在聊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28年以前曾在济南读书，后因父丧而一度辍学。1930年冬得堂叔傅斯年之助，到北京前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充任书记员，边工作边刻苦自学。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在该校毕业，应聘到前历史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随研究所迁长沙、昆明、四川省溪县李庄、重庆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研究所迁至南京，早在1942年他发表了《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对了解辽的疆域和地理情况极有参考价值。由于这篇论文史料充分，论证翔实，获前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1947年由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继续从事契丹、蒙古及中亚民族史的研究工作。留学期间，完成了《捺钵与韩鲁朵》一书的写作，获得博士学位。1951年返回祖国，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和学术委员。1966年5月23日在北京陶然亭不幸去世，终年53岁。

傅乐焕是一位饱经祖国忧患，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高度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初治宋史，后改治辽金史的新

究。抗日战争期间，虽然辗转流徙，倍尝战乱之苦，但是研究工作从未中辍，在英国留学期间，当他听到帝国主义分子散布分裂我国西藏的反动言论时，非常愤慨，坚决予以驳斥，表现了一个史学工作者尊重史实无私无畏的严肃态度及以维护祖国统一为己任的高风亮节。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处异邦，欣喜若狂，不顾个人安危，拒绝了来自各方面的利诱和阻挠，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十多年来，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埋头工作，勤于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翰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关于达翰尔的民族成份和识别问题》等三篇论文。此外，在主编《满族简史》、《金史》，编绘《中国历史图集》，校点《二十四史》，编纂《辞海》和《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及各项教学研究工作中，都积极努力，深入实际，认真细致地进行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是国内外有影响的辽金史专家。

傅乐焕一生治史谨严，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建树颇著。他为人诚恳耿直，作风正派，关心同志及青年一代的成长。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史学工作。十年浩劫初期，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惨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迫害，被摧残致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沉冤得以平反昭雪。1982年中华书局将他生前编著的论文集《辽史丛考》一书勘印出版以示纪念。

（此件参考资料：《辽史丛考》，及傅乐新、傅乐桐等提供的资料。）

书法家刘克平轶事

杨道田

刘克平字志岑，聊城人，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任聊城农林学堂代理庶务长，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任聊城乙种商业学校校长。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北伐军攻占聊城被推选为聊城县长。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任聊城县参议长。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刘克平自幼随父亲刘翔麟读书，喜爱书法，初学欧体，继而学北魏，所得各家之神，自成一格。他的字端庄工整，刚健不折，笔力遒劲，挺拔清癯，清末民初与顾逢臣、戴介臣共为聊城三大书法家，被书画界敬称为“聊城三臣”。

刘克平性情刚直纯厚，不谀权贵，民国初年东临道尹柯延龄得知刘克平收藏有砖塔铭碑帖，借去一阅，看后爱不释手，留下字帖差人送来二百块银元。刘克平气愤地说：

“我家虽穷，但尚不卖字帖”。将钱退还要回了字帖。一介穷儒不惧权势极大的道尹之威，被世人传为佳话。

清朝末年，刘克平受聊城农林学堂监督马樾庵之聘代理该校庶务长，以白银六万两命刘克平东渡日本采购仪器标本等。后又以白银十万两负责新建南宿舍。仅此两项即可得回

扣白银一万六千两至二万两。名曰回扣实则贪污或行贿。刘克平分文未取，所有银两全部用于采购和建筑，不但他自己不要，还规劝学堂监督“以前程为重，分文勿取”，马樾庵以为至理良言，亦得保持廉洁清名。

张宗昌任山东督军时，在聊城县除征收地亩钱粮外，又加征税收六万块银元。时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百姓实无力交纳如此重税。地方士绅公推刘克平赴省请求减税，他欣然从命。抵济后他多次向省长林宪祖恳请，最终减免加征税收四万块银元。刘克平如释重负回聊复命，来回往返糜留多日，他仅报销了三十元的车费和住宿费。有人问：“为什么不报销饭费和吸烟费？”刘克平说：“我在家也吃饭也吸烟，为什么要假公济私呢？”刘克平为民请命，廉洁奉公，造福桑梓的品格为士人所钦敬。

1928年北伐军攻陷聊城，道尹陆春元潜逃，原聊城县长被扣押，全县八个区的区长及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王慕桥等人公推刘克平为县长。后国民党上层委任李云庵到聊城任县长，刘克平卸任。全县八区民众持梭标游行示威支持民选县长，并到刘克平门前席地静坐以示拥护，刘克平再三向民众解释说：“你们不能陷我于不义，再这样下去，我马上就离开聊城”。民众听后无奈散去。从此李云庵对刘克平十分敬重，经常登门拜访，共议为政之要和切磋为人之道。

刘克平家世代以教书为业，父亲去世后，奉养母亲及家人的重担落在他的肩上。弟兄五人，刘克平行三，大哥早亡，二哥分居，四弟过继，五弟出家，他以教私塾为业，收入微薄，一日两餐均为高粱窝头和咸菜，他每顿饭买两个馒头（每斤八个）炒点菜专给母亲食用，并教育儿女们，祖母

用饭时不得近前，为此老母心甚不忍，多次斥责刘克平不该如此。因二哥家生活困难，将县府门前的祖宅卖掉，约得银元一千块。刘克平对二哥讲：“大哥早亡嫡子尚在，二哥生活拮据，比我困难。我的收入已足供温饱，不再分祖产，由你们两家共分，我只要父亲以朱笔圈点过的一部四书足矣”。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刘克平子少卿，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出任山东省立第十三中学第一任校长。临行前刘克平谆谆告诫说：“咱家虽穷，不义之财绝不能要，切记！”少卿谨遵父命一生不沾不贪。刘克平事亲至孝，关心昆仲，严课子女，堪称楷模。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日本侵略军攻陷聊城后，伪县长多次出面请刘克平出来做事，均被他拒绝。在王口居住时，伪县长又找到家中请刘克平主持编修县志，他称“双腿染疾恕难从命”，再次婉言拒绝日伪政权的聘用。从此他带领全家东藏西躲几乎贫无立足之地，终不失民族气节。社会各界钦羡其品格，求书悬挂以为荣耀，故每年登门求书者甚多，声誉颇著。

（此文曾参考：刘克平之子刘叙宾等提供的资料。）

忆王露亭先生

戴镜寰述

王露亭先生，名恩露，字露亭，原山东堂邑县马屯村人，聊城中华书局之创办者。其一生经历、事迹，对吾邑之文教界甚有贡献，兹就所知，述其梗概。

先生幼年失学，虽念书不多，但对文化事业甚为热心，且赋性聪颖，慧识过人，不学以能。如建筑工程、木工技艺、缝纫剪裁等，虽未从师，却能以其禀赋，擘画设计，浑然天成。中华书局楼房，即为先生自己设计、备料，督示工匠建造而成。

先生幼年家境贫寒，以推小车做生意谋生，奔波于乡里，茹苦含辛，勤俭成性，且无嗜好。数年，渐有积蓄，遂来聊僦屋，经营纸笔等学生用品。以其价格公道，态度和蔼，孩子们多来购买，呼之为“王大爷”。其后，业务拓展，乃自建楼房于楼东大街（今邮局之址），发售文教仪器以及学校课本等书籍，字号为“文华书局”。年余，先生亲赴上海，与中华书局负责人洽商协议，书局易名，正式悬挂“上海中华书局东昌分局”招牌，以上海中华书局中小学教材为主，承办鲁西十二县之经销业务，推售新文艺书刊、中外名著、文教仪器、《辞海》等工具书。于我鲁西北广大区域新文化之启蒙、发动，影响巨大。时在民国初至民国17

年。

先生创办书局之间，曾建立“茹古文社”，首以石印服务社会。其时，先生又于楼东大街设“太平公司”，取光岳楼上“太平楼阁”匾额之“太平”二字为名。从津沪等地，运售自行车、留声机等当时罕见用品，新事物由此得以先传布于鲁西北各县。此举于社会之进步，民智之启迪，甚有益也。

民国十九年（1930年）聊城遭匪劫洗掠达半年之久，匪患过后，中华书局楼房仅余颓壁残垣，货物损毁无存。先生检点遗迹，一一拍照，携以赴沪，以商善后。中华书局当事人认为系意外之祸，非关先生经营之失算也。复又贷以巨金，更大批发货，亟助其复业，由此可见先生平素诚信笃实。先生归，重建楼房，迅即开张，中华书局又树帜于聊城。抗日战争爆发后，地方商业以交通梗塞，日益萧条，先生仍坚持经营。1938年2月，日寇逼近聊城，中华书局被迫停业，先生举家迁居济南。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聊城为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署所在地。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号召军民抗日救国，发表誓死不渡黄河之“皓电”。一时人心振奋，敌忾同仇，军民团结，决心与日寇拼死战斗。是时，中华书局楼房成为“战地文化服务社”，印发大批抗日救亡书刊，并出版多种有关抗战的读物，行销鲁西北及冀豫广大区域，对宣传民众团结一心，号召抗日御侮，收效显著。

日伪时期，王露亭先生携眷避难济南，不居闹市，于南郊筑室数楹，设小铺零售日用品，以维持生计。隐于市廛，苟全乱世，然此非先生愿也。无何，复见逼于敌寇，又

舍此南游，侨寓皖之界首。家口几人，赖以衣食者，惟木舟一只，往来于浙皖沪，贩柴米及彼此有无。烟波小舟，水上生涯，艰苦渡日，历数年之久。

抗战胜利后，先生携眷北返，资金尽失，于聊城楼东大街故居，以家庭缝纫维持生计，俭约自奉，仍然豁达好客，济贫扶危，乡里人士，口碑交赞。1967年3月22日，老病浸寻，终于不起，与世长辞，享年八十有七。

（郑众整理）

实业家商振声小传

奥云涛

商宗轸，字振声，聊城城内朱府街人。曾任范县县长。幼年在东关大街一家商号学生意。后以勤快、机灵、老实、可靠而为店主看重，任为“跑街掌柜”（负责业务联系、经手交易）。

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在本城创办“万聚德银号”、“农工银行”和“公立钱局”，创聊城金融业之先，在经济周转、工农贷款及储蓄等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后，又再接再厉，相继办起“东临道工厂”（生产纺织品）、“电灯公司”、“森林木厂”、“东临兵工厂”（生产“东临造”牌号快枪）等工业企业。他广揽人才，委派得力人员执掌管理，而自任总经理，专心筹划。

先生独立擘划，惨淡经营，创聊城史所未有之实业，于桑梓施惠多矣，然未享养尊处优之生活，故被尊称为“商六爷”。

后，病故于济南。

（陈宝森整理）

身虽先去音容在

——忆李士钊同志

许 继 善

山东省政协委员、作家、音乐家李士钊同志于今年3月21日病逝天津，使我们党和我个人失去了一位老朋友，使社会主义文化、音乐、学术等方面蒙受损失。

李士钊同志1916年10月生于聊城市古楼东南李宅。自幼聪颖好学，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入学后即追随进步思想。1933年考入“三师”，与我地下党员学生相交，积极参加我党组织的学潮，1935年同几名党员学生同时被开除学籍。遂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因生天花辍学。1936年冬病愈后在济南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山东文艺青年协会，在《文艺俱乐部》月刊任编委。1937年“七·七”事变，范筑先将军与我党合作，坚持在聊城守土抗战，组织抗日游击司令部。他的政训处（后为政治部）既是这支抗战部队的政工机关，又是我们党的鲁西北特委机关。士钊同志在政训处，先后担任《抗战日报》、《战地文化》月刊的编辑和记者，冀鲁青年记者团团团长等职，活动积极，撰写了大量的新闻稿件，为《抗战日报》所用，《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河南国民日报》、《西京

日报》、《西北文化日报》、《工商日报》等全国性和外省区的报纸、刊物多有转载，使范筑先将军同我党团结抗日的积极战斗精神得以广泛传播，影响日炽。范筑先将军殉国后，士钊同志转入到大后方，从事教育、文化活动。1941年8月在四川万县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一年后出狱。1943年在国立音乐学院任讲师兼教务主任，在歌剧学校任讲师兼总务主任。1946年4月在重庆经陈铭枢介绍参加“民联”会，在上海武训学校任校长，1947年任上海大中华唱片厂音乐部主任和上海广播乐团团长。1949年初任《新民晚报》记者。建国时，为第一届新政协“民联”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民联”上海市委筹备工作，先后在中央戏剧学校附属歌舞院和中央文化部办公厅工作。1956年调任山东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1957年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音协山东分会理事，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第五、六届山东省政协委员。在这些组织中，积极工作，英文译著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传》和多首外国歌曲等。

士钊同志热心和关怀地方的文化、文史、党史等事业。我与士钊同志相识是1965年。这一年的8月他随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和参观组来聊城参观治涝成果。活动之余，他到聊城县委机关送去赵以政、聂子政、白果、王晋亭等老共产党员烈士的几件事迹资料。据我所知，这是我区最早的党史资料。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反右、“文革”中遭受挫折，但他的工作积极性从未稍减，对家乡地方事业的关怀和工作从未稍懈。就是“文革”中开除停薪回家时，还热情地帮助街道办阶级教育、革命史料陈列展览，帮助文化部门搞

文物普查等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策的落实，历史上受到不合事实的个人问题逐步得到公正解决，热情愈加奔放，调查撰写了大量的资料 and 文章，为《光岳春秋》、聊城地区党史和文史、山东文史、冀鲁豫边区党史、齐鲁英烈、聊城英烈等提供了不少资料，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团结报》亦发表不少文章。他积极参加筹办蒲松龄故居、阳谷水浒文学纪念馆、聊城范筑先纪念馆等工作，积极主动地请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人士为故乡的光岳楼、曹植墓、景阳冈、狮子楼等古迹、名胜、纪念馆题字作画，为宣传故乡的知名度，增加故乡光辉色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士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学者的一生。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拥护和实践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作风艰苦朴素，为人光明磊落。他先我们去了，使我们悲痛，但他的足迹和成果将永留人间！

堂邑“放马场”

郑 磊

1951年春，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当谈到鲁西北解放前的情况时，毛主席问“寿张县为什么叫寿张”，又问堂邑放马场的来历等。司部长回来后谈及此事，一时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关于放马场的起因，说法不一，经查阅史料和现场调查，落实了以下情况：

先说放马场的地势形成。早在周代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在河南省浚县的宿胥口改道，由原来的北流改为东行，而后黄河两次在堂邑西北部经过，因泥沙淤积和河水冲刷，造成放马场以西地形高亢，东部地势低洼。这种地形曾为古代的兵家所利用，隋代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宇文化吉在扬州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率兵北窜，次年来到放马场一带修筑营垒，企图长期盘踞，后为河北农民领袖窦建德所擒杀。

放马场的名称来历，据史书记载，明朝末年鲁西北连年大旱，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东昌府井泉干涸，花不开，果不实，牛羊不子，妇女不孕，冬，人相食。当时堂邑城西五里许有个大村叫常家铺，位于今聊冠公路以北，窑厂的东边。这个村共200多户人家，有南北和东西两条大街，增上有店铺买卖供行人食宿。一天官府运粮车队从这里经

过，常家铺的饥民冒然拦截车队，抢劫官粮。时隔不久，官府从济南、邯郸、大名等地一齐发来骑兵，在夜里包围了常家铺。放火焚烧房屋，杀戮无辜百姓，全村一片火海，妇孺哭啼哀号，惨绝人寰。村中的青壮年奋起抵抗与官兵厮杀，老弱儿童逃到十字街一带避难，村民们战到深夜寡不敌众，尸体遍地，人们见无法逃命，便把金银手饰纷纷投入十字街旁的一眼井中，常家铺从此毁灭。

我们在现场调查时，仍可以看到340多年前常家铺遗留下来的碎砖瓦砾，并隐约可见两条大街的某些痕迹。但是来到当时的十字街口，那眼井早已不知所在了。知情人告诉我们，当地流传着一句谣谚：“找着常家铺的井，好地治三顷”，意思是挖出井里的金银财宝，可以买上300亩好地。

官府灭掉了常家铺，激起了周围百姓的愤恨，为镇压群众造反，在这里长期驻兵，常家铺荒芜了的4800多亩耕地成了骑兵放马的草场，这就是“放马场”的来历。几百年来堂邑一带的群众流传着这样两句民谣：“出西门泪凄凄，四十八顷放马地”，人们含着悲痛悼念常家铺的悲惨遭遇。

当时常家铺的村民也有个别人逃了出去流落外地。到了清代，时过境迁，沧桑已变，他们怀念故土又回来安家，现在放马场有个小村叫常庄，据说就是常家铺的后裔。

历史上的放马场多灾多难，1943年堂邑一带大旱，这里又成了“无人区”的中心，解放时到处都是白茫茫的碱荒地。

建国后，党和政府领导群众发展生产，改造碱地。七十年代放马场兴修水利工程，引来黄水洗碱淋碱，发展农田灌溉，并开展植树造林，绿化了道路沟渠，人们丰衣足食，放马场的苦难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风雨沧桑话沙镇

李培现

一、沙镇的历史源流

沙镇，原始是汉代所置的“阳平县”，隋又改为“清邑”，开皇中才叫做“武水”。隋代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置县至五代时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归属于聊城。这中间经过了359年的岁月，其中兵连祸结，政权迭易，老百姓并没得到休养生息。以后，就由县而易名为“武水镇”。据《元和志》及《东昌府志》等史乘记载“武水县故城，在聊城西南五十里，宋大观三年置武巡司于此”。另据《寰宇记》载：“故城内有石柱，后魏孝文帝所立，为业东之表，武水从石柱北是也”（一统志有类此记载）。

笔者曾赴沙镇走访，承当地老人政协委员王鹤清先生介绍，并随他参观了古武水遗迹及残碑，得以初步了解些今古状况大致轮廓。现记述如下。

沙镇是古县城不但见诸史册，而今尚残存有文献实物可证。我随王老亲到一所学校寻找碑石，在荒榛蔓草丛中，见到半截字迹漫漶的碑碣，是明朝嘉靖三十六年四月，重修弥陀寺记，文字依稀可辨，说明沙镇之由来，述及古武水县建置沿革，武水镇又转化沙镇的经过和弥陀寺兴建经过。王老

说，镇上原有其他庙宇石碑，对武水县城历史源流多有记述，可惜均已毁坏。

民国后，沙镇仍隶属于聊城县，为县治西南一大镇甸，它南连阳谷，遥控淝流，西衔莘冠，亘接赵都，北邻堂临，水通汶卫，沃野丰饶，盛产米麦桑麻，民风朴厚，商业繁荣。1948年秋曾为“聊阳县”治所在地，后撤销仍归聊城辖属，以至今 天。

二、古城千载吊废墟 崇阁四座溯壮观

当年这座武水县城，原是砖石砌巢，雉堞森然，因历史悠久，城垣不断地扩修，所以那时固若金汤，非常威严。自从五代周太祖广顺中黄河决口，冲毁了城廓，县治并入聊城后，这里古城故址，再也不能修复旧观，但仍是累年修补增葺，添砖垒土，得以保持未致全圯。到了清代末季，道光、光绪年间，城墙砖石凋零，慢慢也就形成了土围子状态。民国初年，这里城池虽然变更面貌，但昔日雄城气概，还依稀可以窥测，四周轮廓景象，仍然残存。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能历历道出。他们指点着这里是南门外的吊桥遗迹。我小时候还记得有个张全，在桥边开酒铺，朝西望能看关帝庙外的老槐树呢，如今什么也不见了。听了令人大有白头宫女闲话天宝轶事之感。

据说，这座城的地势最高，城内十字街中心的高度等于聊城古楼的最顶峰。民国以后，尽管是座土城，并未坍塌，地方上勤加培土修筑，禁止人破坏，大体上还算维持古朴风貌。城的南北门相距约千米，等于二华里，东西大约八百

米，围子墙修筑高峻，垛口内有走道（墙里子）可以行人，东西南北四座圩门，都有更房可以防卫匪患，四座门内都建有高阁，阁内又建了一道厦门，可按时启闭，这样，每道圩门三道关隘，气势雄伟、威严！

四座高阁的风格形势，基本相同，它建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之上，面阔三间，歇山九脊式顶覆盖绿色琉璃瓦，四个飞檐挑角装饰着仙人、甲鱼、海马、路兽等，争奇斗巧，生动活泼。这四座阁分筑于四面，虽然它的布局状态似乎统一设计，但各个阁的建筑结构，匠心独运绝不相同，尤其斗拱华丽、雕绘精湛，各具特色，形成参差有致，巍峨壮观，阁内神像，泥塑造型优美，栩栩如生。

东阁，阁下是碧霞元君行宫。有砖砌莲台，雕刻玲珑，暖阁正中一尊女神，金冠黄袍，执圭端坐，雍容华贵，神态慈祥，她就是东岳泰山仁圣大帝的女儿敕封碧霞元君，左右有侍女站立，香花宝鼎，备极壮丽，明柱上木刻楹联曰：“驼山瞻圣灵，峰连岱峙，两道青螺扬峻德；武水环神刹，瀑川长流，一泓银练漾洪功。”这幅楹联字迹端正，笔力遒劲，描绘了碧霞宫的景色和地理环境。

由楼梯登阁，阁中是朱户丹窗，雕梁画柱，极目东眺，村舍错落，烟树万家，在凌晨初晓，浩渺视野中，光岳楼隐约可见。阁上有文昌帝君塑像，紫襟玉带，气象威严，两童儿分捧书剑侍立，神像后是魁星，趺足昂首，狞丑可怖。

北阁建于北门，檐下斗拱重叠，粗犷豪壮，这好象表示出阁中神祇性格的威猛无敌，这座阁已俨同庙宇宏阔高敞。殿中是真武神像，龟蛇二将不离身边，真武大帝裂眦北指，大有气吞河朔震慑塞北之势。但是，阁上又是玄武之神，这

似乎不大对头，因为玄武真武是一个人，他是世尊为北方之神。按《辞源》真武条解释：“祥符间避圣祖译，始改玄武为真武，见《云麓漫钞》”。这里把一尊神分塑两像，或有另外传说。

西阁也是因阁扩建的一座庙宇，殿堂轩昂，老柏郁森，古碑高耸，静谧肃穆。殿内是关帝塑像，绿铠锦袍，美髯拂胸，庑下有赤兔马，鞍辔齐全，比真马还要高大，看它奔鬣怒嘶，状极威猛，旁有马童控制，势难决缰奔驰，虽系泥塑，造型逼真，令人赞叹古代的民间艺人智慧造诣之卓越。阁上是福、禄、寿三星并坐，他们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而增福添寿，益受人们奉祀和欢迎，背向东面的一尊财神，据说是殷代比干丞相，不知根据什么，要说他一生忠耿，绝不阿附奸佞，诤言进谏，为昏王所害，死后成神，但何以叫他去理财呢？却不得而知。

南阁阁下无庙，有扶梯可登，阁中也是前面关帝，后面财神，不过塑像姿态和服饰，和西阁是不一样的。这四座阁子，都有不少楹联和匾额，多不记得了。

过去，这四座阁子神的诞日，全年中分别各有不同时期的香火大会，届期人山人海，四面八方商贩云集，很为热闹。解放后，也曾依照以往会期举办过物资交流大会，但断续数年未得持久。沙镇的古建筑多于土改时被拆除，四座高阁也遭同一命运，连照片也难见到了。

三、佛幢奇雕，一楼八座庙；释道争水，三步两眼井。

沙镇南面不远处，当初是一座古刹，不知何年毁坏，如

今衰草枯杨一片荒墟，可是竟残存一件罕见的文物，那是一个石质佛幢，粗约成年人两手合抱，为三、四十公分的圆周型，上面雕成八个角棱按八卦的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形式分布，每一部位雕凿一座小庙，庙中一尊小佛，浮雕古朴，线条开朗，图案生动，俗称“一楼八座庙”。这是沙镇地方上保留多年的一件佛国法宝。

1939年的夏天，日本鬼子侵占沙镇时，发现了这个佛幢，就抢夺而去。据说已解送日本国，不知置放什么寺院了。

三步两眼井，确是实有其地，也为当地一处古迹。这次笔者去沙镇，特地到井边，两口井宛然存在。我为证实传说，亲踏井台走了三步，恰好不错（按旧时丈量土地，是拿岔杆子作标尺测计，三步即是我们常走的六步）。两眼井，圆径宽阔，水源仍旺。当年这里有座大寺院，叫“弥陀寺”，寺内殿宇壮丽，楼阁亭廊，极其幽邃清静。寺内僧众不少，寺内原是有井的，但山门外这眼井水质极好，清冽甘芳，老方丈爱吃茶，上好龙井茶必须用寺外井水去沏，才更显出茶味芬芳可口。因此，每天小沙弥要来这口井汲水泡茶。

寺的对过是一座道观，叫观音堂，从前有尼姑住持，后来成了道士修真之所了。这寺外井中甜水，道长们也爱吃，小道童天天去汲。因此，两边为争水常常闹口角，老方丈笑这些孩子幼年淘气，吩咐小沙弥别这样，让他们提走了你再上井，免得吵嘴了。

后来，观音堂的老道士，为了免除两边孩子们争执，又出资在寺井旁，凿了一眼井，为什么离这么近呢？据说这里地下

水质好。从此，造成了“三步两眼井”的遗迹和其他故事流传至今，现下寺、观都不见了，而两口井却没被淹没。

四、十八罗汉毁烈火 千年古刹变烟尘。

这座“弥陀寺”现下还剩一块石碑，碑文是牛天麟所撰。他是正德三年进士，曾任武陟县令，后擢大理寺卿、御史等显职（见聊城县志引河南通志）。当年是好大一片雄伟建筑，如今已无片瓦寸椽。民国后，直至三十年代之间，这里还存在几座殿堂和钟鼓楼。后来，罗汉堂毁坏，那铁铸的十八尊罗汉，无处栖身，便个个跌坐于露天废墟之中。这群罗汉，造型卓美，充分体现了中国佛像艺术的高超技法。众罗汉有老有少，有高有低，有胖有瘦，有坐有躺，面庞表现或喜或悲，或怒或怨，或哭或笑，或张口伸臂，或持剑迎敌，或双手合拱，或俯首谈笑，或凝神沉思，或闭目似睡，真是神态各异，无一雷同。

这十八尊铁罗汉，历数百年的被人香花供奉，又历数百年的风摧雨淋，可惜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被熊熊烈焰熔化掉了。

（郑众整理）

南关今昔

张玉梅述 吴云涛记

从前，聊城城外的四个关，数南关宽阔、荒凉。那时的南关人很富有的少，多半是贫寒居民。他们都指望捕鱼、卖苇子、扫碱土、打裕襟等维持生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南关紧靠面积广阔、盛产鱼虾的护城河，于是，捕鱼捞虾便成了旧南关的主要生计之一。那时，南关家家有小船，户户有渔网，小孩子也会使棹、划船、捕鱼捉蟹，然后再到集市上去卖，以养家糊口。当时，本城的饭馆、商号、住家吃的、买的鱼虾，多为南关渔民供应，四季不断。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古历九月，日寇侵犯聊城，护城河里沉入很多敌人的尸体，这下鱼虾繁殖更多、更快，打渔人曾捕获过百多斤重的鲇鱼。不过，从打仗以后，人们都不愿吃护城河里的鱼，大部分都销往外地，本城饭馆中凡是带鱼的菜肴没人要了。这情形竟延长了两三年之久。至于护城河改称为环城湖，湖中鱼类由水产公司统一管理，则是解放后的事了。

以前的护城河，大面积生长苇子，南关附近更多。南关居民因历年传统继承，各有其一部分水面苇子的所有权，年年收割、出卖，那个时候，盖房子的多到南关来买苇子编

箔，从而带来一些收入。另外，每年的端午节前，包粽子更需要大宗宽、长、鲜绿而柔嫩的苇叶，必须从一株株苇子上挑选，捡合格的披下，洗干净、捋舒坦、叠好扎紧，然后卖给做粽子的商户。苇叶包的粽子吃到嘴里，有一种清芬鲜润的风味。粽子的主要原料是糯米和馅，但是如果没有苇叶包裹煮熟，就难以体味到粽子的风韵了。一年一个五月节，卖苇子叶也是一项收入。

扫碱土熬小盐，也是旧南关居民副业生产之一。居民们天天推着车子，带着扫土的扫帚和簸箕去城关的街巷扫土。这扫帚不同于家庭中所用的，它是用一大捆细竹枝来扎为把，然后在上面接只木柄而成，竹枝梢又尖又硬，硬是把地皮之土刺刮起来，再把土掇到小车的篓子里，推回去熬小盐。

熬盐工序是先把碱土倒入大瓦缸，用水浸泡，缸的近底处凿有小洞，水从洞中淋出，淌到下面另一个小缸里。然后使这水下锅，点火熬盐。熬出的盐，洁白如霜，但味含苦咸，名为“小盐”价钱比大盐（海盐）贱得多，贫寒人家为了省钱，多是买小盐食用，腌菜比大盐还强。熬小盐，还有两种副产品——硝和卤水，也可变钱。

做小盐买卖，很不容易。“盐公店”（承包销售大盐的机关）认为小盐犯法，经常派盐巡查禁。还有出去扫土也不是很顺当，住家的墙根崖头，往往不让扫，每每这时，扫土人总是笑脸央告，不能和住家争吵。

打格褙，也是旧南关人多年传统的一种家庭生活之道。格褙是做鞋剪鞋底的主要用料。用碎布拼凑、平整地铺于草纸上，衬以案板，边铺边以浆糊涂刷，晒干了揭下来，就成

了一张裕褡。然后拿到集市去卖，买主多是居家妇女。裕褡的用料是旧碎布，由于需用量大，一般是去纺织品便宜的临清、清平购买。解放后，聊城鞋厂也曾收买裕褡，以后不大兴布底鞋了，裕褡销路迟滞，如今已完全没有了。

以前的南关人家，就这样生活了好多辈子，年年月月，不是水里求财，就是土里淘金，再不就是两手抹拉裕褡片，男女老幼，谁都不敢呆闲，每逢荒歉年月，更难逃冻饿之劫。

解放后，南关在党的光辉政策照耀下，已是整个改变面貌。家家富足，人人幸福，多已从旧的窝巢迁往堤外盖的新屋。但回忆南关人过去勤劳糊口的生活，较之今日，大有天壤之别了。

（裴蓉整理）

过去的古楼西

胡 简 如

过去的古楼西，是聊城的主要繁华街道之一。自清代至四十年代初，这条街上车水马龙，过往行人，终日熙熙攘攘。其原因主要是县衙门座落在这条街上（地址是解放后的老专署前门）。往北不远，又有清代的东昌府府衙门，民国初年改为东临道道台衙门（现专粮局）。清代东昌府辖十县，即：聊、堂、博、茌、清、莘、冠、馆、高、恩。（解放后堂邑、博平、清平、恩县已撤销，馆陶已划归河北省）民国初期东临道，更扩大其辖属范围，管二十九县了，道署以南的十县胡同，就是因所辖的十县办事处驻地而得名。（现仍叫十县胡同街）。

县衙门设在楼西大街中间，坐北朝南，每年农民在夏秋两次来县城缴纳地丁钱粮（当时叫上下忙）。这时楼西大街，车马行人就格外多，加上平时衙门内的达官贵人、胥吏班房；城乡的士绅名流，诉讼的民众，进进出出，因而这条街上便走了百年的红运。

据我记忆所及，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高唐县尹集郝家开设的“文星当铺”，就在这条街上，地址是紧靠古楼的以西路南，铺面长约百米，高如城堡，颇为壮观。再就是饭庄、小吃店不下数十家。最有名的是“三德园”（地址在县

衙的错对过路南)、“鲁西饭庄”(文星当铺旧址)、“宴宾楼”(鲁西饭庄近邻)、“文明饭庄”(古楼附近)。其中以“三德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门面初为平房，后改建成二层楼房。掌柜的是南关的张保禄、张保福兄弟二人。他们经营有方，人缘关系很好，不论山珍海味，或各种小吃一应俱全，并且保质保量，最叫响的菜是“煎丸子”、“糖酥鲤鱼”、“清蒸鲤鱼”，成为聊城的名吃，价廉量大的“杂烩菜”为市井小民最爱吃的可口菜，因而生意一直兴盛不衰，成为城关首屈一指的大饭庄。

经济小吃店有：“孟家灌汤包”(在西大口西路北)、“薛家油饼”(在“三德园”东邻)、“丁家瓜打、馄饨”(“三德园”西邻)，特别是“孟家灌汤包”最负盛名。掌柜的是孟广科，是孟家包的第二代传人。该掌柜为人厚道，善于经营，讲究信誉，对质量精益求精。包有灌汤的、花馅的两种，在制作、配料上都是别家比不了的，因而各界人士前往就餐者，络绎不绝。

还有“张家的厚饼”、“李家的馍馍”和“李大娘炸的绿豆丸子”都是颇有名气的小吃店。(这几家小吃店都在县衙门以西，西大口东)。

那时四乡农民，不管年景丰歉，都要向官府完粮纳税，为适应农民集粮余粮的需要，粮店便应运而生。当时楼西大街的粮店多达十几家，如张会昌、张玉书、李玉贵等开设的粮店等等。(都在县衙门路南)

此外著名的恒升裕的糕点、酱菜，庆和油坊(在西大口稍东)，纯美酱园(在西门里)历史都比较悠久。孟家茶楼(靠古楼较近)、董家茶馆(在西大口)向以水甜、茶香著

称，生意都很兴隆。他如孙凤山的万春堂西药房，郭兆仁的“真光照像馆”，王筱岩的镶牙馆，（都距古楼较近）；尹家、张家马车店（一在楼西首、一在西门里）；老中医王大先生的澡塘（县门口南）等。

但那时的楼西大街的路面太窄，门面多是旧式木制板搭，较之现在的宽阔平整的水泥路，就大有逊色了。

一步三关庙

赵芳珍

聊城市政协出版的“聊城文史资料”第三辑内，有高金福君写的一篇“聊城关帝庙琐谈”。可是他漏了一个重要的崇祀关帝的庙宇——南城门外有名的“一步三关庙”。

在南门外护城河吊桥之南，冲大路有一座高阁，这座阁子下建台基，台下是类似城门的券洞，为车马往来的通衢。阁的建筑仍为斗拱歇山式，飞檐碧甍，气概雄巍。远远望去，俨如又一座城楼，与南堤口遥遥对峙。这是入南关必由之路，有如屏障。

阁的前面（南面）东、西各建一庙，好象陪衬中间高阁，列为左右两翼。阁上和阁下共是三座庙。三座庙都是供的关帝。如果从阁的下边往南走，迈一步，可以说踩着这三座庙的基地。因而这地方就叫做“一步三关庙”。

三座关帝庙，塑的神像，风貌并不一样，三尊神都是关圣帝君，而此处供奉者却分为三个生活历史阶段来装饰其形象姿态。

阁上正中的关帝，是冕旒执笏，身穿绣龙黄袍，面容严肃，巍然高坐，俨如帝王之临朝。这是他死后追封为“协天大帝”之形貌，尊崇之高，已达登峰造极。

东边庙内，塑的是关公在曹营，保护二嫂秉烛达旦，夜

观春秋之像。只见他身躯端坐略偏，手执书卷。两目微蹙，凝神而读。穿的旧时战袍，一种常服装束。从他庄严威凛神态之中，透露儒雅大将风度。

西边庙内是关公挂印封金，辞别曹营，去袁绍处寻找其兄长刘玄德。出许昌北门后曹操飞马追来，又赠锦袍馈金银的场面。只见关公全身盔铠，骑着赤兔马，立于桥上，将青龙刀挑过锦袍。然塑像只他一人，而且装点布署，象征性浓烈，令人望之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威风，凛然正气，溢于面表。

这三座庙的壁画全是根据三国演义小说中有关关公故事，一幅幅绘制，极工致精彩，经历年代悠久，颜色鲜艳如新。阁与庙毁于何年，尚待访问。

“神仙渡狗铺”的传说

周脉琴

聊城城西二十里，有个村镇叫做“道口铺”，现在是“聊堂公路”必经之处，在汽车不畅通时，也是通衢的大官道，南来北往，行旅络绎，每当凌晨东望，只见烟雾朦胧，堤柳隐约，古楼凌空，景物历历如画。

道口铺，原叫“神仙渡狗铺”，这个得名之由来，有一段类似神话的故事。传说明代永乐年间，这里还不过是十多户人家的村庄，茅舍土垣，男耕女织。有个名叫杨承业的村民，家有薄田十多亩，妻儿老少，自耕自收，倒也生活安适。每年的夏冬农暇季节，杨承业经常去聊城贩点布匹，来乡间零卖，赚点利润，贴补家用。那些大店铺见他为人老实，又极守信用，因而赊欠欠欠，颇为人们信任。不过，这个杨承业喜欢喝酒，而且嗜酒如命，一醉方休。

一天，他去聊城批货，把布匹办好，打发小车子回去，自己骑着毛驴慢慢上道，路过西关，在一家小酒店要了酒菜自斟自饮。忽听一声狗叫，凄厉刺耳，他走出店外，见屋后槐树上倒吊着一条黑狗，一个汉子，持刀将要动手宰剥。那狗惨叫不已，两眼瞪得如铜铃一般。承业看到怪可怜的，一时动了恻隐之念，就和那汉子商量，情愿拿出钱来替狗赎命。结果由旁边一些看杀狗的人，好说歹说，杨承业出了一

两银子，把狗放了下来。这条黑狗很懂人性，从此跟定了杨承业，步步紧随，到家后，守家护院，很是勤驯，全家都喜欢它，给黑狗起了个名叫“阿黑”。

一年的秋天，杨承业进城批布，阿黑跟随着去。办完货从城里回家，过了西堤，天已是很晚了。这次，他喝得醉沉沉，几乎不辨途径，好在那条驴子认得路，驮着他走出约有十多里路，月色昏暗，荒野斜径，下坡时驴子猛可一蹶把杨承业跌于地下。他还昏睡未醒，顺势往路边草窝一滚，酣睡下去，早忘了身子在什么地方了。那驴子却竟自跑开，幸好阿黑还在他身旁紧紧守护。这时已是深秋九月，大地没有庄稼，忽然荒郊里发生了一股野火，由远而近，蔓延烧来，黑狗急向承业耳边连连嗥吠，无奈它主人烂醉如泥，毫无知觉。火向这边烧来，满地枯草，腾腾烈焰，即将接近，阿黑情急生智，飞跑到旁边水坑，跳下去，又倏地爬上涯，带着全身的水，跑到主人周围，就地一滚，把水都沾濡到枯草上去。接着又跳下坑去带水，这样上来下去忙个不停，闹了五、六次，居然把四周那些草，都沾湿了，火势烧到，竟然熄灭。可怪的是杨承业耳朵只听到狗的汪汪急吠，竟自睁不开眼，动弹不得。

正在这时，家里人执着灯火找来。原来那驴子识得家门，自己走回。家里不见承业情知有岔，急忙去找，及至赶到，见承业横卧在地，依然酣睡着。黑狗伏倦一旁，已是奄奄一息。承业被家人扶起之后，酒也醒了，看到身周围，水湿淋淋，野火燎燃，竟未烧着身子，而旁边的狗湿身湿透，才明白是这阿黑救了主人之命。大家去看那狗时，早气绝了。杨承业伏狗大哭，被家人苦劝回家，同时把死狗抬回，预备明天

把它好好埋葬。

次日清晨，杨承业完全清醒，深悔自己醉后糊涂，险些被野火烧死。又痛惜阿黑为救己而亡。他和家人商议，要以棺殓埋于殉躯之处，并拟立个“义犬坟”石碣，以志其异行。正谈论间，忽见一道士飘然而至。这道士长身颀立，黑髯拂胸，背负双剑，器宇不凡。承业问：“道长何来？是要化缘？”道士莞尔一笑说：“贫道在江西贵溪龙虎山出家，路过贵地，听村人喧告义犬救主之事，真乃难遇奇闻，我愿看看你家阿黑，或有挽救之策，施主意下如何？”承业闻言大喜，连忙施礼、让座、献茶。道士走至死狗之前，俯身用手把狗抚摩了几下，同时闭目，喃喃念诵，接着要了碗清水，向狗身上喷了两口，笑道：“好了，贫道告辞”。承业问：“老道长哪里去，在舍下休息几天可好”。道士说：

“闲云野鹤，游踪无定，不再打扰了”。说罢就走，众人送出门外，见道士直奔大路，瞬息无影。及至大家回来，见那条黑狗，已是欢欢跳跳，摇尾迎前，活泼如昔。众人连说，真是道长法术，起死回生，大概这是一位神仙降凡罢。此事哄传出去，都感到神妙而不可思议，后来这村庄也就呼为“神仙渡狗铺”了。

（参阅清道士敬真著《雀城琐闻》卷二）

打水

吴云涛

“打水”也称“卖水”，是旧时代聊城穷苦无依的劳动人民糊口度日的生计之一。

打水就是自己有两只筲、一条扁担，天天上井上去打水，挑着向主顾家去送，倒满缸或不倒满，皆听主人吩咐。

打水，须有常主顾七、八户，除住家外，也给店铺里打水。有的是包月，一个月多少钱。每天一清早就给上满了缸，有的是论挑儿零卖，住户先买他的水牌子，是一寸多长的小竹签，上边用火筷子烫个记号，倒一挑水，他要回一根水牌子。天天打水，水缸里积存的泥垢一多，水易于浑浊。隔几天由打水的给刷一次缸。这刷缸也不能白刷，逢节年过得给赏钱，但没多少。

水价是没标准的，要看水井的远近和甜苦。如是甜水而井又远，水价也贵些。一般的水不苦也不甜，价钱也一般。因为指望打水糊口的也非一两个人，他们都有个公议价格。每年旧历的年三十，水给打满了缸，户家照例须往他两只水筲里扔几个铜子儿，叫“压筲底儿钱”，不能叫他空着筲挑出去。

打水需要的井绳，多是用榆树根剥下的皮来拧制的，粗如鸡卵长荷寻丈，一头系有木削弯钩，打水时，钩挂着筲，两

手攥住井绳顺下井底。筒抵水面，要会轻使巧劲，把筒猛地一翻、一磕，水便被磕入半筒，再一提、一磕，水灌满了，立即上拔，摘下钩再打另一筒。别看这打水“翻（音：泛）筒”，不常打水的就办不了，往往把筒掉进井里，或是左翻右翻也翻不倒。打了水，井绳放在井边，别人也用。常见井台子上有井绳好几根，水不再打时才拿走。

打水的筒，是木板一块块箍成的，叫“木筒”；后来，用煤油桶当筒了，木筒仍普遍使用。

至于推水车上西关井去打水，那另是城里的一些劳动人民，以推车打水卖于城里的官衙或用户。光挑两只筒打水的，大多是城外的农户。

解放后，随着自来水的普及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打水”作为一个行业也就逐渐消失了。

（裴蓉整理）

西 关 井

葛 洲

西关井位于西关护城堤内侧，与古楼相对。该井为明代永乐年间户部尚书郭敦出资建造，至今约580年。郭系堂邑西南郭官庙人，告老还家后来东昌游览，停车西堤上。当时附近有一水井，因车夫提水饮马污染井水，与百姓发生争执，遂后，郭在这里买地一亩二分，并打了这眼水井。据说，堂邑人来此用水优先。

该井水质纯净，其味甘甜。据老人谈：“泡茶时，水倾入杯中，能高出一韭菜叶而不外溢。”民谚说：“东昌府有三美，白菜、豆腐、西关水。”指的是城东旧州洼的白菜，北坝的豆腐，西关的井水。过去除附近群众饮用此水外，并有以推水为业的水车百余辆，供给城内茶馆和用户吃水，供水范围达到东关闸口一带。民国初年因水价过低，推水工人曾罢工数日，后经调解提价才恢复送水。

建国后，机关、市民饮用西关水达十余年。城东北隅步云阁街一家茶馆墙上贴的对联是：“掌柜的越远越推西关水，饮茶人且饮且唱东方红。”（此对联为当时聊城专署教育科副科长申伯锦所写。）

此井直径两米，井筒埋深7米，井底中心有一小井，口径60公分，深约1.5米。1963年聊城自来水公司，在井上建

有水楼，计划铺设管道，向城市直接供水。为扩大水量，用固定木桶下泉，下到10米以下，涌上咸水，井水变质不能食用，遂毁。又在原井北边打一小井，情况与老井相同，没有使用，后井被填平，遗址依稀可辨。

茶 馆 忆 旧

金 志 远

茶馆这一行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上溯清代百余年之前，下至民国二十年上下，东昌府——聊城的茶馆是很多很多的。东关大街，运河东的越河圈，粮行客栈汇集的旧米市街，处处开设着相当规模的茶馆。再有城关的所谓“二十四趟街，七十二胡同”，大小的僻巷、背街，也莫不有小茶馆。或设在街角巷口，或设在大路靠边，自有它恬静幽雅之情趣。各有其经常主顾和茶客。

茶馆，主要业务是卖水和卖茶。卖水，是把一壶壶烧开了的水，论壶或论碗，零星地陆续地卖出；卖茶，是屋里设有茶座，有现成的茶壶茶碗，喝茶的人进去，买包茶叶或自带茶叶沏到壶里，自己喝或约朋友一块喝。茶馆大的有很宽敞的房子，摆列一二十张座位。桌椅板凳，要讲究干净，室内冬暖夏凉，坐之舒适。並设有较幽雅的“局屋”、“倒屋”，犹如“暖阁”一类的曲室，让人可以避开嘈杂，享受清静。在这里有约会的朋友，作不同行当的细细交谈、磋商，或是知己谈心啜茗。入这种“雅座”，茶叶是讲究喝高级的，临走抛的水钱，也要比一般散座显出大方些。曲室以外，是一般普通桌子、板凳。一张方桌，可坐下五、六位，各喝各的，也有同伙两个人，用一把大壶，沏上叶子，几个

人给几个茶碗，按碗算帐。水，是无限量的，随喝随冲。不过，茶叶就是那一包。茶馆规矩，如果你下叶子喝茶，壶、碗都是细瓷的、干净的。如果光喝壶白开水，那壶和碗就比较粗糙一些，而“茶资”也多少不同。

一、“蛤蟆楼”的名号

东昌府在兴漕运、走粮船时代，靠运河的东关大街南口，河的西岸，有一家历经百年规模很大的茶楼和酒楼，它占据整个闸西街口一角，由南面的路西朝东，一拉溜五大间楼房，到转角再往西相联，又是坐南朝北的五大间楼房。这个茶馆，上的座客，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么样的人也有。粮船上下来的入，江湖上闯码头的人，青红帮中联络事情的人，闲坐喝茶约会知友谈天的人，真乃五花八门，各以类聚。南腔北调，喧腾一室。堂官有十几个人，俱是身强力壮的小伙，肩搭毛巾，腰扎围裙，脚步敏捷，精神抖擞，一个个提长嘴大铜壶，川流不息地向各个座上沏水，擎起铜壶，扬臂运腕，高提齐肩，来一个“飞瀑倒泻”又名“雪花盖顶”，热气弥漫的滚开水，像一条玉龙，从壶嘴飞流直下。笃笃笃，倾倒壶里，恰到壶嘴。如果是“盖碗茶”，堂官更有一手令人惊奇的绝技，别看碗比壶小得多，他抬手一冲，碗盈水止，那么巧爽而稳妥。最后，小手指只轻轻一勾，来一个“海底捞月”，那茶盖子从碗底叮当一声，严密平稳地盖在茶碗口，立即茶香四溢，满座生春。还有，不论冬天、夏天，“手巾把”四季不断，洁白滚烫带有香水喷洒过的毛巾，往你手上送，你把它在脸上捂捂、揩揩，立时混

身清爽，耳目一新。这“手巾把”，是有专人守着热水锅炉冲洗和拧干，轻轻洒喷花露香水，交给专递手巾把的堂官。他再一块块飞抛出去，无论隔几丈远，那边堂官伸手接过。这是一种训练有素的绝技，那敏捷而神速的动作，真叫人拍手喊好。

关于这座“蛤蟆楼”的名号有两种说法：

“贺模楼”：创建人姓窦，城南八里庄人，在东昌府东关大街开了座标局。他本人精通武技，並好结纳江湖上各路英雄。为人性格爽朗，济贫扶危。在山东、直隶、河南等省，很有点名声。各路码头、江湖上武术界人物，一提到东昌府振兴标局“神枪窦三爷”没有不佩服的。光绪二十一年乙未，这位窦三爷，已是七十二高龄。他教的徒弟很多，颇有些武术卓绝的少年杰出人材。这年八月中旬，群弟子远近而来，为他祝寿，公送金字匾额“武德楷模”悬于这座楼上，因此人称“贺模楼”。

另一种传说：当年有一位聊城籍的老进士公，曾做过江苏省某县的知县，告老回家后，常常到这茶楼喝茶。他写一笔好字，是地方有名的书法家。茶楼主人曾请他写块匾，他欣然命笔，用大草写了“鹤摩”两字。后来用黄杨作料，制成碧字巨匾，挂在楼上，典雅古茂，人人称赞。这“鹤摩”，后来竟被人讹为“蛤蟆”了。晚清时代，东昌府有位善演大奇门遁甲，惯好以诙谐魔术逢场作戏的杭大先生，曾在蛤蟆楼表演过“水缸跳鲤鱼”的有趣故事，是流传很久的。这些，就是这座楼的历史传说。

二、城关茶馆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

聊城，城里城外，别论茶馆大小，各有各的茶客。这长年顾主，是习惯性的绝不上别家去。而且，他们也不是专为喝茶而喝茶，多数是为了各取所需，各抱企图，才形成了花花絮絮的“大千世界”。这里，把其中几个比较典型的人所熟知的茶馆特色，分别作一介绍：

“清泉居”——脚行班的休憩处。茶馆主人张大年，以前，他也干过勤行小生意，也参加过“脚行班”。后来，在东关迎春桥南，鸡市街口，开了一座茶馆。地点清静，不靠闹市，除了供应附近居民倒水外，主要茶客就是专送粮食的“脚行班”。这些人，每天下午劳动完了，先不回家吃饭，不约而同，都来大年哥茶馆喝一壶。下一包“花时雨”，酹酹地、又香、又浓，热得烫嘴。各喝各的，边谈、边笑、边喝，滚开水一个劲地冲，喝得浑身汗津津地，一天疲劳消失了。回到家，闹两个窝窝，绿豆糊涂喝上一大碗，又舒服又慰贴。这茶馆原在鸡市口路东，后来又搬到粮食市街的路南。

清泉居的北边不远，就是鸡市街北口。正当十字交叉路口，有座“迎春居”茶馆。坐东朝西，三大间门面，内有小院凉棚，地处冲要，场面宽绰，掌柜的王惠祥，是个街面外场人物。虽然家底不厚，但豪迈慷慨，一诺千金。他这茶馆天天炉火熊熊，座客常满。江湖上飞的跑的，经纪跑合之流，纠纷调解之事，纷然杂陈，几十把茶壶，一二百只茶杯，一天到晚热热闹闹，唾沫飞溅，争辩喧笑，群态毕现，这和南头的“清泉居”形象，又是另一个风味。

迎春居这座场面不小的茶馆，总是一家人忙，老婆孩子一齐上阵，没用雇工。茶馆是紧靠东西南北上街下乡，通达四方的路口，逢到柳园集日，人群拥挤，倍加繁忙。因为是交通要道，除了行人络绎，也经常地有殡丧婚娶的行列走过。凡是出殡的在此经过，迎春居茶馆，照例预先在路口，竖排摆两张大桌子，放进百只大茶碗，沏上大缸香茶，一碗碗斟满。顷刻，抬棺的人快到来，正感口渴舌燥，于是每人喝上两碗，再向前行进。这是王掌柜广结人缘之处，不论丧家识与不识，更不分回汉两教。茶水，绝不取分文。这座“迎春居”茶馆，在民国21、23年之间（1932——1934）曾经扩大经营，又挂上了“会贤楼”的匾额，兼卖饭菜，酒席，早上添豆汁油条点心。直到抗日战争，日寇陷占我县城后，王掌柜病故，茶馆又转让与赵俊明经营，仍用“迎春居”原名。如今，当年的“清泉居”与“迎春居”两座茶馆，都变成了民房。

三、前菜市街三茶馆——彩香居、久香居、德香居及其他。

前菜市和后菜市，这是东关外偏南的两条街。都是东西街，长达二华里。虽然这街地处偏僻，几十年前，也是挺多的行店，天天早晨，人烟闹市，生意兴隆。民国以后的几家茶馆，最早的是“彩香居”。在街中间路南，三大间房子，靠西墙砌炉子，有三两张八仙桌，作为茶座。专卖本街街坊倒水的钱，很少过路客商进来喝茶。有“茶座”也是本街几家店里掌柜，有事来借地方商议生意上的问题，或忙时来作

偷闲休息，沏茶壶，喝上一阵子。春、冬两季的夜晚，茶里人满为患，全是本街的人，都爱听书，就推出一两位认字的先生，就茶馆的灯光，“翻本”说评书，什么“济公传”“七侠五义”、“西游记”等等小说，听者津津有味。茶馆里，除卖水外，也兼带着卖“长果”（花生）、烟卷、烧饼、果子。

“彩香居”茶馆，干到民国十四、五年上，又改组一次，只换了一个字，叫“久香居”。掌柜的张林祥，他老两口，有两个儿子，张林祥那时也不过五十上下年纪，行三，街坊晚辈多喊他三大爷，喊老太“三太娘”，三大娘人颇能干，吃苦耐劳，起早睡晚，茶馆里里外外，她整个人挑大梁。一到黄昏，那一桌子壶，她都得挨个儿，一把一把地倒上水，打发走了，同时，还得拉风箱，剔膛炉子，添炭。在那时代，开茶馆的，有一个相沿成例的风俗，就是兴“掌末”，这“掌末”两字，如果不加说明，读者是不会理解的。“掌”（念入声，当作“添上”、“搁放”的意思。这是本地土语，但不是这个“掌”本字，想不出相同声音的字，只可暂以“掌”代，容再考查），“末”是茶末（茶叶中筛下的细碎末子，劣质的杂有土屑）住户人家来倒水，自己没茶叶，还想喝壶不是白开水的“茶”，这就可以把壶放下后，随即关照一句：“掌点末”。茶馆里，就从“土末”罐里，捏一点点，撒入他那把壶中，沏上开水，到家倒到碗中，居然是变色的“茶”了。

六十年前，在聊城，暖水瓶还不多见，无论冬夏，住户人家生炉子的很少。喝水时，或来了客人以茶款待时，就提着壶去茶馆倒水（倒代表“买”，即由他壶倾入我壶之意）。

茶馆炉子边，一只矮桌，专为倒水放壶的。去倒水，不一定走到就倒，如果矮桌上摆了很多的壶，要以次序前后而倒，犹如今之“挨号”。倒上水后，如果壶主不在这儿，就高喊：“倒上××家的水啦”！也有例外，如：“先给我倒一壶，家里病人吃药”，这么，就马上给倒，绝不叫等。

久香居茶馆，似在七七抗日战争之后，因主人张林祥故去，三大娘独自难以支持，也就把买卖让给了张德立。字号又只改一个字，叫“德香居”。掌柜的年将四十，也是干小买卖出身，为人忠实，肯吃苦。接手茶馆后，仍沿袭旧规，生意兴腾。他为了保持本街茶馆传统固有声誉，天天亲自上南井挑水，比近处的两口井，多走半里地之远。

前街的茶馆，除三个“居”外，街的西头，还有家“朱家茶馆”，这个茶馆，专做街西的大片住户人家的生意，夏天，这里清静凉爽，后院树木荫浓，附近的几位老先生，常常盘桓于此，喝茶，下棋，闲话古今，颇是消夏解闷之处。

此外，还有一个于家茶馆，也叫什么居。因为这几家茶馆，都挑取南井甜水之故，外街喜欢喝茶的人，也常有自带茶叶，专来喝茶的习惯。尤其是闸口东，南越河涯，“静思堂”在礼的“爷们”，讲究喝茶，三五位相约，不断地来前街茶馆坐坐，他们也有时不坐茶馆，只是把茶沏好，把壶提着，找个清静地方去，喝一壶再上茶馆沏一壶。这“在礼”的爷们，都为了这个甜水井而从别的街专门来喝茶的，可知这口井，是名传遐迩了。（在礼，是戒烟酒，在“佛礼”，在礼后，习惯上互称“爷”，如张爷、李爷。因而人们泛以“爷们”呼之。其实，不一定是长辈，也不是谑词，风俗如此）。

后街的几家茶馆。尽东头，在“德生祥”傅家酒店的邻近路北，有一座只搭了几间草房的茶馆叫“对月居”。因它紧靠一座大石桥，桥洞下左右壁砌两方巨石雕刻为团圆的月亮，东西相映，不知建始年代，桥为地方“东关外十二连桥”之一，名“对月桥”。这茶馆，也就以“对月居”当招牌了。这茶馆虽是简陋，周围环境，却很幽静。因地方已近郊野，远离闹市，茅舍秫篱，四外桃柳满堤，野溪荷香，另有一番风味，东乡和附近村庄，进城的人，赶集人，来来往往，这个茶馆倒是歇脚之所。在这里沏壶茶，碰到邻村熟友，撮茗谈心，闲话桑麻，喝会子茶后，做伴归去。“对月居”掌柜的姓傅，老夫妇一个女儿，待人态度和善，人称傅大娘。女儿出嫁后，两老人年迈，茶馆又让给本家侄儿去做了。有一年上大水草房被冲塌，这个“对月居”没有再恢复，时间约在民国十年前。

后街的茶馆，从东往西数，中间还有一个，在路北，紧靠张长林的炸油果铺子。这座茶馆的屋子，却够大的。有桌椅、板凳，可坐二十多人，屋后院内，也有几张矮桌子、马扎子、小板凳，也不少坐人。茶客除了本街干勤行小买卖的人以外，东乡附近村子如陈家口、李太屯、王虎庙等村上街进城的人，都要到这茶馆休息，沏上一壶，边饮边谈，极其随便。饿了，西邻有烧饼果子，花两文钱闹一套，佐着热茶，吃得多美。乡里来的，上这茶馆喝茶的，以老头儿多。他们每次上街来似乎不到这里沏壶茶，啦一会子，不过瘾。他们啦的话题，可牵扯多了，从今年什么庄稼收成的好，哪块地里被水淹，而谈到某村要唱戏了，某村某人怎么着啦。坐得久了，谈兴更高，茶冲了又冲，有的还再加上一包茶

叶，喝得酩点，老年人坐茶馆，差不多“腚沉”（地方土语，舍不得离开座位之意）。他们散坐在每张桌子旁，高谈阔论，态度悠闲，不慌不忙，神色泰然。

茶馆的掌柜的姓宋，叫萍斋，早年曾混过天津卫，没落下什么，回家后开了个茶馆，全家六口，忙忙合合，还可顾上生活。字号是一位老秀才魏静德给起的，叫“通泰居”，他是根据街东关帝庙中一块明代石碑而题名，原来在从前，后菜市叫“通泰街”。这个茶馆，在民国十四年，后街街北搭台唱戏时，还干着，以后不知怎样，又关门了，宋掌柜不干以后，这地方又有人继续开茶馆，但规模缩小了，只是供应街坊倒水便利而已。

后菜市的街西头路北里一座皂王庙，庙的山门之右，有座茶馆。掌柜的姓王，挺高的个子，有点弓腰。为人和善，却很耿直。因为茶馆附近，有一家打厚饼的，这位老王掌柜也捎带卖开汤丸子，上街的乡下挑菜的、赶集的，有的就买半斤厚饼，喝碗丸子，热热乎乎地就饱了。喝丸子兴添添，有的自己带着干粮，光喝丸子不要厚饼，全为了添两碗汤，又热，又有油水，比喝碗白开水强。皂王庙内有一个小学，学生喝水的很多，茶馆也是指望卖他们的钱，茶座不多，也有两付桌椅，晚半天有附近的老先生们来坐坐，沏壶茶。上午，很少有茶客。这茶馆就叫“王家茶馆”。王掌柜老了，有人接着干，这地方是进入市区的咽喉，四趟街道的分叉点，地面却不很宽敞。居民稠密，店铺栉比。茶馆是不可缺少的，只是岁月迁移，屡易其主而已。

四、绿云千顷话柳园

从皂王庙西去，是弯曲弧形的“染织市”（也叫远子市），到了迎春桥，北走，一条南北街，这街上多是菜馆、饭铺、零品食物，如规模较大的“义兴园”、“复来兴”等，可包办酒席，应付外送筵席，小的饭铺不过馄饨、面条、焖饼之类，那更多了。这街的名字叫“昭穆关”。当初不知怎么起了这个名字，这里既无关隘，又不险要，连个象样的建筑物也没有。如今，这街名也很少人知道了，街北就是有名的“柳园”，往东是所谓铁打的小东关。

从前，柳园是一片很阔敞的广场，全是杨柳密植，浓阴蔽日，夏天，是个很幽静清雅的乘凉避暑地方。这里有一座茶馆，在柳园的路东，主人白松龄，字号就叫“柳园茶馆”。这里生意倒相当兴隆，逢四、九集日，更是热闹，因为接近小东关，有当铺、客栈，来往客商很多，又是四乡八镇的农民，来出售土产品和手工制品的集散中心，上街的人、赶集的人熙熙攘攘，相当热闹繁忙。茶馆里总挤满坐满，茶馆的吆喝声、座客喧笑声，卖果仁、瓜子的小贩呼喊声，真是像开了锅一样。如不逢集，附近的人们，常有三三五五，约会来喝茶。南边有一家杜家火烧铺，有著名的糖酥火烧、葱油椒盐火烧、羊肉火烧等，手艺很好，味道很美。这些茶客先生们，习惯地闹两个糖酥火烧，佐以一壶清茶，一面品尝茶点，一面聊天叙旧。二、三月间，茶馆里窗扇开敞，春风满座。往外看，那千株丝柳，翠波荡漾，别有一番诗情画意。这柳园茶馆，维持了不少年月，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它也和其他茶

馆一样，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几经沧桑，从它的兴、衰，以至消失。反映了东昌古城的一点风貌侧影。

五、天齐庙外“齐天居”，喝茶约客谈盐、硝

迎春桥西去，直到闸口，这个长约一里半的“越河圈”，商业店铺，相当繁华，茶馆有三处。

这街的东段，有“百步十座庙”之称。有一家宋家茶馆，就在天齐庙的前庑下。民国后，这庙大部分殿宇都没有了，只见残存的牌坊石柱和院中的丰碑。山门已无有，但那形貌威武狰狞的“哼哈二将”泥塑神像，还未完全毁坏，依然分峙左右，虎视眈眈，令人望而生畏。这个茶馆因在“东岳天齐大帝”的庙外，还多半是山门外庑一部分建筑，起名为“齐天居”。茶馆中座位虽不多，但是天天有常客，多是刘营、土城等村的人。他们不是专门喝茶，是经常在这里约会，作小盐和硝的生意接洽交易之所，以“硝”为主要。因这几处村庄，在那时，差不多家家都会扫碱土，熬小盐，取硝，以为家庭副业。硝和卤水都能变钱，也各有其倾销对象，因而，农闲季节，天天来街，到这里沏上一壶大方或小叶，慢慢地喝着、谈着。价钱高低的商磋、货品质量的评判，买卖双方都是内行。不少的交易达成协议了，还是喝茶的功夫长。茶叶淡了，再续一包，开水管够。这茶馆的宋大娘，是很厚道的。有时，这常到的人饿了，自己下“纸”挂面或煮点豆腐，可以向她借用沙锅、碗筷，都供应周全，使你满意的。这个齐天居，一直开到解放。

六、钱龙居昙花一现，西关水浅尝即止

俗话说，茶好不如水好。水的质量好，沏上壶茶是格外的好喝。如果水不行，就是上好茶叶也不好喝的。《茶经》上说：“泉水为上，河水次之，井水为下。”但是聊城县内，并没有高山活泉。运河中水虽可汲取，但人们并没有用惯。城关的茶馆，还是多数打井水。以区域言，城里的，一律拉西关井水。这西关井水，甘甜清冽，汲之不竭，千百年来，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甚至经商、宦游在外地的聊城籍而居于城内或附近的人，想起了西关水，不禁有莼鲈之思，萌乡土之念。但是，东关的各家茶馆，他们为了省钱，都是打附近的井水，好在井水也并不难喝，不咸不涩，也就行了。在1929年前后，越河圈街的西段，居然开了个“钱龙居茶馆”，不怕多花钱，买西关水沏茶。却也号召一时，兴腾了一个阶段。这个茶馆掌柜，不是本地“土著”，来这里赁了三间门面，开的“钱龙居”。他还时常邀喊盲目的曲艺人，晚上到他茶馆弹唱，让喝茶的座客，白听不要钱，藉以招徕。乍办时，座客常满，但开销比别家多，日子长了，难以支持，大概不到一年，就关门大吉了。不过，他却首先打开了东关茶馆，用西关井水之先例。

七、运河两岸茶馆林立

运河的闸口是各行业纷然杂陈的热闹所在。河东岸往南、往北，一座座客栈、店房、骡马店，一天到晚人声叫

嘶、喧闹嘈杂，这里的茶馆，更是不少。像大王庙南有董家茶馆、冯家茶馆，闸北里朱、李、杨等姓开的茶馆。闸西往南是蛤蟆楼，前已叙过。往北清孝街，紧接铁塔寺，更是大街小巷有很多的茶馆，规模有大有小，经营时间有长有短。其动态、风采、表现，有各自不同的意趣。这里，把从东关大街，到城里几个茶馆的大致轮廓，概作叙述：

闸口往西走，是商贾辐辏、车马络绎的东关大街。大街的两旁各类店铺的夹缝中，有好几个茶馆。街东段路北里韩家茶馆，字号是“瀛仙居”。门头是炉灶，后边有三两间弯曲别致的敞轩。茶座布置的清洁典雅。打开隔扇，有经常摆列的盆景花草，虽无奇卉异品，却也点缀得生机盎然。粉白墙上挂有肖莆田、傅淦的对联，条幅，这是地方上颇著声誉的书法家。天井中，一株既老而矮的古槐，上边挂着几只鸟笼子，有的外罩兰布。有时，几只笼子的雀儿争鸣，柔脆、委婉、圆润，各尽其妙，叫得真好听。原来这座茶馆，来喝茶坐坐的人，多是爱玩鸟的朋友，他们物以好聚，人有同嗜。每天的清晨，从北花园、西堤，溜鸟归来，都不约而同来“瀛仙居”，把笼子挂到槐树枝杈上，或房檐下；各就其习惯坐的座位，沏上一壶，边喝边谈。不外乎你的百灵今天真卖力气，叫得那么够味！被夸奖的鸟主人，还谦虚地说：

“过奖、过奖，功夫还差的多呢”。

傍晚，他们一个个提着笼子，又来坐一会子，沏一壶。如果不来两趟，不喝两壶，好象没过足瘾似的。据说，这茶馆掌柜的，也是养鸟的爱好者，有专备的“碧螺春”好茶叶，供“羽仙”们饮用，斟上一杯，芬香清幽之气，扑鼻而来。喝一口，真有津生舌端，香沁心脾，大有涤清神宇之

感。这是别处茶馆所没有的。茶馆套间里，壁上挂着朱学笃写的有关咏鸟诗句的四幅屏。内有宋欧阳修作咏画眉一首七绝是：“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在“四海春”澡塘的对过，路北里，有一家“清和居”茶馆，这里场面也不算小。一拉溜三间临街门面，后边还有敞厅、院落、桌椅矮几，座无虚席，天天从早到晚，茶客拥忙。来这里喝茶的人，除了一般地专为喝茶、闲聊而来的常客之外，另有一种以此地为联系中心，而发挥其特殊功能和要求的一类人物，是其他茶馆中，不常有的。如：青帮（安清帮，也叫做“在家礼”），在清末、民初，聊城地方还存在着部分势力。由“大通悟学”排下的辈次，各辈的师兄师叔们，各阶层都不乏其人。他们以“义气千秋”为号召，平常里，各干各的行业，并没有什么有形组织，和定期集会。可是帮中纪律和内中许多清规戒条等等，却极其重视，社会的各个方面，军、政、绅、商以及市井细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有需要彼此接触解决问题的协商。因此，茶馆便是他们的公开的联络处了。这类人物常落脚办事的茶馆，除清和居外，城内卫仓的“松桂居”也是在家礼的爷们，经常喝茶、碰头的地方。茶馆，不但给他们起到“码头公口”的作用，还可以藉此处作对外地同道联系的桥梁。如果从外地一个帮友来到聊城，他先打听到这类茶馆，到里边一坐，沏一壶茶，壶嘴和壶盖，都有特定的暗号放置，茶杯的位置也是有规矩排列。这样，就会引起了此地帮中人注意，踱上前来，两句寒暄话后，便开始“盘海底”，就是用帮中之话来诘问，试探你是不是安清同道，被盘者也要“海语”报

“盘”，说得对路数，这外地来的帮友，便会照规矩受到接待，代开茶钱，安排食宿，离开时还饯以酒食，助以川资，并指引去路，这就叫做“亮底”。像这类事各地都有，而都藉茶馆作问津之所。这风气一至到抗日战争前，还没断根。清和居另一种茶客是“京庄杂货”，这一行业的“跑合”人物，每天来此坐落喝茶。“跑合”是专替买卖双方拉拢生意，能说会道，熟悉业内情况，他们绝不从中“里吃码子外吃秤”，只是由双方（多数是卖方）付与少许佣金，以酬其奔走说合之劳。也叫“经纪”人，在南方称为“偕客”。象这种跑合的经纪，哪个行业都有。因为清和居在大街的中心地带，也正是杂货行业字号较为集中的区域，由于“地利”关系，所以杂货跑合人，多来这里坐地，喝着茶，和一般同行朋友交换信息，沟通行情，或互有委托、帮忙，彼此照应。

（孙元芳整理）

闲话澡塘

李长海

清末民初，东昌府城内外，有五、六个洗澡塘子。虽然屋子不那么宽敞，却有大门，进去大门，小小院落，几盆花草，掀开帘子进屋，伙计先喊“看座”！屋内一拉溜的大宽凳子，靠墙挖有一排“壁橱”，这是“池座”。也就是普通座。设备简陋，澡钱也便宜，是供一般人洗的。

另外，有三两间房子的“雅座”，比较干净，备有披身的大毛巾，座位也宽敞，有铺炕的棉褥子、小炕桌。洗完上来，伙计给你沏壶茶，躺到炕上，呷口茶，可以悠闲地闭目养神。雅座澡钱贵，赏小帐也必得大方一些，凡是光顾雅座的，多为地方上巨商士绅及军政两界人物。那时，东昌府的澡塘子，有这几家：

“德和园”：城内楼西大街县衙门斜对过胡同内路西。掌柜的姓王。

“雅观园”：东关大街路北，老盐店的东边，有一段向后缩的胡同内。

“四海春”：东关大街路南，邻街有楼房四间，经营菜馆，后院是澡塘。

“馨露泉”：东关柳园路西，掌柜的姓白。

此外，还有一家或两家的澡塘，到民国十年前后，就关

闭了，如东关闸口东南越河涯的来春桥北，就有一个“来春园”澡塘。至于东门口的“浴德池”，那是1931年以后开的，不能列入“老塘子”之数。

以上那几家从清末就有的澡塘，其形式、规模，都大体相同。塘子里侍应客人的叫“伙计”。澡塘也都有个字号，多半是叫什么园。

洗澡，澡钱是先洗后付。洗完，穿上衣服才往外掏钱，还要或多或少地给点“小帐”。这小帐，代名词是“零钱”，不归柜上营业额的收入，是伙计们的一种“外找”。每天见的小帐，到晚上就分。分也不是平均，掌柜的和管帐的先生分得多一点，等而次之的大小伙计，连打水的烧火的，也都能分着了。

付澡钱的时候，如果你囊中富裕而又好面子的话，可以环视一下，如发现熟人又有交情，你就随着把他的澡钱也“候”了（候，代为“付钱”之意），也往往有一候好几个人的。有时，自己的澡钱，也被别人候过。这时，伙计们必高呼：“×爷、×爷，您几位的澡钱，×爷候了”！这个“爷”字，是个客气的尊称，但也看对方身份而言。如够不上称“爷”，伙计就另以“先生”两字代替。额外的小帐，也叫“酒钱”（意思是赏你喝酒的几个钱），客人走时，必高声报出数目呼谢。

小帐，客人虽是为的要面子，多少要给两个，但也得看伙计侍候的态度怎样。态度傲慢，甚至瞧不起这个碴，对别位十分巴结，对你不甚理睬，那么，这个客人也许分文不给，而悻悻走出，脾气怪的发作几句，伙计们也不兴顶撞。

大凡洗雅座的，伙计就照应得好些。池座，就不怎样客

气了。洗池座的人，很多是不给小帐的，光付了应付的澡钱就走。民国初年，洗个澡也只是两个铜子，很便宜的。池座，统统坐在一条条大板凳上，洗罢上来，也没披巾，赤裸裸蹲在那里。坐下还可，板凳上人挤，根本不能躺，更别提喝茶啦。当你洗后上来时，伙计拿粗布手巾，往你脸上揩一把，再接着往别个刚上来的人揩一把，揩几个人都是这块粗布方巾，湿漉漉的，气味难闻。这就叫“手巾把”。雅座上的人，却是用较干净的毛巾递给客人自揩，隔一会还再递一回，甚至三五回地递手巾把。

澡塘的浴池在一小间矮屋子中，修有大、小两个池子，都是狭长形，大池子也顶多三十个人就你挨我我挨你，挤得满满的，小池子里安着口锅，锅下通火灶，由人在下头烧。小池子也可容三五个人下去，但水烫得很，没人敢下去，偶而有皮肤病患者，边擦边烫，只见他皱眉咬齿，似乎挺过瘾。小池从中间留洞通入大池，如果浴客稀少，还可以半躺到水里烫一会，人多就别想了。

洗澡的地方叫“池屋”（今称浴室）。这池屋两个池子，就供应所有客人洗，没有另外的“盆池”。

进去洗澡都是一样的粗布方巾，一角染蓝色，作为标志，洗完出来，伙计问你“还洗不”？如果不洗啦，就递给你一块干的粗布方巾，如果再下去洗一遍，这块干方巾是不给你的。

“池屋”里，门窗紧闭，屋小人挤。一进去，那股既闷热而又齷齪气味，扑面而来，满屋子雾气笼罩，灯光昏黄。水，也看不清怎样，反正够污浊的。池边砖台子上，又粘又滑，坐到上面粘糊糊的，只好赶紧地擦几把水，烫烫，

擦擦，搁捞一阵子，呆长了真叫人想呕。

荷塘月色德和园

城内的“德和园”，虽是开在县衙门附近，而且正是人烟稠密的“楼西大街”。不过並不紧靠繁华的闹市，是在往南去的宽胡同里。胡同南邻荷塘，水光波影，周围古柳绿杨，浓荫蔽日，浴客们洗罢休息，可以凭窗眺望，只见芙蕖清芬，月色洁皎。晚间洗澡的人不很多，可以躺到这里，安详而从容地，迂缓而舒适地，忙里偷闲，快活一二小时。

德和园，是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澡塘子，里边的陈设，古香古色，气氛雅趣淡素，池屋略大，来洗澡的有附近的商号铺户中人，但多数是衙门中“做公”的。各房科师爷们，常以此地为谈叙休憩之所。如果你常往这里洗澡，可以听到不少的案件新闻和社会轶事。据上年纪的人谈，光绪初年，山阴容须岩，在东昌府衙做幕僚，三天两头地来德和园洗澡，一躺就是几个钟头，他留心采集民间传说和地方掌故，撰写《聊摄丛谈》八卷，由本城文英堂刻印，今已绝版。

板桥流水馨露泉

“馨露泉”，在东关闸口东有名的柳园处，开自同治年间，是运河东一带妇孺皆知的老澡塘子，门外是越河，流水潺潺，杨柳拂岸。环境相当雅静，月牙形态的小板桥，横跨河上，疏林掩映，茅舍人家，宛如中国山水画中的田野风

光。桥窄而长，如两人并行必挨身而过。从东走过桥去，西涯上就是澡塘大门，大门北粉白墙上有四个大字是“清水池塘”。门两侧墙联是“沐浴精神爽，整容气象新。”字用墨笔写上，又加桐油刷罩，雨淋不褪，黑白分明，格外醒目。大门横匾是“馨露泉”。进大门影壁上，挖有长方形壁洞，外镶玻璃红字也是“馨露泉”。夜间，壁洞置灯，倍见辉煌，门外小桥之西，竖有丈许长的一根杉篙，一到傍晚，挂上一只纸糊灯笼，里边一盏油灯，这是古老的澡塘标志，等夜静人稀就把灯笼摘下了。因此，有句歇后语，“澡塘子摘灯笼——不叫人洗（喜）”。

在挂灯同时，屋顶上的“云牌”咣咣咣……有节奏地响起来，声韵悠扬而不急躁，连续而不紧张，这是澡塘的一种有声广告，大有“古风存焉”之势。馨露泉门联为：“金鸡未唱汤先热，玉版轻敲客早来”。这风味、意境，令人可发思古之幽情。

雅观园紧连四海春

东关大街路北的“雅观园”，以院落花木繁茂取胜。小小园亭，鱼沼假山，布置得别有趣。来了就是不洗澡，闲坐一会，也感到水木清华，心旷神怡。

“四海春”饭庄在澡塘的前边，是一座临街的酒楼。烹调、菜肴，各式点心小吃，在本城是颇有名望的。这家澡塘设备比较宽绰，座位干净，因在城关中心市区，生意兴隆，日夜满座。浴客们洗罢了澡，到前面酒楼，或独酌，或邀同伴，畅叙一番。楼外有栏杆，可以凭眺这里长街的繁华景

象。

理发、修脚和搓背都与澡塘相关联

人们去洗澡，为了“刮垢摩光”周身来个痛快，索兴搓搓背、剃剃头，也有的脚上有毛病，捎带修修脚。这些活，澡塘里都可一一应付。伙计们，除了照应“座”，也都会干这些活。只有剃头，为专人负担，有的是相熟的外边挑子，习惯于晚上呆在澡塘等个活干。修脚包括“削脚”、“捏脚”两个“工种”。削脚比较简单，把你的脚掰开，一看就看出“鸡眼”与“肉子”的部位，用锋利的小刀、小镊子、小撬、小剪，熟练而轻巧地，一会儿可给你修好。至于脚趾溃烂的“脚气”症，他们也有自己配的药，给你敷敷搽搽，果然就轻快多了。“捏脚”是个“细妙活”，但北方不比南方，喜欢捏的并不很多，在清末民初间，聊城各个衙门中，有不少的“绍兴师爷”，洗澡后必喊捏脚，那时，进去后可以看见座榻前面底下，一个人面对榻上浴客，坐在一个很矮很矮的小凳子上，膝骨竖起，和大腿小腿成为角状，膝上铺着一条毛巾，毛巾上摆着一只榻上浴客伸来的赤脚，那人双手捧脚，努力工作，这种工作，就叫捏脚。这是一种澡塘里应客的重要工作。浴客的欢心与否，与此大有关系。颇有捏脚成癖的浴客，指定要某人给他捏脚，换了生手，就不过瘾。因此，捏脚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一种专门技术。当动手之前，把浴客的这双脚，拉向自己膝上搁住，先来一套检查工夫，手续很是简单，不过把五个脚趾，逐一掰开，使脚丫成叉状，再仔细谛视脚丫间的现状，经此一番检查，对于这双

脚的真相，已了然于胸，他的工作路线和进行程度，就可由此决定了。检查既毕，拿块毛巾遮在脚趾上，伸出有劲的手指，隔着毛巾，用两指钳着脚丫，沉着捏弄，或轻或重，或疾或徐，一阵紧，一阵宽，施展出浑身本领，这是正式工作开始，捏不忘看，看不忘捏，且捏且看，且看且捏，一方面窥察浴客面目表情，一方面根据情况而应重应轻的适度起落，达到被捏者满意，好多得几文“小帐”。

洗澡目的是为了“褪褪身上的汗垢泥滓”。自己褪不彻底，就叫人代褪，这就是搓背，搓背有一套完整功夫，先从背部，再延伸四肢，一手攥着擦有肥皂的手巾，一手顺着你胳膊或腿，有时狠搓几下，有时轻轻拂试，颠之倒之，任其摆弄，有的搓背师父，还会“推拿”手术，这却不在搓背工序之内。

“浴德池”异军突起

民国二十年后，东城门外瓮圈的路北，开了个“浴德池”澡塘，主人刘玉合是地方上崭露头角的场面人物，官私两面，军政两界，都有拉拢。人也大方洒脱，性情醇厚，不甚计较营利，各阶层人物都乐于接近。

浴德池的出现，使古老的东昌府浴池业耳目一新。它房舍阔敞，光线充足，建筑精致，种种设备齐全，空气也调剂适宜，池子都采用新型的方形彩色磁砖砌就，座位多于其他澡塘几倍，分为“官座”、“雅座”、“池座”，它这池座，却不同于其他澡塘用“壁橱”放衣裳，它是用竹筐一只，摆在座下，脱下衣服连袜子、腰带一古脑儿放到筐里，

一个人占一只，因此，人戏呼为“筐座”，官座，在紧后边，恬静而雅致，座位铺陈阔绰，有专设的盆浴、高级烟茶、优质糕点，侍应的“伙计”也多是挑选年轻小伙，敏捷伶俐，有眼色，来这官座的浴客，多为军政绅商有身份的人，他们到这里洗澡，无异是一种享受，躺到舒适的榻位上，品尝香茶、磕磕瓜子，或吃吃“义源成”新出的鲜花饼，更有富绰者，派人到楼西三德园，喊几样菜。人们说：这是主人曾参观其他大都市同业情况迎合形势需要，为了巩固与发展事业，专为这般特殊客人设备的安乐窝。一般市民，是不假边的，浴德池至1937年年后停业。

（郑众整理）

玉皇阁上斗蟋蟀

高金福

本文所谈的“斗蟋蟀”，是聊城——过去东昌府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不过，这种娱乐活动跟斗鸡一样，慢慢趋向质变，成为一种赌博性质的玩意了。

东昌府斗蟋蟀的地方有好几处，如城中央的“光岳楼”、东门外的“鲁仲连台”。但如果按场面大、势派兴旺热闹，可以说属“玉皇阁”了。“玉皇阁”座落在小东关外，盔顶斗拱，金瓦雕窗，飞檐流丹，巍峨壮观，是一座建自元明，名著齐鲁的古刹。它与“铁塔”、“古楼”（光岳楼）合称东昌府的“三宝”，双层高阁下有百余级石阶的台基，很是宽敞平坦。斗蟋蟀的场合，也就在这台基上。

斗蟋蟀的地方叫“策场”，两虫搏斗时的战场叫“栅台”，参加战斗的蟋蟀，未上“栅台”前，先由评判员对它作个全面检查，初选入格，才允许持号参加。如果犯有“尖”（即牙齿尖的）、“圆”（即翅成圆形的）、“哑”（即鸣声沙哑的）、“烂”（即翅上烂去半边的）均视为异色异声，例在摒弃之列，不能上台的。

蟋蟀正式上台前，先把它放入一只纸笼壳中，用戥子称其体重，以每分为一百点。除纸壳分量若干，以实重写于衡外，并标上所有人的记号，称后安置在一处，由虫主自由配合，如果双方点数相同，自然可以配合，若无相同的分量，

只要一方自愿相让，也悉听尊便。

这“棚台”是木框钉制而成，长方形，面饰竹丝，露缝，可以鉴赏。中设一闸，闸两边各放进准备搏斗的蟋蟀，蟋蟀争斗前，虫主双方先议定要斗多少支“花”，每支“花”多少钱是由“策场”上规定的。如果自认为自己的蟋蟀足可以打败对方，但缺少资本，斗不起大“花”，那么，旁观的人也可以“帮花”，这所谓“帮花”，是由旁观者出钱若干，如“加股”之意，输赢分担。“帮花”之外，还有“喝酥”，即是非虫主认定某虫必胜，从旁下注，输赢如何，也由该虫主认可。这和斗鸡一样，虽是虫主双方赌斗，“喝酥”的赌注大大超过虫主的赌注，往往达到几百吊钱至千多吊钱之巨。

一切的手续议定后，公证人（主裁）开始启闸。另有两个“牵手”各执牵草，挑拨虫牙，待其张牙舞爪，跃跃欲试时，引导两虫接近，一旦触鬣相及，两将交牙，便开始争斗起来。有时两虫搏斗成桥形，有时滚咬成一团，小小战场上便充满了杀气。双方虫主，都全神贯注，目不转睛的看着，恐惧喜乐的神情，随场上形势而变化。这时的空气，真紧张到了极点，直到战胜的蟋蟀振翼长鸣，战败的蟋蟀乱窜逃命时，双方“牵手”才用牵草引归，闸也放下来了。这一场搏斗，即便是“活局”（活局只斗一次，“板局”要斗三次）的话，双方虫主的输赢已定，胜利者既赢钱又有面子，当然得意洋洋；失败者则赔钱又折兵，真是垂头丧气。

依照老习惯，斗蟋蟀总是从每年的秋分开始，这一天叫“开策”。据活到九十四岁的常德升老先生讲，有一年，玉皇阁策场以东关李梦杰为首，此人是本地著名“耍人儿”。

(即好玩的人)，又是地方青帮中“通”字辈的老大，县衙门挂名六班老总，公私两面都吃得开。手下有两位助手，其中一人姓阮，名琴堂，祖上曾做过山西省知县，家中颇有田产。到了这一辈，生性好玩，酷爱斗蟋蟀，一掷千金而在所不惜，渐渐由大财主玩到中产阶级，因而落了个“玩大爷”的浑号，确是个斗蟋蟀的行家里手，所以每年的开策，李梦杰必央“玩大爷”帮忙，聘为主裁。

这年秋天，“玩大爷”介绍在平人张一龙与策场头头李梦杰认识，张表示愿在这里物色对象，决一雌雄，他这只蟋蟀，取名“金头无敌大将军”。据说是花了百两纹银由胶东山区买得，这只蟋蟀肌肤如雪，背翅如漆，头大项宽，身个强悍，确是异种。后来，果然在玉皇阁策场大出风头，赢了二百多两银子。东昌府另一位有相当声望的玩家是张八爷，名德隆，为本城富商。他见这外地来的蟋蟀在本地称雄，颇不服气，连取几只巨价购来的蟋蟀出阵应战，均先后断羽，全军覆没，不但赌输了钱，且自认丢了脸。一气之下，将所有蟋蟀罐砸得粉碎，声明从此决不再玩。此时，东昌府知府历太尊的弟弟，人称二老爷，官津永嘉，从安徽老家来到乃兄任上。此人虽曾捐纳知县候补，但声色犬马，无不爱好。他派人四处访求，花银八百两，获一员猛将，名叫“铁头大王”，又送绰号“梅花豹”。此虫腹下生白斑点，如梅花形，百战百胜，所向无敌。张八爷听说梅花豹如此英勇，遂登门拜谒，极力怂恿二老爷应战，以求一雪自己败北之辱，果然二老爷中其计，当即送下战书，约期决斗。

就在玉皇阁九九重阳蟋蟀大会的最后一天，“大王”与“将军”上场了，赌注为白银一千伍百两，一时轰动城关。

瞧热闹的纷至沓来，两虫一接战，就杀得难解难分，或双拨口，或造桥，或打蜘蛛球，互不相让。几十个回合后，双方斗得各有断足折翅，带有残伤，仍然斗个不休，观众莫不凝目咋舌，暗暗使劲。最后，两虫牙水交流，足腿先后尽脱。这一场恶战，历时一个时辰，结果同归于尽，下的赌注，也就不分输赢了。

玉皇阁早已不存在，玉皇阁上斗蟋蟀的盛况也已成为历史陈迹，知道的人很少了，现追忆老年人所谈，杂记如上，聊存点滴乡土风情。

（陈宝森整理）

杂谈估衣店

马 玉 骏

“估衣”两字，顾名思义，作贩卖旧衣之谓。然而，有的却是全做新物“成品”倾销。街头、市场、露天摆列新裤新衫，花花绿绿，这叫“卖衣裳”行业，即古之“估衣商”也。

聊城，从前有两家“估衣商”，都坐落在东关大街。一家“合腾德”，是丁景成丁掌柜的买卖。一家“源盛一”，掌柜的名吕梅（字占一）。估衣店除卖亡人的殓衣外，主要的还是多卖喜嫁衣裙，除零星门售前，大部分往外乡镇赶会。春天，会不少。秋后收结了，也是净会①如沙镇、燕甸、马桥、阿城、王官庙等地。一个会接一个会，下来这里上那去，一天也不闲着。那时候，专雇一辆铁轮大车，拉着货这里那里延搭哩②赶会。带的货品齐全，上等的如靴、帽、兰衫、凤冠霞披，都是新制成品。缎面刺绣，绚丽夺目。女大袄，有红、兰、淡、青。女裙有“统子裙”、“百折裙”、“八面幅”、“大八折”等，像杏红、藕荷、浅绿、绛紫，要什么有什么，各色俱备。更有一种“朝裙”，是命妇所用，绣有凤凰牡丹、水纹浪花图案，十分好看。这些女式衣服，全是卖给婚嫁喜事之需，却是不少销呢，这也是靠“门市”（信用和声誉），东西质量不错，不哄拢③人。成年价赶会，时间长了谁也有个“路分”（在某一地域吃得

开)。

另一种“估衣店”是专卖旧衣服的，犹如南方的“提庄”，他们哪来的旧衣？小部分是人家委托代卖的，大部分是从当铺里购出来的。原来，当铺当死的衣物，常常要招标出手。估衣铺整批收进，再一件件零卖出去，其中也有不少利润可捞，还经常上外边摆摊卖。民国二十年后，兴喊卖洋布，一块一块的，大声喊唱，编的词儿挺押韵，好听，引得一大圈人听。这样方式，却不少卖，甚至把布铺的生意拉去很多。

如今，市场、集市、卖成衣的如长蛇阵似的，他（她）们从外地购进，或自己办料加工。有的人还冒用人家大地方的厂号商标，据说都干得不错。这也是老底子的估衣行业遗留下来的一个苗裔。

注：①“净会”：很多会或到处有会之意。

②“延搭哩”：到处之意。

③“哄拢”：欺骗之意。

以上均是聊城土语。

请 摇 社

沈 宝 章

旧社会群众，如经济上有困难，多用“请摇社”（亦称请摇会）的办法解决。

那时，我家中生活常感艰窘，家严家慈不断请摇社，以解眼前之急。那时，家严请的摇社为“助社”，没有利息。

“助社”是邀请有交情的亲友，让他们每人拿出一份钱来，帮助的意思。以后由请会者（或称“社首”、“会首”）分次偿还，每年规定月日，到期由“会首”宴请各个会友，并拿出一份的钱来，还给一个人。例如请十元的会，十个人就凑壹百元，由会首收用，待第一次请会时会首只还十元，下次请时再还十元，还完为止。至于究竟先还谁，则摇骰子碰“点”确定。其法是用三个骰子，放到碟子上，叩上一个碗，每人摇一下，谁的点大，先还谁。如果两个人相同的点，再摇一次，或用拈阄的办法解决。

家慈请的摇社，是有利息的。生活困难时，摆酒席请来诸亲友，大约十人，每人十元，可得一百元，以济燃眉之急。然后每隔三个月或半年，先下帖约定日期，仍由会主摆酒席。（注）把原有会友请到，还会本一次，并由全体会友

注：另有一种是以后谁用钱谁备酒席，并非每次都由会首宴请，

以揭示钱码形式，由一人“得会”。例如会友中一个人想用钱，或同时几个人都想用钱，于是全体会友每人暗写一纸条，比如有认九元五得会的，有认九元得会的，有认八元五得会的，谁有急用，谁就少写点，谁写得少，谁就得会。于是，会首仍拿出十元，不得会的每人拿出得会者所报的数目，统交得会者使用。以后，如前法，再确定另一得会者，但得过会的必须拿出十元。这种办法是先得会的给后得会的拿着利息，到最后得会的，可得到全数的一百元。这一种友谊借贷的形式，很广泛地兴行于城乡社会。

民间还有一种“借社”风俗。如某人有急需但缺一百元钱，就来个借社，弄点酒菜，约来会友十人，每人借十元，以后每月还一人十元，十个月还清。“借社”与“助社”性质相同，但只开始请一回客。

此外，还有几种以银钱通融而名义不同的“社”。

“买卖行业借社”，是干菜馆、澡塘或其他生意的，如资金欠缺，便来一次借社，请一回客，所约来的亲友，每个人拿出十元或二十元（数目每人一样，事先由会首说定），会主把印好的菜票或洗澡票、戏票等，按所借的钱数，交给每个会友，这票不当钱用，只能凭此去下馆吃饭或看戏、洗澡。这样是大家凑起整数帮一个人的忙，而由他以所营业务零星偿还。

“板社”，早在几百年前，民间就有“板社”的集体组织。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一旦去世，仓猝间难以筹集棺殓丧葬之费，于是在平常日子里，由热心公益者倡办，成个“板社”，十人、二十人都可，但不宜过多，一旦谁家遭了父母之丧，即时由每个社员，各凑去钱来，襄助完成丧事。

每人所出钱数多少，由成立之日公定，一般是十元或二十元。每个社员只享受一次公凑之款，一个个都能挨着，以至该到最后一个人为止。在“板社”的多是生活较艰难的人，板社不定期，不请客。

“馍馍社”，个人想做点小生意，没有本钱，就约个“馍馍社”。其法是，在麦收后，向每个社员借三斗或五斗麦子，到年、节就还上一个人的，下个年、节再还另一个人的。这样整收零还，不伤原本。还麦子时也可按市价折成现金，除还原本外，再敬送三两斤馍馍，作为酬谢。

此外，还有“娶媳妇社”、“车子社”（借几个人的钱娶媳妇或买脚踏车）等等，其性质相同，都属于个人力量微薄，办不起，而由亲朋好友共凑，众擎易举，事情就解决了。

以上所述几种形式不同而性质一样的会和社，是过去社会里，人民生活中很普遍的习俗。会一道摇社，不但给困难的亲友帮了忙，而自己也无异存一笔储蓄，也是一举两得之事。然而，如有困难请摇社，也不是很简单。第一，人家得信得过你，相信你不会“折烂污”；第二，人家得掂量你到时有无归还能力，是否能保证信用，如果对你稍涉疑惧，就可能借词推脱。

“请摇社”是过去人与人之间信义互助，扶困济急的一种友好的、经济通融支援的风俗习惯，距今差不多半个世纪了，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现已不复存在。

（裴蓉整理）

旧聊城的果木市

吴云涛

“果木”是地方土语，泛指一般鲜果，旧聊城的果木市，是在东关前菜市街。这趟街有好几家专管批发果木的行栈，代客买卖，抽取佣金。这些店虽然不是规模宏大，资金雄厚的商号，但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店。计有兆昌、裕兴、仁义、泰升、忠诚、瑞昌、鸿茂昌等，也有个别店依其多年传统和营业性质，经营为同业所无的专营货品，如裕兴店，每年四月初就大批调进在平教场铺的黄瓜了。那里的黄瓜上市特早，与本地黄瓜不同，个粗浑而壮大，吃到嘴里酥脆爽口。鸿茂昌则专营山货，称为“山货行”。泰山一带的山楂经年不断。八月中秋节前，还大批采来“栗子蓬”，就是带外壳的栗子，这是聊城风俗中秋祭月时的必需供品之一。

各店经营的果木，多是城东南乡农民挑来求售的，先上市的是杏，以后是桃，继之是沙果、李子、石榴、杜梨、雪梨，中间的甜瓜、西瓜，更是大批上市。果木成熟时，农民傍晚到自己的果林里把果子“下”下来，随即挑到街上，当晚住在店里。第二天清早，就把果木一筐筐、一篓篓摆到店外，小商贩也早早到市，择其认为好销之货洽买，店方有人出而议价，价钱同意后，由店中人查数，果木是以个计值，到了后来，杏子才上秤论斤，别的果木还是论个。查数时两

手并用，一只手抓三个，一只手抓两个，一五一十地查，如查到百数即是五百个。查完并不给现钱，由买卖双方一块到柜上报帐，柜上记上了帐，待卖客把货卖净，由店方垫款付清，扣佣金三分（每吊钱三十文）。买客不拿佣金，只是次日早上来市时，要把欠的帐还柜上，以便再欠，但有的也借故赖帐，使店方吃亏。不过，那时的小商贩，多为肩挑喊卖、现混现吃的穷人，他们指望这些店家供应货品来养家糊口，不敢轻易赖帐，自绝衣食来源。

前菜市街的果木市，除了有季节性的鲜果之外，还有其他干果和蔬菜，也按季节上市。如韭菜、蒜苔、香椿芽。这三种蔬菜，都比本地提早，称为“赶鲜”，全是东阿县洪范池东南“书院”村附近生产的，那里群山环绕，寒威减低，又朝阳气暖，易于培养，所以得天独厚，比别处下来得早。

蒜苔是以“泡”^①论价的，一“泡”的固定价格是一百一十六文，斤称的数量是活的，或涨或落，由斤称上升降。例如货快，销路畅，三斤两斤，甚至要少一些，也算“一泡”，倘是销路迟滞，要主少，十斤八斤也可作“一泡”，都是由店方向买客卖客双方面讲。此外，山楂也是论“泡”的，每“泡”固定价钱贰百四十文。

店方为买卖双方牵线，是要收佣金的，叫作“行佣”。蒜苔的“行佣”是“加一”，但已计算在“一泡”的价钱之内了。“一泡”原应价是一百文，那个一十文，就是另加的佣钱。佣钱归买方拿，但与卖客算帐时，每吊钱里倒找给卖客三十文，按一百零三的钱数给他，再加称百分之三十。称是“潮零三”^②（百斤加三斤）。韭菜和香椿芽以及泰安、莱芜来的生姜，南乐来的粉条，清平、博平来的花生等，都是

“潮零三”秤，但行佣是三分。

每年果木上市时，前菜市街十分热闹。街的东段、中段路两边，摆得五光十色，果香扑鼻。每天天一亮，各店就开始营业，来自城关厢各处的小贩和卖零食的街头商贩，都汇集到这里，人山人海，拥挤异常，有卖甜沫、豆腐脑、稀粥的，有卖切糕、包子、烧饼果、绿豆丸子的，生意都十分兴隆。十点钟达到高潮，到十一点光景，全部果木可以卖光不剩，买客也陆续走了。卖零食的，也都是缸子空了，挑子上的食物光了。

卖果木的客人，货卖光后，往往在店里吃一顿饭。自己带来的干粮，店里给加温，供应开水、黄瓜菜、咸“疙瘩”、咸萝卜，这些都不收费，逢到过五月节或八月节时，店里还特为炒几个菜，打酒，请请他们，做到皆大欢喜。

注：①泡，量词。

②潮，去潮意思。

旧县衙的监狱

于朝敏

聊城老县衙门，在古楼西大街路北，是几百年来县太爷的办公所在地。民国后没迁移，房舍设施也没大变化。在衙门大门的右侧，有一高逾两三丈的砖墙，里边就是监狱。这座监狱面积不过二亩，却经常拘押着百余名犯人。

管理监狱的官，清代叫“典史”，也称“县尉”或“司狱”。民国后叫“典狱长”，下边有“禁卒”，或叫“看守”，等于后来的“政务警”或叫“法警”。

罪重的犯人，不但日夜带刑具，还要受狱卒的百般折磨。每晚，一排排犯人并卧地下，手脚都卡上“木狗子”，不能动弹。犯人随地便溺，肮脏无比，秽臭难闻。老鼠、臭虫任意出来啃犯人的脚，吮犯人肌肤，真是人间地狱。

民国20年前，监狱内设有印刷所。有两台石印机，由犯人操作，代外边客商印广告、角票、单据等。以后，又增加了铅印、装订、制本等业务。犯人们有活干，还可多少得到几个钱，比整天“坐监”强多了。

女犯拘押在另外一个小院内，由女看守看管。这些女看守即是所谓“官媒婆”，凶狠蛮横。她们可以任意凌虐女犯，但只要花上钱，就能得到另眼看待，不受折磨。官媒婆也叫“隐婆”，属所谓“三姑六婆”之类。打官司牵扯着妇

女，由官媒婆管理。验女尸也是她们。官媒婆因公下乡，例由“驴行”供应一头驴子让她白骑（不给钱）。民国后，官媒婆改称为女法警了。

封建时代设置监狱，必须寻觅所谓“囚地”，这样建立的监狱，犯人心理才不会变化。据说是囚地的气脉所起的作用。这种传说，不见记载纯属迷信之谈。

监狱大门口左右，挂着方形牌子，上面绘有虎头，但不是老虎的头。传说它的名字叫“狴犴”，为龙生九子之一。因它凶威，所以叫它守狱门。因此入监狱也称为“身陷狴犴”。

老县衙西边路南，有看守所。这也是拘禁犯人之处。凡是未正式判刑临时拘留的人犯，就搁到这里。如果能广施贿赂，钱能通神，在这里坐监，一样可随意叫酒菜，住单间房，并可以食鸦片烟。旧社会的黑暗，可见一斑。

监狱的高大垣墙上，遍插枣柯针，以防犯人爬墙越狱。这些枣柯针，每年换一次新的，例由柯针寨（村名，在城东北八里，多枣树）供应，并不付酬，即是“应差”也。

监狱院内西南角墙根下，有一个小庙。这个庙比鸡窝太点，里边有一尊偶像。老头模样，须发皆白，慈眉善目，正襟危坐。穿着古代冠服，手握书卷，似含笑容，这就是“狱神”。他的职责是督管人犯，教训他们反省悔过。被押入狱的犯人，例由狱卒领着到这里磕头。如犯人有钱，就要托狱中厨房代办供品，烧香上供，求神保佑。没钱的人犯，也就磕一个头。据说“狱神”是禹舜时代担任狱官的皋陶，历代相沿，尊他为狱中之神，建庙供奉。这尊狱神除了给狱卒开辟了一个财源外，对犯人没有带来任何好处。民国以后，狱

神才被撤掉。

狱中在押犯人，往往以强欺弱。长期徒刑的老监犯，自恃资格老，蹲监时间长，便当起了“狱霸”来，对新来犯人，多方刁难、凌辱，甚至殴打。如果新来犯人，能拿出钱来“和和狱”，即请同在一监的犯人吃顿饭，或向“狱霸”孝敬一些钱物，那就可免去麻烦，彼此同是“难友”了。

旧社会的监狱，黑幕重重。这里所记，只是一鳞半甲，希知情者补充矫正。

政协聊城市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甲、建国前部分

政 治 方 面

一、清末民初时期

- 1、有关蒋官屯（义和团黄沙会）张二面条杀曹官的资料。
- 2、有关小店子（义和团黄沙会）火烧教堂的资料。
- 3、有关辛亥革命前后聊城政治活动情况的资料。
- 4、有关同盟会及其人员在聊城活动情况的资料。
- 5、有关“五四”运动时期聊城人民进行爱国活动的资料，特别是聊城二中、聊城三师师生员工的资料。
- 6、有关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聊城政界活动的情况。
- 7、有关广州黄埔军校中聊城籍学员赵以政等人的资料。
- 8、有关聊城“十人团”的建立及活动情况的资料。

二、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

1、有关军阀、国民党时期聊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资料。

2、有关李太黑(沙镇五圣庄人)农民抗税斗争的资料。

3、有关韩复榘到聊城来的资料。

4、有关军阀、土匪混战给聊城人民带来的灾难及政治影响的资料。

5、有关韩复榘的29师87旅(旅长荣光兴)在聊城对革命运动的镇压及所谓“清乡、禁烟”的资料。

6、有关国民党县党部在聊城的建立、活动及其内部斗争的资料。

7、有关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活动对聊城人民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侵蚀的资料。

8、有关军阀、土匪在聊城鱼肉人民的资料。

三、抗日战争时期

1、有关日本宪兵队、特务机关在聊城进行罪恶活动的资料。

2、有关日本侵略军在聊城的暴行资料。

3、有关“新民会”在聊城的组织与活动的资料。

4、有关聊城日伪政权的资料。

5、有关聊城战役范筑先将军及张郁光、姚第鸿三烈士殉国的资料。

6、有关聊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统战工作、政权建设、减租减息，以及工、农、青、妇各界群众运动的资料。

7、有关国民党军政组织和人民在聊城与共产党合作从事抗日活动的资料。

8、有关国民党反动派在聊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资料。

9、有关聊城各阶层人士，包括开明士绅、工商业者、归国华侨从事抗日活动的资料。

10、有关日伪组织、国民党在聊城的政权机关人事变迁的资料。

11、有关聊城“新民会”的合作社组织与活动的资料。

12、有关聊城红枪会的资料。

13、有关聊城沦陷时日寇残杀人民的资料。

14、有关范筑先将军组织、整编各支队的资料。

15、有关杂牌、土匪齐子修、吴连杰、栾省三、张中孚鱼肉人民的资料。

16、有关聊城五只虎，赵（赵振华，河北省静海县人），郭（郭培德，聊城县沙镇人），王（王兴邦，济南东人），江（江克敏，聊城堂邑人），付（付崇鲁，聊城县绣衣集人）鱼肉人民的资料。

17、有关聊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子善、县长位光武、刘佩之资料。

18、有关“新民会”主办的“华系指导官训练班”组织、内容、人员的资料。

四、日寇投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重大事件。

1、有关聊城围城时期，城内的人民群众生活情况资料。

2、有关三人调停小组来聊城活动情况的详细资料。

3、有关国民党、三青团在聊城的组织与活动情况的资料。

4、有关国民党山东行政人员训练团内聊城的数据料。

5、有关聊城人民（包括解放区和城内国统区的有关组织和知名人士）反对国民党镇压人民、抢夺胜利果实的资料。

五、人物

1、有关傅斯年（国民党立法委员，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的资料。

2、有关聂湘溪（军阀时期，任山东省工商厅厅长，李海务乡军屯人）的资料。

3、有关杜谭之（北洋军阀时期，任益都县县长，李海务乡老韩庄人）的资料。

4、有关杜凯之（北洋军阀时期，任京议院议员）的资料。

5、有关韩复榘的资料。

6、有关刘子善（抗日时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资料。

7、有关位光武（抗日时期，国民党聊城县县长）的资料。

8、有关刘佩之（抗日时期，国民党聊城县县长）的资料。

9、有关李翰章（一九三八年随日寇进聊城的第—任伪县长）的资料。

10、有关陈道衡（一九四—年，日伪第二任伪县长）的资料。

11、有关袁松言（一九四—年秋，日伪第三任伪县长）的资料。

12、有关周东华（一九四三年秋，日伪第四任伪县长）的资料。

13、有关石径兰（一九四五年春，日伪第五任伪县长）的资料。

14、有关王慕桥的资料。

军 事 方 面

一、清末民初聊城驻军情况、驻军地点、驻军数量、番号、人物等的资料。

二、军阀混战时期。

1、有关聊城驻军变迁的资料。

2、有关张宗昌收缴第四旅（旅长张建功，属直系，为吴佩孚部下）枪支的资料。

3、有关民国十九年（1930年），王金发匪部陷据聊城的资料。

三、抗日战争时期。

1、有关日寇进攻陷落聊城的资料。

2、有关范筑先将军在聊城抗击日寇的资料。

3、有关日伪军扫荡的资料。

4、有关我聊城军民反扫荡的资料。

5、有关活捉伪团长张建州的资料。

6、有关日寇陷聊后统治政策的资料。

四、解放战争时期

1、有关聊城围城时期敌伪军政内部情况的资料。

2、有关我军围困聊城作战部署的资料。

3、有关济南敌军接应聊城被围敌伪军逃窜济南情况的资料。

五、人物

- 1、有关范筑先的资料。
- 2、有关王金祥的资料（任山东六区保安司令）。
- 3、有关柴光兴的资料（87旅旅长，在1930年——民国19年驻聊城）。
- 4、有关陈德馨的资料（86旅旅长，在1931年——民国20年驻聊城）。
- 5、有关李益智的资料（220旅旅长，1932年——民国21年驻聊城）。
- 6、有关赵心德的资料（222旅旅长，1933年——民国22年驻聊城）。
- 7、有关王士琦的资料（85旅旅长，1937年——民国26年驻聊城）。
- 8、有关陈西鹏的资料（土匪）。
- 9、有关齐子修的资料。
- 10、有关吴连杰的资料。
- 11、有关郭培德的资料。
- 12、有关栾省三的资料（栾小秃）。
- 13、有关王兴邦的资料。
- 14、有关江克敏的资料。
- 15、有关付崇鲁的资料。
- 16、有关张瑞亭的资料。（伪保安大队副大队长）
- 17、有关赵振华的资料。（伪保安大队副）
- 18、有关马叶千的资料。（伪保安大队副）
- 19、有关侯志恩的资料。（伪保安大队副）

- 20、有关刘云章的资料。（伪保安大队副）
- 21、有关王振东的资料。（日伪警察局长）
- 22、有关高越南的资料。（日本投降后蒋伪警察局长）
- 23、有关陈玉怀、陈万泗的资料。（红枪会一派的头目）
- 24、有关王殿明的资料。（红枪会头目。）
- 25、有关陈殿贞的资料。（红枪会头目）
- 29、有关刘怀玉（号中孚）的资料。

工商、经济方面

- 1、有关聊城农工银行的资料。
- 2、有关聊城电灯公司的资料。
- 3、有关聊城县商会的资料。
- 4、有关聊城“文星当铺”的资料。
- 5、有关聊城“钱号”、“钱庄”的资料。
- 6、有关聊城“济东工厂”的资料。
- 7、有关聊城“永昌”厂的资料。
- 8、有关聊城“毛笔业”的资料。
- 9、有关聊城“刻书业”的资料。
- 10、有关聊城“民生厂”（纺织业）的资料。
- 11、有关聊城“东临工厂”（兵工厂）的资料。
- 12、有关聊城酱菜业、酿造业的资料。
- 13、日伪时期日寇控制各种物资所建立的各种“组合”的有关资料。
- 14、有关盐池业的资料。

- 15、有关饮食业的资料。
- 16、有关聊城土、特产的资料。
- 17、有关聊城近百年来社会金融事业的资料。
- 18、有关聊城旧时代手工业情况的资料。
- 19、有关聊城旧时代交通事业的资料。

教 育 方 面

- 1、有关聊城二中、聊城三师的建立及其教学和参加社会活动的资料。
- 2、有关清末废科举、聊城兴办学堂的资料。
- 3、有关“东昌府师范”的资料。
- 4、有关聊城“东林书院”、“光岳书院”、“龙湾书院”、“阳平书院”、“启文书院”、“摄西书院”的资料。
- 5、有关聊城“抗日游击四中”的资料。
- 6、有关“文德小学”（基督教）资料。
- 7、有关日伪时期、聊城县中、简易师范的资料。
- 8、有关堂邑“武训中学”的资料。
- 9、有关聊城“东临道立模范小学”、“三师附小”、“卫仓小学”的资料。
- 10、有关聊城二中、聊城三师以及其他学校师生员工进行革命活动及其影响的资料。

文 化 方 面

- 1、有关聊城“海源阁”藏书情况和遭受破坏的资料。

2、有关聊城三大书局——“中华书局”、“振东书局”、“振西书局”的资料。

3、有关聊城四大书店——“有益堂”、“书业德”、“善书堂”、“宝兴堂”书店的资料。

4、有关聊城“东昌新闻”报纸的资料。

5、有关聊城“战地文化”的资料。

6、有关聊城“抗战日报”的资料。

7、有关聊城民众教育馆的资料。

8、有关聊城“聚乐戏院”、“进德会”剧场的资料。

9、有关聊城“八角鼓”的资料。

10、有关聊城民间传统文艺活动的资料。

11、有关聊城神庙的泥塑艺术的资料。

12、有关聊城武术界的资料(包括著名人物的资料)。

13、有关聊城地方戏曲兴衰的资料。

科 技 方 面

有关井堤口“果园”的资料。

医 药 卫 生

1、有关解放前聊城医疗事业的资料。

2、有关解放前聊城医院的资料。

3、有关“高佛堂寺”膏药的炮制与销售情况的资料。

4、有关聊城中医界的资料(著名老中医)。

5、有关“怀德堂”、“益寿堂”、“怀生堂”(药铺)的资料。

- 6、有关“张光灿”膏药的资料。

民 族 方 面

- 1、有关回族徙居聊城的原因及聚居地区分布情况的资料。
- 2、有关少数民族参加革命活动的资料。
- 3、有关回民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的资料。

宗 教 方 面

一、道教

- 1、道教在聊城分布与活动的资料。
- 2、道教在聊城影响最大的神仙，如“太上老君”、“玉皇”“赵公元帅”等的有关资料。
- 3、道教所传播的“玉皇大帝”、“城隍”、“土地”、“灶君”等一系列迷信思想，在过去和现在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情况的有关资料。
- 4、道教“观”在聊城分布情况、活动、人员的有关资料。
- 5、泰山神“东岳大帝”旧时对聊城百姓的影响情况的有关资料。

二、佛教

- 1、有关佛教在聊城分布传播情况的资料。
- 2、有关在聊城建立最早的佛寺、尼庵的历史，以及著名佛寺尼庵的主持人的情况的资料。

3、有关旧时佛教在民间传播的“阿弥陀佛”、“观音”、“阎罗”、“地狱”等迷信情况，及其对百姓的影响等有关资料。

4、有关聊城龙湾古刹“静业禅林”的资料。

三、伊斯兰教

1、有关伊斯兰教在聊城分布传播情况的资料。

2、有关聊城“大礼拜”寺的建立情况的资料。

3、有关聊城清真寺的历史，分布情况，以及阿訇职业活动情况的资料。

4、有关聊城穆斯林“开斋节”、“古尔邦节”的具体活动内容的资料。

四、基督教

1、有关基督教传入聊城的组织活动情况的资料。

2、有关基督教在聊城建立教堂分布情况的资料。

3、有关基督教在聊城所办的学校情况的资料。

4、有关基督教在聊城的传教士活动情况的资料（包括其影响）。

5、有关聊城“中华圣公会”的资料。

6、有关聊城“基督教通圣会”的历史沿革资料。

五、天主教

1、有关天主教传入聊城的组织活动情况的资料。

2、有关天主教在聊城的教堂分布情况及信徒情况的资料。

3、有关天主教传教士在聊城活动情况的资料（及其

影响)。

4、有关天主教在聊城举办的文化教育事业的资料。

六、有关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在聊城与帝国主义侵略军勾结的资料。

七、有关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在聊城参与爱国活动的资料。

社 会 方 面

一、会道门

有关“一贯道”、“圣贤道”、“先天道”等会道门在聊城的组织活动情况的资料(包括其发生、兴衰、及其领导人物)。

二、有关“花月书寓”、“长春馆”、“吉野屋”、“长久书寓”等妓女院的情况资料。

三、有关聊城“福寿土膏店”等大烟馆的情况资料。

四、有关聊城民间婚丧习俗的资料。

人 物

1、有关张振生的资料(聊城马街人,农工银行、电灯公司经理)。

2、有关商振声的资料(聊城农工银行行长)。

3、有关周荫泉的资料(士绅、京议员)。

4、有关杜光坝的资料(聊城人,曾任山东大学及西南联大教授)。

- 5、有关孙东阁的资料（曾任聊城三师校长）。
- 6、有关周拔夫、孙清晨、冯光荣的资料（曾先后任聊城三师校长）。
- 7、有关勒北海、孙玉溪、郭锡久的资料，（曾先后任聊城二中校长）。
- 8、有关李诚之的资料（曾任东临道模范小学校长）。
- 9、有关张海鹏的资料（曾任聊城三师附小校长）。
- 10、有关呼盍斋、韩献廷、君松桥、齐培栋的资料（都是画家）。
- 11、有关顾绍年、刘克平、朱学笃的资料（书法家）。
- 12、有关荣须岩（《聊摄琐谈》作者），王新铭（《宣讲宝铭》作者），王路州（《圣踪芳足记》、《古碑访问记》作者）的资料。
- 13、有关叶嗣高的资料（清、慈禧太后的御医）。
- 14、有关著名中医孙孚臣、王子良、葛赞庭、王省三的资料。
- 15、有关回族烈士金方昌的资料。
- 16、有关聊城著名阿訇的资料。
- 17、有关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有影响的主持人的资料。
- 18、有关美籍牧师陶锡嘏的资料。

建 国 后 部 分

政 治 军 事 方 面

一、建国后聊城军政方面的历史资料

1、解放初期聊城各地组织民工支援淮海、渡江战役所做贡献与事迹的资料。

2、聊城各地进行土地改革的资料。

3、抗美援朝运动在聊城的资料。

4、解放后聊城各地进行“镇反”、“肃反”的资料。

5、1950年聊城青年学生参军、参干的资料。

6、1950年聊城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成立前后的资料。

7、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和人民踊跃认购的资料。

8、各民主党派聊城分部筹备委员会成立及其以后发展的资料。

9、1952年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资料。

10、抗美援朝时期聊城爱国工商业者捐助物资的资料。

11、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资料。

12、1955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资料。

13、1956年聊城各地私营工商业者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料。

14、1957年聊城开始进行“反右”斗争的资料。

15、1958年开展“整风补课”、“反右倾”以及1965年“四清”运动的有关资料。

16、聊城各地推广人民公社的资料。

17、1958年聊城各地“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入高潮的资料。

18、1958年聊城各地大放“高产卫星”的资料。

19、聊城彻底纠正“五风”的资料。

20、1966年聊城各地“红卫兵”兴起及破“四旧”的有

关资料。

2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其以后回城的资料。

22、1974年“批林批孔”的资料。

2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解放以来历次运动冤假错案平反的资料。

24、1954年聊城各民主党派积极学习、讨论和热烈拥护宪法草案的资料。

二、地级以上人员资料

解 方 谢鑫鹤

工 商 经 济 方 面

一、金融业

1、民国时期聊城公私银行的有关资料。

2、各个时期聊城各地私营钱庄的有关资料。

3、建国后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分行及所属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有关资料。

二、商业

1、聊城各地著名中药业的有关资料。

2、聊城各地土特产品生产沿革的历史资料。

3、聊城各地著名“老字号”的历史资料。

4、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资料。

三、轻工业

1、有关聊城烟厂建立、变迁的资料。

2、建国前后聊城各地创建的面粉厂、火柴厂、造纸厂等的资料。

3、聊城酿造业的生产情况和有关资料。

四、农业经济

1、解放后各地农村成立互助组、变工队的资料。

2、1953年在农村成立农业合作社的有关资料。

3、1958年各地成立人民公社的有关资料。

4、关于农业学大寨的资料。

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农村进行改革建立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有关资料。

6、近年实行科学种田喜获丰收的资料。

五、著名工商、经济界人士资料

教 育 方 面

一、建国后聊城教育方面的情况

1、建国初期，对各级各类公立学校进行接收、改造、调整等情况的有关资料。

2、建国后，在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办法等方面借鉴苏联经验的得失情况的资料。

3、1950年后，聊城职工教育、扫盲教育的资料。

4、1958年后，各级各类学校把生产列入课程，广泛开展勤工俭学的资料。

5、1958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盲目追求高指标，只强调生产劳动，忽视课堂教育，降低教学质量的资料。

6、1959年、1961年两次烟台教育会议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资料。

7、“文化大革命”期间，聊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遭受破坏的资料。

8、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学校中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政策的资料。

9、大力发展电大、夜大、函大、职大及自学成才等方面的教育的资料。

10、建国以来，各地发展幼儿教育、特殊教育、体育、卫生教育等情况的资料。

11、建国以来，各级各类学校对教师的政治学习、业务培训、生活待遇等方面的资料。

12、建国以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开展“五爱”教育的资料。

13、建国以来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活动及对教育改革做出贡献的资料。

14、建国以来，在教育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的资料。

二、著名教育界人士资料

科 技 方 面

一、建国后科技方面的资料

1、聊城农科所的创建、发展及其成就的资料。

- 2、聊城卫生学校的创建、发展及其成就的资料。
- 3、科学机构的建立、发展及其成就的资料。
- 4、其他科技、学术群众组织的创建和活动资料。
- 5、建国前后，各地医疗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的资料。
- 6、各地关于中药材的种植、加工、销售等方面的资料。
- 7、各地著名中、西医务工作者行医、科研等情况的有关资料。
- 8、建国后，引进国外科学技术经验在聊城的运用及其效益的资料。

二、聊城著名科技人物资料

文 化 方 面

- 1、建国前，聊城电影事业、各地方剧种及各种曲艺的有关资料。
- 2、建国前聊城文化界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有关资料。
- 3、建国初期对出版单位进行接收、改造等情况的资料。
- 4、建国以来，新创刊的报刊、杂志的筹备、出版及发行、发展的资料。
- 5、建国后对过去的图书馆、文化馆的接收、改造、扩展的情况及新设立的图书馆、文化馆的发展情况的资料。
- 6、建国后对过去的广播、电影事业的改造情况及新的

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的设立、发展情况的资料。

7、建国后对地方剧种、剧目的继承、改造、发展、更新、提高等情况的资料。

8、对解放前已失传或停演的剧种、剧目的挖掘、整理、重新演出的具体事例的有关资料。

9、建国后，新老艺人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资料。

10、建国后，地方曲艺的继承、改造、创新、发展的资料。

11、建国后，各地举办书画展览会的有关资料。

12、建国后，各剧团的建立、发展情况的有关资料。

13、建国后，体育事业的发展、建立各种培养体育新秀的教育机构的资料。

14、建国后，聊城体育健儿参加各种运动会比赛及得奖的有关资料。

15、建国后，各地举行各类运动会及打破省以上纪录情况的资料。

16、建国后，城乡面貌的变化及发展旅游事业的有关资料。

17、聊城文化方面著名人士资料。

民族宗教方面

1、建国前后，聊城各地居住的少数民族生活、活动的资料。

2、建国前后，聊城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人物的有关资料。

3、民族宗教方面著名人士资料。

社 会 方 面

1、会道门在聊城各地的组织、兴衰及活动的有关资料。

2、旧社会聊城各地妓院、赌博场所的情况及解放后取缔的有关资料。

3、聊城各地以占卜算命等进行迷信活动的人物的有关资料。

4、解放前，聊城各地的风俗（婚、丧、嫁、娶）习惯及解放后进行改革的有关资料。

一九九一年一月九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聊城文史资料··第六辑

作者=

页数= 2 2 1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